

054 02

印度一些革命派的重要 文件、文章汇编

全校仅2份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

一九七〇年五月

433/22

印度一些革命派的重要文件、文章

汇 编

(机 密)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一九七〇年五月

目 录

第一部分：安得拉邦纳吉·雷迪派 的文件和文章

- 印共革命派安得拉邦协调委员会的决议
（一九六九年二月）……………（1）
- 安得拉邦革命共产党委员会当前纲领
（一九六九年四月）……………（6）
- 关于安得拉邦武装斗争的声明
（一九六九年七月）……………（28）
- 关于斯里卡库兰县吉里江人武装斗争的报告
（一九六九年四月）……………（32）
- 给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
贺信（一九六九年四月）……………（70）

第二部分：倾向纳吉·雷迪派观点的 一些派别的重要文章

- 关于与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的分歧
（一九六九年六月）
共产党革命派马哈拉斯特拉邦委员会……………（81）

建立革命的共产党（一九六九年五月）	
西孟加拉邦帕里玛尔·达斯·古普塔派……	（92）
新民主的斗争和“新共和”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西孟加拉邦阿希特·森派……	（109）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开展群众斗争和建立群众组织是必不可缺少的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西孟加拉邦阿希特·森派……	（113）
剥开所谓“革命领导”的假面具	
（一九七〇年二月）	
西孟加拉邦阿希特·森派……	（119）
第三部分：西孟加拉邦《南国》派的重要文章	
印度革命的前途（供讨论）	
（一九六九年五月）……	（127）
关于印度革命的战略问题（供讨论）	
（一九六九年五月）……	（162）
依靠毛泽东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一九七〇年二月）琴都·鲍雅尔……	（176）

**第四部分：喀拉拉邦昆·纳拉扬纳派
的重要文章**

特利切里——普尔帕利的一年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昆尼卡尔·纳拉扬纳 (197)

立即向党內处于领导地位的修正主义作斗争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昆·纳拉扬纳 (203)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喀拉拉邦

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213)

编 后

编 后 (219)

印共革命派安得拉邦协调委员会的 决 议

安得拉邦协调委员会对全印共产党革命派协调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与安得拉邦协调委员会断绝关系的决议感到惊讶和难过。全印协调委员会曾经写信邀请我们参加二月六日和七日召开的会议。会上讨论的题目是，“各邦斗争的发展以及我们的任务和纲领。”根据这个邀请，安得拉邦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在会议上对于可能存在的争论和意见分歧的各种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全印协会突然决定与安得拉邦协委会断绝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记住一件事情。安得拉协委会是去年十月才参加全印协会的。在未参加之前上述两个协会在某些问题上曾有意见分歧。它们就这些意见分歧进行了讨论，并对某些问题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即在某些根本问题上他们之间没有意见分歧。在毛泽东思想和武装解放斗争问题上，在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全印协委会坦率地认为，在抵制选举的问题上他们与安得拉存在着意见分歧。抵制选举的口号是否贯串革命的整个阶段以及如何团结我国的一切革命者，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在会上安得拉协委会清楚地说明，

在目前的情况下，武装斗争将是斗争的主要形式；我们将全力以赴去做这个工作；在一切开展斗争的地方，不提选举问题。但是，在那些还没有开展斗争的一切地区，根据需要，应为利用选举敞开大门，应该考虑某些地区的实际情况。虽然存在着这样的分歧，但是两个协委会都确信，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列主义，武装斗争是争取解放的唯一的形式；通过经验和讨论可以消除意见分歧。

就这样，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之后，四个月内，全印协委会没有对分歧的问题进行讨论，就宣布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同安得拉协委会有意见分歧，而且作出了把安得拉协委会从全印协会开除出去的单方面的决定。这一决定是令人惊讶的！

对安得拉协委会的第一个指责是安得拉协委会对中国共产党不忠。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再一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是当代的马列主义。

全印协委会还突然提出关于纳吉·雷迪同志就喀拉拉的事件发表的声明。全印协委会引证了纳吉·雷迪同志的声明并为了更加强调他们的指责说，在北京电台广播之后，纳吉·雷迪同志仍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安得拉协委会进一步加强了纳吉·雷迪的观点。实际情况是，安得拉协委会对喀拉拉的事件没有进行全面的讨

论，只进行了局部的讨论。纳吉·雷迪同志的声明是在查鲁·马宗达同志的声明之后发表的。《人民力量》周报发表了查鲁·马宗达同志的声明，而纳吉·雷迪同志的声明没有发表。随后，《人民力量》还发表了《解放》月刊的一篇文章。

安得拉协委会在会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这个讨论是在接到全印协委会的决议后举行的。由于没有适当地安排，因此在会上没有提出北京电台的意见。安得拉协委会对在《解放》月刊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讨论，并作出这样的决议：纳吉·雷迪的观点是不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安得拉协委会对中国共产党不忠”这样的指责是不正当的。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斯里卡库兰的武装斗争问题。指责安得拉邦协委会没有真心实意地支持这个斗争。这种指责是不对的。安得拉邦协委会把这场斗争当作自己的斗争并作了很好的宣传。安得拉邦协委会在自己的声明中曾经说过这个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安得拉邦协委会自从那里的斗争开展以来，为了完成自己的神圣的职责，做了艰苦的工作，传送消息、发表社论，报导其他消息等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各个地区的吉里江中、在斗争的地区和其它地方都作了宣传。由于各区都处在平静状态，因此没有能够把这个运动继续深入下去。现在安得拉邦协委会还保存着关于斯里卡库兰

革命斗争的报告。对这个报告进行讨论和研究之后将立即送给共产党革命派。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抵制选举的问题。在安得拉邦协委会与全印协委会实行联合时就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在《解放》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抵制选举是整个革命时期的战略。联合后，没有任何机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全印协委会也没有听取安得拉邦委会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

全印协委会的领导在他们的一九六九年一月四日的一篇文章中表示赞成我们的一个决议。在我们的这个决议中曾说，纳吉·雷迪同志将在下次讨论预算的会议上辞去他在邦议会中的议员职务。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即在预算会议以前还没有辞职呢？对安得拉邦协委会提出这个指责我们感到奇怪。只要读一下上述文章中的下列部分，就能够更好地知道：

“我们已获悉，纳吉·雷迪同志已决定在预算会议上辞去他的邦议会议员，而感到非常高兴。对此，请你们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这件事情将鼓舞全国的革命派，将提高全印协委会的威信。”

从上述事情中非常清楚地看到：全印协委会通过关于开除安得拉协委会的决定是不适当的，他们毫无根据地做了这一令人痛心的决定。

安得拉邦委会认为，现在已是统一我国各地区的群

众斗争、开展革命运动的大好时机。只有参加群众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参加群众斗争。全印协委会的这种决定严重地损害了群众斗争和共产党革命派的团结。

安得拉邦协委会还认为，毛泽东思想和学说是今天的马列主义。在相互讨论和争得经验的基础上消除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各种意见分歧，才能更加加强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召开全印革命派和我们邦的革命派的会议。安得拉邦协委会特别为此正在进行努力。

事情已表明，团结革命派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从这种客观的情况出发，我们希望在毛泽东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为了革命派的团结要更好地进行工作。安得拉邦协委会为指导革命派的这个将来的方向将更加努力。

（原载西孟加拉邦孟加拉文《红旗》小报，
一九六九年五月）

安得拉邦革命共产党委员会当前纲领

前 言

同志们：

在四月十日、十一日和十二日举行的安得拉邦革命派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推进共产党革命派领导的邦内革命斗争的当前纲领。现将此纲领发给你们。

同志们必须研究代表大会通过的这个纲领；并且必须立即开始付诸实行。我们希望革命者在执行这一任务方面不要落后。

致以

革命的敬礼

邦 委

（负责人）纳吉·雷迪（签字）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于维贾雅瓦达

当前纲领

我们，革命的共产党人，在同修正主义决裂以后，正在为争取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印度革命的胜利而斗争。印度是一个“新殖民地”。我国人民遭受着美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和苏修新殖民

主义的剥削。同帝国主义一起，封建主义也是一股重要的剥削势力。农村地区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民遭受着各种形式的封建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印度革命将分两个阶段完成。今天，我们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这一阶段以后开始。由于这两个阶段是不同的阶段，因此它们的任务也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即大资产阶级，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废除私有财产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制订一项争取我们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一当前任务取得胜利的总纲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总路线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这些基本原则如下：

一、必须消灭具有买办性、官僚性的大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国家，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二、应该废除封建主义。地主的土地应分给贫民和雇农。

三、应该接管工业和银行业中的外国资本、与外资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的资本和官僚资本。

四、增加工资，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和其他福利。消除失业现象。

五、必须保证中等阶层的人能够就业。

六、现有的保卫国家的军队完全是一支雇佣军，应

子解散，成立一支革命的人民军队。

七、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必须建立一个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合作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集团的统一战线。印度应参加这样一个统一战线。

八、国内各民族应享有自决权。

九、各种不平等条约应予废除。我们必须退出“英联邦”。

十、教育、技术和文化应该是反帝反封建的。应该消除中等阶层的失业现象。

十一、应该在完全独立和完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统一。

以这十一项原则为基础的革命纲领将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光有革命的纲领还不够。为了实现这一纲领，我们还必须有一条革命的路线。这是同修正主义的议会道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民战争。这一路线的基本内容就是在农村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包围和解放城市，最后解放全国。革命者的任务是要在印度革命的实践中进行人民战争。

为了争取印度革命的胜利，建立统一战线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统一战线将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合作者大资产阶级而建立的。这一统一战线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由工人、农民、中等阶层和民族资产

阶级组成。我们的统一战线与修正主义的竞选的联合阵线不同，它将是革命斗争和武装的解放运动中的行动的战线。

为了进行人民战争，为了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为了执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于印度革命实践的共产党。今天的革命派必须出面建立这样一个革命党。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党将是与已经脱离印度革命的那些修正主义的党完全不同的。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总纲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都将是适用的。我们正在各地实行这个以人民战争为基础的纲领。我们在将来也将实行这一纲领。这一纲领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解放农村，包围城市，逐步解放城市地区。因此，根据这一点，我们必须既有一个城市地区的纲领，也有一个农村地区的纲领。

在安得拉邦，人民运动在各地处于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组织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斯里卡库兰县的特区地区，人民运动已发展到武装斗争的阶段。在瓦朗加尔县和坎曼县的森林地带，人民运动超出了一般的合法的范围。农民，尤其是无地农民和雇农不仅奋起夺取了林间荒地，而且夺取了地主非法地占有的土地。从这些阶级涌现出来的数以百计的积极分子参加日常的活动。在东戈达瓦里特区，农民们挺

身出来为废除穆塔达里制度而战斗，并且夺取了地主非法地占有的土地。这个运动正在扩大到维沙卡帕特南特区、巴斯塔尔地区、阿迪拉巴德县以及卡林纳加尔县。这些地区都是与上述地区毗邻的。

在某些县，在与林区毗邻的平原地区，在去年七、八月，人民大规模的奋起斗争发展到了从地主那里夺取粮食的阶段。这个形势一直持续到现在。在坎曼和马迪拉地区，在坎曼县以及在瓦朗加尔县贾纳冈区和马努科塔区，人民运动也同样地在继续发展。在纳尔贡达县，这一运动发展到了公开反抗地主的阶段，并且遭到了政府的严重的镇压，但是它正在重新准备起来进行斗争。

我们当前的纲领

在我们这个农民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国家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土地革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将是废除地主制度和把土地分配给耕者。这样农民群众也就从各种形式的封建剥削下解放出来了。有关地主阶级和政府的土地问题主要集中表现为下列形式：

一、地主雇用雇农来耕种他们占有的土地（这是以自耕的名义进行的）；

二、以稻谷或金钱形式向地主交纳地租的租佃土地。有些佃户为地主种地；

- 三、地主的牧场和其他类似的土地；
- 四、地主占有的寺院土地和公益土地；
- 五、政府的可耕荒地或休耕地（其中还包括地主耕种的政府可耕荒地）；
- 六、在林区农民需要耕种的林地。

只有在所有这些土地都分配给无地农民和雇农的情况下，才能解决土地问题。因此，共产党革命派必须研究不同地区的土地问题，宣传分配土地的重要性，并且立即在人民中间，特别是在农民中间进行分配。

应该从现在起通过宣传这个事业来为农民明年迫切要夺取土地的工作作好准备。这些迫切地要夺取的土地从今年六月份起就将耕种。因此，当前立即就有必要就地点、村庄和所应夺取的土地等问题作出具体的决定，同时使农民作好准备。

我们目前必须把主要力量集中于对付人民的主要敌人——大地主。当我们夺取所谓“自耕”地时，我们必须主要是考虑这些大地主。由于一直讨论的问题是分配地主的全部“自耕”地的问题，所以，所分配的也应该是这些土地。

如果无地农民和雇农不准备参与的话，分配所谓“自耕”地将仅仅是一个口号。凡是地主以“自耕”的名义占有的土地，凡是地主从贫农和雇农手中不正当地以低价或以抵债为名霸占的土地，如果本家的人仍然是贫

农或雇农，可将上述土地分配给他们。但是，这样一种分配不应该造成有些人能够得到土地而其他人则得不到土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注意让其他人也得到若干土地。因此，贫农和雇农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土地（其中包括他们已经拥有的土地）。

我们现在把力量集中在大地主的土地上。在分配地主的土地时，很有可能产生最高限额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独立地劳动的中农应有的土地为最高限额。这个限额很可能因地而异。随着土地革命的发展，随着武装斗争的进展，小地主的一些土地也必须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根据土地革命的需要决定应该如何分配和在什么地方应该分配这种土地。必须作好准备查明地主占有的寺院土地和公益土地的位置并估出数量，以便把这些土地分配给贫农和雇农。凡是可能的地方，都必须把这作为眼前的紧迫问题来处理。

一般人民一直不能利用一般的可耕荒地和森林里的大片可耕荒地，因为这些荒地都被地主占据着。应当把上述土地中的可耕地分配给贫农和雇农，其余土地则应由人民接管。

贫农和雇农需要牲口和农具来耕种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因此在分配土地时应把属于地主的牲口和其它农具分配给需要的人。

不论什么形式的放债活动，如纳穆卢债、坎达纳卢

债和诸如之类的东西，都应废除。但是我们必须只集中力量搞那些从事剥削的大地主、高利贷者和富农。如果我们也搞拥有少量地产的农民，一般人民就会得不到信贷的便利。因此我们必须在一定限度内保留人民之间互相借贷的便利，直到解放了的根据地建立起来并且能为公众提供信贷的便利为止。因此，我们可以允许按照合理的利率，即按照银行的利率或那些地区例行的那种合理的利率从事这种互相借贷的活动。

除此之外，无偿劳动、送礼和其它形式的封建剥削，例如不论以任何形式让一般农民连同他们的牲口去给地主耕地，都应废除。我们对农村人民在地主势力的统治之下遭到困难的任何问题都不应该忽略，并且要为此把人民组织起来。我们特别必须集中力量解决被地主统治的村子和人民处于无穷的苦难之中的那些地方的问题，把这些地方的人民组织起来。由于党多年来工作的结果，某些村子里的人民的境况比其它村子的底子可能较好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认定其它村子的人民的境况一定较好一些，如果我们根据这样一种看法就不去组织那些人参加斗争，那是愚蠢的。在特仑甘纳地区，椰酒工人的问题已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政府承包人（他们当中包括当地的地主）进行的剥削很重。由于政府官员们的贪污，椰酒工人一直在吃苦头。我们必须领导他们反对这种剥削的斗争，并且以“椰子树必须归椰酒工

人”为口号。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参加斗争。我们必须在他们当中进行宣传，说明他们的问题在新的人民民主政府成立以后将能得到解决；为了达到上述目标，他们应当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对于各地区的雇农、贫农和中农没有房基之苦，也是这样。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并进行工作。这项纲领必须扩大到安得拉邦的一切地区。我们现在应该决定同各个不同的地区的各种问题有关的纲领。

森林地区：

根据人民战争的方针，森林地区和山区是具有关键意义的地区。这些地区不仅敌人的力量弱，而且也为人民游击队进行抵抗、对敌人进行持久的武装斗争并且在那里建立游击根据地提供了有利的地形。地主、高利贷者和林官们一直以各种方式剥削森林地区和山区的一般人民和吉里江人。这些地区的人民一直很自觉地起来造政府和剥削阶级的反。斯里卡库兰的吉里江人的斗争一直是这一起义的开路先锋。在这个地区里，特别是在瓦朗加尔、坎曼和卡林纳加尔森林区里，具有灌溉条件的大片耕地都在地主手里。这些地主和平原地区的地主的成千成万头牲畜就以森林作为牧场。在这些地区这已成为平常的事。这些地主在畜牧业方面捞到成千成万的卢比。必须展开争取获得政府可耕荒地和被地主占据的类似土地的斗争。此外，应当把肥沃的可耕旱地和有灌溉

条件的“自耕地”分配给贫农和雇农。数以千计的牲口也应进行分配。

从现在起必须为此做好准备。雨季一开始就要开始耕地了。

在下个月，承包人将雇人当苦力去把林产品运出来。因此在下个月就必须大规模地加紧展开苦力的斗争。因此，在四月底以前应当加紧进行人民的各种活动并把它们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在这个期间内，东戈达瓦里县特区在组织吉里江人方面做了许多很好的工作。这个地区一直实行穆塔达里制，作为残酷的封建剥削的一部分，甚至在维扎格特区还存在这种剥削制度的残余。人民应当自己起来采取革命的行动，废除这种制度。

从吉里江农民手中夺来的肥沃土地和果树园仍在地主手里。人们渴望把它们再夺回来。我们必须使它们为占据这些土地作好准备。这个过程必须在雨季一开始就进行。

必须使吉里江农民得到特别的机会来耕作种植PODU所需的土地。从吉里江农民手中夺取这些土地由政府一直在种咖啡和建成其它大种植园。这种种植园问题必须研究。这个问题必须这样来加以研究，就是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把这些种植园加以分配，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为了销售和购买产品而建立的一些公司正在被用来

剥削人民，并用人民的金钱来把官员们的钱包填满。因此，必须废除这些公司，使吉里江人有机会愿意向谁出售就向谁出售他们的产品。

在执行这个纲领时不应歧视非吉里江人。包括贫农、中农和其它贫苦阶层以及吉里江人在内的联合阵线必须建立起来，必须进行斗争。人们必须承认，对吉里江人和非吉里江人的这种歧视只会有助于我们的敌人。这甚至适用于吉里江人自己当中的不同部族。到现在，森林官员和雇工所习惯了的送礼、无偿劳动、贿赂等等，已被全部制止了。这种贪污情况决不容许以任何形式或在任何程度上存在。

平原地区：

在平原地区有两种土地：旱地和水浇地。甚至在今天，地主的剥削以及他们的暴行和威胁还一直在旱地地区继续着。因此，粮食问题已成为很严重的了。可供分配的可耕荒地或休耕地是很多的。完全有机会在象土地、苦力、粮食等各种问题上把人民组织起来，反对地主的控制。

认为平原对于开展抵抗运动是无用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虽然在武装抵抗方面不象森林和其它山区那么有利。在当前情况下，在平原也是可能进行有限的游击抵抗的。要过一些时候才能在这里开始进行不停顿的抵抗。但是，对于靠近森林或邻接森林的地区以及以前进行过

斗争的特伦甘纳地区，进行抵抗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必要在这些地区发展革命运动，以便向森林地区供应必要的干部和其它必需的物资。

水浇地地区：

鉴于这里的社会条件和地理特点，在这些地区没有立即开展游击抵抗的机会。然而，必须从水浇地地区向抵抗地区提供干部、金钱和任何形式的其它援助。必须不停地进行阶级斗争，以反对对这些地区的人民进行的剥削。这些地区必须通过这样的做法逐步地解放。

除了这些地区的雇农对地主的统治进行的斗争以外，我们必须主要集中于雇农和佃农的斗争。必须开展斗争以废除政府的农业社，而把现有土地分给贫农和雇农。在某一地区是有机会进行激烈的斗争，并把这种斗争在土地问题上开展起来的。必须进行研究，以选择有机会开展斗争并为此进行工作的这种地方。

政治宣传：

在执行上述纲领时，必须在群众当中进行宣传，人民是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斗争；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得到解放；人民应当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还必须说明，在这种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和权力要得到保障，只有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只有通过人民战争的道路才能实现。事实上，我们一直未能进行彻底的政治宣传，虽然我们强调必须建立人民的政权，以保卫我们在

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并从剥削阶级的剥削枷锁下解放出来。我们必须比过去更加有力地向人民说明武装斗争和政策。必须详细地向人民说明一直在国内不同地区进行的革命斗争和斯里卡库兰的斗争。除了干部通过讲话进行宣传以外，还必须通过成立地方文化小组的办法对群众进行宣传。

抵制评议会选举——建立村苏维埃

评议会选举定于五月份举行。我们已决定抵制它。必须采取必要的行动来实施这项决定。不应该容许有偷偷地设法挤进评议会理事会的机会。

经验已经证明，评议会理事会不能用来作为人民反对地主制度的斗争的武器。因为事实上，甚至在我们在理事会中占多数的村庄里，地主阶级也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而且，赋税加重了。这有助于加强统治阶级在评议会中的地位。

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向人民解释评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作为统治阶级保持和维护他们的统治的假面具是对这些统治阶级有利的。我们必须说服公众不要参加选举并且使他们抵制这些选举。我们特别要使那些一直支持我们的人不要去参加选举。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主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和组织能力。不容许有、也不应该走什么捷径。我们必须详细说明：这里所牵涉到的问题不仅

仅是人民抵抗选举的问题，而且他们是有出路的，那就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道路就是要进而建立村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我们的农业革命纲领必须在这些苏维埃和委员会的领导下实施；最后一点是，这些机构就是新的人民民主革命国家在农村中的基础。

（评议会的选举现在虽然推迟了，我们的纲领仍旧不变。必须进行广泛的宣传，说明抵制选举的必要性。）

我们必须动员我们正在工作的森林地区的那些村庄中的人民抵制选举。摆在我们的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在这样一些村庄里管理农村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和成人应该召开会议，选出人民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该在同农村生活有关的一切问题上帮助人民。作出的决定必须付诸实施。在平原地区，在我们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抵制选举的那些村庄里，一切县委员会都应作出安排。抵制选举的意思并不是说由革命者进行抵制。只有我们的选民都不去投票才称得上是抵制选举。在抵制选举的村庄里，必须建立由全体人民选出的人民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必须同政府的评议会理事会进行竞争。它们必须作为人民授予权力的委员会进行工作。在村里的一切事务中，它们必须起先锋和带头的作用，并且必须有助于人民。它们必须实施土地革命纲领。

这些委员会必须担负起司法、收税、保护人民等类任务。这些委员会必须注意在一定的阶段负起并完成一

定的任务。在农村地区的斗争采取更高的形式的时候，这些人民委员会将采取村苏维埃的形式。

这些村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将作为统一战线委员会来行事，进行反对选举的工作，发动和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并使这一革命取得成功。由革命者领导并以雇农和贫农为主的这些委员会必须给予那些愿意与我们同路的人以适当的代表席位。随着土地革命向前发展，可以吸收少数人、特别是富农代表参加。

这些委员会必须有明确的阶级观点、政府观点和思想。它们必须使人民理解武装斗争并提高政治觉悟。机会主义者、争权夺势者和富有阶级的卑劣的代表人物不得参加这些委员会。

志愿小队：

当人民着手进行有关抵制选举、粮食问题和森林地区之类的斗争的时候，人民自卫的问题就成了突出的问题。因此，必须组织志愿小队。在斗争已经展开的森林地区必须大规模地组织这种志愿小队。村里的所有青年都应成为这种志愿小队的队员。小村可以每村组织一小队，大村可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必要数目的志愿小队。这些志愿小队应设正副队长各一人。他们应有政治觉悟和铁的纪律。他们应通过选举来任命。为了自卫，一般志愿小队队员可利用当地所能得到的任何武器。如果找不到任何武器，甚至也可以使用木棍。

这些苏维埃必须协助人民委员会实施其决定。在武装军警前来袭击的时候，它们应该向人民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

不仅在有苏维埃的村庄里应该组织志愿小队，而且在有人民委员会的村庄里也应组织志愿小队。只有在有志愿小队的情况下，人民委员会的活动才会越来越加开展。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才能付诸实施，人民才会对委员会产生信心。

我们必须不断地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对志愿小队进行我们的政治纲领、政策、人民战争的道路和当前政治情况等方面的教育。地方党应当为此作出安排。

地方小队：

在我们着手执行我们的农业革命纲领的时候，政府武装警察的进袭活动就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得不进行抵抗。为此，除了正规小队以外，我们还需要建立地方小队。这些小队可以根据地方防务需要的情况由七人组成一小队，他们可以配备箭、矛或斧头。

地方上的敌人一看见人民和志愿小队就自然感到不安，而他们看见地方小队就会更加感到惊慌不安。这些地方小队将可用于打击人民和志愿小队不能对付的人民敌人。这些地方小队可以领导人民袭击地主。他们可以给正规小队以必要的帮助。必须对他们进行良好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

群众组织：

在实行我们的土地革命纲领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在更大规模上把群众组织和动员起来。必须让他们参加农民协会。但是这里必须指出，我们必须设法避免再发生过去所出现的印刷会员名册和收会费的做法。他们愿不愿意参加村人民会议，必须通过举手的办法来决定。那些愿意参加的人必须吸收进来。不要吸收地主参加。这样参加的人将选举产生人民委员会和村苏维埃。

如能召开妇女会议并把她们组织起来，那就更好了。在有女同志的地方，这个工作将是比较容易的。她们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必须与男子一起战斗，为了进行这场斗争必须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吸收妇女参加他们的组织。必须逐渐地吸收她们参加志愿小队、地方小队和正规小队。在那些存在着残酷镇压和条件不利于公开吸收人民参加群众组织的地方，干部应当挨家挨户地秘密吸收会员。

加紧进行人民的活动：

下个月我们必须要在森林地区和平原地区加紧进行我们的活动。除了加紧开展各种活动和建立村苏维埃及人民委员会以外，我们还必须准备在五月份以前对地主阶级发动反击。我们必须在这些人民的活动发展到了高潮的时候实行我们的土地革命纲领。为此，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作好准备。

扩大到新的地区：

目前，我们正在把我们的运动稍稍扩大到与森林地区邻近的地区去，但是速度非常缓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干部不足。

我们必须很快地把与东戈达瓦里县相邻的维扎格特区的人民组织起来并且把工作扩大到巴斯塔尔地区。我们必须要在坎曼县和瓦朗加尔县内现在仍然是空白点的居民中心和地区开展工作。我们必须要在卡林纳加尔县和阿迪拉巴德县加紧活动。革命组织已经开始在这些地区进行活动了。

现在正在准备在马哈布纳加尔县开展人民的运动。

在拉亚拉西马县，我们召开了一次主要县级干部的会议，决定加快进行反对地主的斗争。正在为此进行准备工作。

我们还必须准备好在其他县也加紧活动。

城市工作：

虽然革命组织一直在城市进行工作，但是我们并没有集中力量在城市进行工作。虽然森林地区在实际行动中是重要的，但是放弃城市不管是错误的。对于我们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城市工人阶级的帮助是需要的。在物资供应方面，我们需要运输工人的帮助和其他工人的其他技术上的帮助。在我们的城市工作中必须相当重视学生的运动。现在的学生和青年受到革命思想的鼓舞并且

受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这是很自然的。

你们知道，先解放农村，后解放城市是我们的人民战争的道路。一方面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为达到此目标而在城市里开展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彻底挫败我们的敌人镇压现在的武装斗争的计划。我们还必须使党和人民作好解放城市时夺取政权的准备。我们必须抱着这样的观点来计划我们在城市里的工作。

支持斯里卡库兰的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一直在斯里卡库兰进行着。我们将另发文件，详细说明那里的运动的发展情况以及在运动进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我们必须吸取斯里卡库兰运动的经验。我们还必须设法避免重犯那里的运动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我们必须仔细地注视和研究在那里进行武装斗争的同志们的经验，并且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必须向从事那些斗争的同志们提供我们的经验。

我们不仅必须支持斯里卡库兰的武装斗争，而且还必须反击敌对阶级对它进行的诽谤宣传。

使革命组织严密起来

为了实行上述纲领，并通过它来发展革命运动和领导农民的武装斗争，我们需要有最严密的、经过锤炼的

组织。虽然目前我们邦和县一级的革命委员会都是以协调委员会的名义在工作，但是它们一直都是作为党委会的活动，常常都是以多数作出决定。

我们——革命派和我们的委员会——是继续象目前这样作为协调委员会工作呢，还是要建立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基础的党组织呢？这一直是大家讨论的问题。

我们的活动不可能具有革命的特性，因为以协调的名义进行的这些活动缺乏集中和纪律。在那些保持了纪律和作为党委会进行活动的地区，革命运动就已初具规模，并且正在取得进展。而由于我们在其他地区的活动仅限于进行一些讨论，因此还没有具有人民运动的性质。鉴于这些经验，我们的革命协调委员会决定采取步骤建立一个党组织。

根据这一决定，正在进行斗争的地区建立党组织。委员会正在决定谁应当成为党员。已经按地区和区域建立了党委会，以便使党积极活动起来。正在进行准备工作，以使所有的单位都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活动。

在瓦朗加尔县和坎曼县的贾纳甘、穆卢格和坎曼都已建立了地区委员会并已进行活动。我们必须加强这些委员会，以便开展工作并领导革命斗争。除此之外，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行动使各县的一切单位都能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有助于建党的条件。

我们必须采取这些行动，使革命运动能够再向前迈进一步。

应该承认那些人为党员，这已成为一个问题。我们所有的干部都接受人民战争这条道路。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行动是否符合这一道路？我们在决定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深入考察每个同志从我们在进行斗争的地区开始工作之时到今天的一切活动，然后据此决定谁应该有党籍，谁不应该有党籍。对于那些缺乏阶级观念和有胆小、自私和无政府主义毛病的人，不应给他们以党籍。这样的人应该排除在外。

有党籍的那些人不一定要是专职的党的工作人员。但是当发生镇压时，他们应准备转入地下。那些不是专职人员的党员身份必须保密。

我们必须切实做到，党员能通过他们的有理想的生活和他们的革命工作而成为村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正规小队、地方小队和志愿小队的领导。

为进行武装斗争作好准备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完成上述的政治宣传、动员群众和其他组织方面的活动，为在即将到来的雨季中进行武装斗争作好准备。雨季一开始，我们可以开始执行分配土地的计划，这是我们的农业革命中的主要项目。我们必须把游击斗争同这个计划配合起来，这将使这一斗

爭具有广泛的、强有力的群众基础。雨季为进行抵抗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气候。如果我们进行土地分配，并且一方面建立村苏维埃，另一方面又开展抵抗运动，这种形势将加强革命运动，从而使革命运动能顶得住任何攻击并且能进一步取得进展。同志们应该记住这一点，向前迈进。

作为这些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在夏末以前把人民联合起来对地主进行斗争是很重要的。这种动员将有助于发动武装斗争。

同志们，

今天存在着实现上述纲领的有利条件。统治阶级在革命者的活动面前摇摇欲坠。因此他们正在采用残酷的镇压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自满的表现都是不能原谅的。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解放运动正在世界各地兴起，奋起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其它反动势力。甚至在泰国也已经沿着人民战争的道路开始了解放斗争，并正在取得进展。

在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在击溃修正主义之后一直不断地在前进。

关于安得拉邦武装斗争的声明

安得拉邦革命派共产党委员会一九六九年七月五日到七日举行了会议，研究了现在正在该邦进行的武装斗争的情况，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在安得拉邦，在共产党革命派的领导下，农民武装斗争已经开始了。

“安得拉邦的农民，特别是瓦朗加尔、坎曼、卡里姆纳加尔、纳尔贡达、东戈达瓦里等县的农民，不久以前进行了争取实现他们的正当要求的斗争。森林承包商掠夺他们，高利贷者剥削他们，地主把他们从他们耕作的土地上赶走。所有这些人联合在一起，对农民进行各种剥削和蹂躏。政府支持这些剥削者和暴徒掠夺农民。

“由于共产党革命派在群众中进行活动的结果，农民现在有了反对这种剥削的觉悟。特别是吉里江地区的劳苦的吉里江人已经团结起来。他们现在已准备为反对这种剥削而斗争。地主和森林承包商雇用的暴徒袭击了准备为实现自己的正当要求而斗争的群众。但是，群众给了他们应得的教训，把他们赶走了。这时，政府的武装部队就前来支持暴徒们。现在他们正在逮捕积极分子和群众并拷打他们。他们每天都在向积极分子和群众开枪。

“在这种形势下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正当要求，于是吉里江地区的群众就拿起武器，起来保卫他们发动的运动和他们迄今已经取得的成果。他们现在就是这样地在进行武装斗争，保卫他们的革命运动和这个运动的成果。他们耕种被地主占有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以及林区土地，以这种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他们把剥削者赶走，把自己从这些人的剥削之下解放出来。对于吉里江的农民来说，这些都是不小的成果。当政府武装部队企图剥夺这些革命成果，镇压有组织的革命运动的时候，吉里江人就必然要用武器来保卫这些革命成果和革命运动。

“安得拉邦革命派共产党委员会向正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吉里江农民致敬。它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些武装斗争，并且为武装斗争的彻底胜利而努力。

“在印度，各种帝国主义者、大地主以及同他们站在一起的大资产阶级是主要的剥削者。现政府保护这些剥削者。过去二十年来，印度人民为了摆脱这些阶级的统治，一直在进行斗争。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对我们说，议会道路是他们进行斗争的方法。

“群众已经明白了所有这些欺骗手法。他们已经认定，选举和其他议会活动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能改变现有的制度。因此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展开了斗争。

“纳萨尔巴里武装斗争具有同样的性质。斯里卡库兰的武装斗争也一样。坎曼、瓦朗加尔、卡里姆纳加尔三个县的农民目前进行的武装斗争是为了保卫革命运动及其成果，也是为了改变现有的制度。

“一九四六年——五一年的特仑甘纳武装斗争是为了把印度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进行的一次人民革命斗争。毫无疑问，那次斗争的理想、目标和经验将为当前的斗争指明道路。

“我们要明确指出，共产党革命派将领导印度的革命斗争，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大资产阶级，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它指导中国人民在他们的伟大革命中取得了胜利）应用于印度的实际，并在它的光辉照耀下取得印度革命的胜利。在这个解放斗争中，人民群众必胜。

“在这种形势下，有些人组成一些集团，在同群众运动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袭击地主和其他剥削者。我们要明确指出，在同群众革命运动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袭击不能有助于我们推翻封建主义，把群众的革命运动推向前进。只有通过群众的革命集会、革命的组织工作和群众的武装斗争，我们才能推翻现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全都教导我们只能有这样一条真理。一切革命派都应该毫无保留地遵循这个教导。

从这个角度来看，必须指出，这些集团进行的这种袭击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为了印度革命运动的发展，这些集团必须放弃这条错误的路线，必须努力执行正确的路线。

“共产党革命派必须努力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人，在国内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将领导这个统一战线。除了工人和农民以外，中等阶层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将参加这个统一战线。我们必须通过这个统一战线努力工作，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我们相信，那些胸怀国家利益的人将同这些革命派一起进行这种光荣的工作。

“让我们踏着在特仑甘纳和其他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无数先烈的血迹前进吧！让我们献身于他们的理想和他们的目标吧！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负责人纳吉·雷迪（签字）

我们也必须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我国，我们也必须在人民战争的道路的基础上把土地革命推向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前进。

毛泽东思想万岁！

农民的武装斗争万岁！

关于斯里卡库兰县吉里江人 武装斗争的报告

前 言

同志们：

今天在斯里卡库兰县，武装斗争正在进行。在革命派中间目前正在讨论着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我们的邦委员会想就一些与这个运动有关的问题作一些说明，因此提出了这个报告。我们希望同志们研究这个报告，得出清楚的了解。此致

革命的敬礼

安得拉邦革命派共产党委员会
负责人纳吉·雷迪（签字）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于维贾亚瓦达

关于斯里卡库兰吉里江人的武装斗争

在斯里卡库兰县的各吉里江人地区，在共产党革命派的领导下，吉里江人的武装斗争在十一月份的最后一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开始了，现正在继续进行。

斯里卡库兰县委员会不断宣传，邦协调委员会的领

导方面反对武装斗争，因此他们就同全印协调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不用说，这种宣传完全是出于不良的动机。我们现在特向同志们提出这个报告，说明武装斗争开始以前的情况、这个运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县委会和邦委会所采取的态度。

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形势

斯里卡库兰县位于安得拉邦与奥里萨交界处的一端。在这个县内的大约八百平方英里的地方，住有二十万左右的吉里江人。虽然在当中夹有平原地带，整个这个地区都是同奥里萨的吉里江人地区相毗连的。在这些山地里有几条公路。在同平原相毗连的地区，非吉里江人同吉里江人住在一起。

那些从平原来的定居在山地的人成了商人，并且靠放债变成了地主和大高利贷者；他们剥削吉里江人。跟这些剥削者一道，乡村负责人、林官、吉里江福利局负责人员——一切有机会的人，都成了剥削者，他们剥削着吉里江人。

对吉里江人的剥削采取下列几种形式：

一、放债：

为了还清债务，吉里江人不得不把谷物、其它农作物和林产品低价卖给这些放债的人。

二、占有吉里江人的土地：

那些不能还清债务的人不得不把土地抵押和出卖给放债的人。

三、剥削雇农：

吉里江人不得不在这样被地主占去的土地上当年工和日工，取得微少的工资。

四、买卖林产品：

公司负责人员、高利贷者、放债者以低微的价格购买吉里江人的林产品，运到外边去出售这些林产品以牟取暴利。

五、林官的剥削：

这些林官阻挠吉里江人在森林里种植 PODU 和采集林产品。然后他们就要贿赂、MAMUIS 和无偿劳动。

大资产阶级——地主政府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保护这些剥削者。这个政府步英国统治者的后尘，它只是促使那时盛行的那种剥削更为加重了。这个政府没有消灭这种剥削。例如，我们可以指出一点：这种剥削甚至是违犯今天还流行的一九一七年条例的。

为了反对这种剥削，吉里江人在一九五九年以前经常举行暴动。一九〇〇年在萨卢尔特区，曾经发生过一次反对英国政府的暴动，英国政府镇压了这次暴动。一九四六年在帕瓦蒂普兰特区，在当地人的领导下发动了某种骚动。当最后吉里江人占据土地的时候，这个领导集团背叛了他们，让政府的官员和警察任意摆布他们。

政府采取了有利于地主的行动，对吉里江人提出了几起控告，把他们拖到法庭，渐渐地镇压了这次斗争。

共产党革命派领导下的吉里江人运动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七年)

从一九五九年起，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吉里江人组织，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几次反对各种剥削（如上所述）、暴力行动和不法行为的斗争，吉里江人取得了成果。这些斗争是以如下十点要求为基础进行的。

一、在这个特区，非吉里江人从吉里江人手里非法夺取的所有土地应当归还给吉里江人。

二、立即把可耕荒地分配给吉里江人。

三、以各种非法的方法日益加重的一切债务应当取消。应当提供资金供应的便利条件。

四、应当向吉里江人供应农具和牲口，以从事农业劳动。

五、应当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吉里江人的林产品。应当以公平的价格向他们供应消费品。

六、对那些从吉里江人身上榨取无偿劳动的人应当给予严厉惩罚。

七、年工的薪水和雇农的工资应当按照生活费用来确定。

八、不应当限制吉里江人使用森林的木材来修建住房和满足日常的需要。

九、在上述计划实行以后所会创造的新气氛中，应当大规模地安排教育方面和文化方面的计划。

十、应当宣布吉里江地区为自治区域，这个地区的行政管辖权应交给吉里江人的代表。

如果我们根据上述要求逐项来看，吉里江人通过他们的斗争取得了如下的成果：

一、从一九五九年这一年起，吉里江人逐渐地重新占有了被非吉里江人、高利贷者和地主非法夺去的土地。他们还已经开始耕种这些土地。到一九六七年，这样占据的土地大约已有六百到七百英亩。

二、直到一九六七年，吉里江占有和耕种了大约一千五百英亩的森林荒地。

三、直到一九六七年，他们已拒绝偿还大约二十万卢比的债务。

四、他们免费得到木材供农业上使用。

五、甚至在开始时，他们就在每周一次的集市上出售林产品，从私商和政府公司那里得到合理的价格。

六、无偿劳动已完全取消。

七、年工和日工的微少的工资增加了。年工的工资从每年六袋增加到十四袋至十五袋。日工的工资同样也增加了十一倍。

八、可以免费取得森林的木材供修建住房和日常需要之用。

九、在实行上述计划的时候出现了群众运动的高涨。干部利用这个形势，通过文化计划、夜校和经常向他们读党的刊物等办法来提高吉里江人的政治觉悟。

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后，吉里江人才能建立他们的自治区域。当前进行的武装斗争的目的就是要争取这样一个革命的胜利。

共产党革命派提出了这些问题，在广泛的基础上建立了吉里江人的组织，并且在吉里江人的运动中起了领导带头作用。他们进行了政治宣传，说明土地和建立自治区这样一些重要问题只有在建立人民政权（新民主主义国家）取代现在的大资产阶级国家以后才能得到解决。

在组织方面，建立了吉里江委员会和党组织。由于吉里江干部和那些来自平原地区的干部进行了不断的努力，在所有上述这些问题上都把群众动员起来了。

作为他们的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吉里江干部作为县的干部的一部分接受了有关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及其经验的教育。在这个时期内有一个过错：没有广泛宣传人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夺取政权的必要性。

一九六七年和以后的情况

在一九六七年雨季开始时，吉里江人的运动发展到

了一个新阶段。已经收回他们的一些土地的吉里江人，又占据了地主拥有的八百多英亩土地并开始耕种。他们还耕种了两千五百英亩的森林荒地。由于粮食严重不足，人民就阻止地主和高利贷者向区外输出谷物以挣得较高的价格。在吉里江地区贮存了足够的谷物。甚至价格也降低了，商人不得不以两西尔一卢比的价格出售大米。因此，他们甚至解决了严重的粮食问题。

通过这种做法，实行了土地分配和谷物分配（这些都是土地革命纲领中的重要项目）；而这又促使群众运动更加高涨了。人民开始大规模地参加这些活动。吉里江人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地主被群众运动的高涨吓坏了。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地主和他们雇用的暴徒对前往参加区吉里江人会议的一些代表进行了伏击并野蛮地殴打他们。这些受害者里也有妇女。当人民前来支持被打的代表们时，地主开了枪，杀害了两名吉里江积极分子——芒甘纳和科兰纳。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叫莱维迪的村子里。这次开枪事件是说明这一斗争已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一个例证。

虽然这次开枪事件在吉里江人中间暂时引起了一种受挫和失望的情绪，但是在举行公众集会追悼这些烈士的时候群众又动起来了。在吉里江地区各地也举行了数次集会来追悼这些烈士。在这些追悼会上聚集了許多人。这种团结并没有到此为止。我们的纲领中又有了一

些以前只是停留在宣传阶段的项目现在已经付诸实施了。

吉里江人除了收割自己的土地上种植的庄稼以外，还占有了仍在地主手中的土地上准备收割的庄稼。他们把这些庄稼运到他们自己家里。他们拒绝支付并且废除了欠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债务。这样被废除的债务合计达三十万卢比左右。他们把地主的牛羊拿来在他们自己中间进行分配。因此，除了分配土地以外，还实行了废除债务的计划。

群众不论到哪里举行示威都带着他们的大斧头、弓箭和土枪，这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了。

这种情况继续到二月二十日。应该对谋杀事件负责的地主暂时逃跑了。警察营地没有增加。警察也没有进行武装袭击。人民利用这个机会尽可能地贯彻执行了革命的纲领。他们感到他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村里的一切事情都由吉里江人组织来监督管理。党和吉里江组织的一切决定都在付诸实施。

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解放》月刊却写道，“甚至在地主们于一九六七年十月蓄意杀害了吉里江组织的两个积极分子以后，在群众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达到高潮的情况下，却不允许群众起来反对他们的敌人。”（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号，第三十九页）。县委员会在报告中也作了类似的描述。

这番话的含意是很清楚的：当人民在前进的时候，领导却拉他们的后腿。但是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领导（无论是当地的领导还是上级领导）在人民在前进的时候拉他们的后腿这种事情一次也没有发生过。不论哪里的人们采取行动，同志们都起来带头。人们占据了地主的土地。他们占有了地主的庄稼。他们带着武器举行示威。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同警察发生的冲突中，人们使用了武器。既然实际情况是这样，说什么领导不让群众前进就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指责。这不是一种真诚的批评。

从二月二十日起，随着特别武装营地的建立，警察开始采取行动了。他们在二十四日发出警告，要人们交出武器。虽然邦武装警察在这个地区来回活动，但是在二月底以前没有进行任何袭击。

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会在六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举行了会议。这次会议注意到警察即将进行袭击。会议决定决不交出武器，特别是枪支；人们应该预防被捕；如果有人被捕，人们应该设法营救被捕的人。

三月三日，警察开始了大规模兜捕。那天对布尔贾古达（西塔姆佩特）进行了袭击。凌晨，武装警察包围了这个村子，逮捕了大部分村民，强奸了一些妇女，到老百姓家中进行抢劫，把鸡鸭羊群和其他动产都抢走了。武装警察在后来的各次袭击中都采取了同样的做

法。

三月四日，对佩达卡尔贾（帕瓦蒂普兰特区）进行了袭击。老百姓从村里撤到了附近的小山上。警察向老百姓开火。老百姓进行了回击。但是由于老百姓只有土枪，警察没有受伤。但是有两个吉里江人被警察开枪打死了。

在这次开枪事件发生后，人民的士气低落了。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一点：虽然武装警察进行了大规模的袭击和严厉的镇压，如果我们在组织上作好了准备的话，本来是可能再进行一些抵抗的。由于我们没有准备，警察一开始袭击，我们就慌乱了，没有进行自卫，也没有保护不动产。这些事件完全证明，当政府进行武装镇压时，就应该尽可能进行武装的反抗。

邦协调委员会同斯里卡库兰县委会的分歧

在邦委员会（马克思主义）从三月九日到十一日举行会议时，成立了邦协调委员会。这次会议认为特区的抵抗问题应该在同县委会讨论以后再决定。

因此，县委会在三月底（从二十九日起）举行了会议，讨论了这一运动面随的问题。到那时，除了几个地区以外，在这个区域的其余地方，武装警察的袭击继续进行得很凶。所有重要的领导人都离开了这个特区。邦武装警察和暴徒们把老百姓的粮食和动产抢劫一空，因

此食盐、粮食和布的供应成了严重的问题。警察和暴徒把老百姓采集的打算出售的林产品也抢劫一空。于是老百姓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卖了，他们勉强维持这一年余下的日子所需要的现钱全都没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人民进行抵抗的问题没有作为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而食盐、粮食、衣服和农具的供应问题则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那次会议上提出来讨论了。根据邦委会代表们的意见，县委会决定安排上述物资的供应工作，重新建立干部与群众的联系，保护余下的武器，并且作出安排，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游击训练。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同游击斗争有关的一些问题。作出这些决定是由于考虑到：我们应该组织小队，进行训练，并且作好准备，以便在群众再次行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斗争。因为现在已经是三月底了，所以训练工作必须在四、五月份完成。一等雨季在六月开始，我们就可以开始为夺取地主的土地而进行斗争，我们的武装小队就可以抗击进行压迫的邦武装警察和暴徒。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土地革命的土地问题同游击斗争协调起来。我们的理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能够进行稳定而持久的武装游击斗争。因此，武装斗争是否要进行下去的问题，并没有在邦协调委员会和斯里卡库兰县委员会之间发生。在这个问题上，根

本沒有分歧。

但是在讨论当中，有两个问题提出来了。第一、为了开始进行游击斗争，是否有必要进行最低限度的军事训练？第二、是否能够甚至在群众还没有动起来的时候就开始进行武装斗争？

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得出结论：为了开始进行游击斗争，最低限度的军事训练是必要的，农民应当在所需要的程度上行动起来，以参加游击斗争。在进行讨论后，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在开始进行游击斗争以后人民才会行动起来的想法是错误的。

象县委会所宣传的那样，说邦委员会没有对当地人进行训练，而是把他们带到远处去，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宣传也是完全不真实的。在一开始就作出安排，对当地人进行训练。但是县委领导人自己得出结论说，由于敌人集中在这个地区，这是办不到的。由于没有其它办法，就把他们带到远处去了。

现在县委说，在训练中所学到的东西是无用的。如果他们由于反对邦协调委员会而拒绝利用所学到的东西，那是另一回事。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特仑甘纳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不去利用他们的人来说是无用的。对于利用这些经验的革命者来说，每个斗争中的经验都是有用的。甚至今天，县委也有必要设法利用它们。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作出了另一个决定。甚至锡坦贝特和帕尔瓦蒂普兰特区合在一起也是非常有限的。这个地区完全为公路所包围。如果发生来势很猛的袭击，各小队将不可能全部留在这个地区（特别是在夏天）。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个运动扩大到这个县的其它特区，也扩大到奥里萨的那些特区。

按照这些决定，领导同志再次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保持联系，在他们当中开始展开工作。他们前往一些吉里江人地区，为扩大这个运动而工作。但是，关于游击训练的決定沒有立即执行。县委沒有为此作出必要的安排。因此，邦委会不得不进行干预，在完成所有的安排方面就有了一些拖延。

布德万全会是在四月初举行的。在安得拉，共产党革命派对党（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造了反，退出了这个党。斯里卡库兰县委立即从十六日起开会。

在这次会议上，县委的一些同志批评邦领导沒有在布德万全会后立即退出党，而拖延到六月才退出。有一种看法认为，同志们本应单独地退党，而不是由领导发出造反的号召，因为这会破坏我们要成立的党的纪律。所表示的另外一种意见是，所有这些事态发展象“新瓶装旧酒”。但是邦委会的代表明白表示，在团结党内所有革命派方面有些拖延，因此沒有在布德万全会后立即退出；他们关于纪律的那种形式主义的态度是错误的；在

通过革命运动建立一个新党的过程中，革命纪律将要建立起来；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新瓶装旧酒”，这是错误的，所有这一切都将在实践中加以证明。

同志们报告了吉里江地区的群众的情况。他们解释说，人民还没有克服他们的失望情绪，还没有可能在耕种地主土地的问题上采取行动，而且不论我们在哪里采取行动，警察就进行袭击。

根据邦代表的意见，县委决定作出安排，对所有那些领导游击斗争的人们进行游击训练，使本地的男女战斗人员作好使用手榴弹、弓箭、长矛和其它土造武器的准备，并指导吉里江人使用这些武器在邦武装警察和暴徒进行袭击、抢劫和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进行抵抗和自卫。邦代表说明，为了开始进行正规的游击斗争，群众在一定程度上行动起来是必要的，必须等到群众在土地和作物等问题上行动起来以后再开始。在这一点实现时，县委就应通知邦协调委员会，协调委员会将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关于这一点，当时决定一方面进行武装抵抗，一方面则准备进行更高形式的正规游击斗争。

按照这些决定，对一批重要的积极分子进行了游击训练。由于一些不可避免的原因，在完成对第二批人的训练方面，有一些拖延。当时收集了一些弹药以供当地武装抵抗之用。但是还没有为抵抗作好安排。

实际情况既是这样，县委说邦委会反对武装抵抗的

这种宣传就是不真实的了。邦委会一方面提出了立即进行斗争的计划，另一方面为立即开始长期游击战进行准备。为了否认这一点，县委就采取了散布谎言和假话的办法。

而且，为了批评邦委会领导，他们甚至诋毁这个运动及其性质。请看他们在同期《解放》月刊所写的下面一句话：

“整个说来，这个运动并未超出民主的内容。”

这是不正确的。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并耕种它，举行大规模的武装示威，在一两个抵抗事例中使用了武器——所有这一些都说明了这个运动的革命性，而不是说明它的民主内容。

在另一次，他们把这个斗争同湖南农民运动相比，并说，这里的运动没有超出民主的性质——难道这不是诋毁这个运动吗？

他们还写了下面的话：“在地主和警察进攻的情况下，新修正主义者总是说，我们的政策应当是揭露统治阶级和扩大斗争地区的政策。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前和以后，这种态度基本上没有改变……出现了混乱和动摇，虽然只是在短暂的时期内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新修正主义分子就是以这一运动没有扩大作为推迟武装斗争的借口的。但是，指责邦协调委员会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那是没有根据的，邦委员会

只是到五月份才开始直接同县委会交涉。那时，大部分袭击已经过去了。从那时起，它就着手准备武装斗争了。它之希望扩大这一运动只是作为这种准备工作的一个部分。凡是我們贯彻执行了这些决定的地方，我们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凡是沒有贯彻执行这些决定的地方，我们就毫无成效。

不仅是《解放》月刊而且县委会发表的报告也进行了这种骗人的宣传。

在通常情况下，任何一个党组织为了作好这些安排不得不克服许多困难。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开展武装斗争，我们必须克服的困难就更多。正当需要县里和邦里的同志齐心协力共同来克服这些困难，准备进行武装抵抗和正规的游击斗争的时候，县里的同志们沒有把力量集中在这方面，而是同全印协调委员会建立了直接的关系。即使在那时候，这个县委的一个文工队的一位同志和领导人不论到哪里进行文艺演出，都要进行反对邦协调委员会的宣传。他同文卡塔拉特南集团联系和合作，这个集团的中心设在贡土尔县，在各县有分支机构，它以“声援纳萨尔巴里农民解放斗争委员会”的名义进行反对邦协调委员会的活动。

现在还必須向同志们指出另外一点。从邦协调委员会一成立起，它就沒有加入全印协调委员会。全印协调委员会发表了邦领导提交布德万全会讨论的文件之一，

并加了一个按语，指出对它的一些基本分歧。这是他们公开发表的。我们想了解他们这样做的动机然后再同他们联合。为此，邦协调委员会同他们直接举行了会谈。甚至在会谈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全印协调委员会的一位代表就访问了贡土尔，把同邦协调委员会讨论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文卡塔拉特南集团，并指示他们协调邦内革命派的工作。就这样，他们在整个邦的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反对邦协调委员会的宣传。他们宣传的要点是，新修正主义者的政策同邦领导所推行的政策并无不同之处。

就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县委会在九月份的第三周举行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些县委会领导人说，从根本上来讲，邦协调委员会走着新修正主义者的道路并且反对武装斗争；他们甚至于说，这些就是我们不在斯里卡库兰的吉里江地区发动武装斗争和不参加全印协调委员会的政治动机。出席那次会议的邦代表对他们的批评所作的答复并没有使他们信服。最后，县委会通过了下述关于武装斗争和加入全印协调委员会的决议。

关于武装斗争：

“警察又开始袭击了。从邦武装警察在六月份撤走以后，这些活动又从八月份的第二周开始了。在这个期间，我们的干部同群众接触，向他们说明了形势，揭露了政府的欺骗性诺言。人民的热情激发起来了。这次，

他们表示，他们应当战斗，而且已经准备好进行战斗了。但是，他们认为我们的领导（小队）应当到他们中间去。干部也是热情很高，这次他们强烈地认为要准备好进行斗争。

“我们的干部到人民中去作宣传解释工作。警察的袭击就在这样群情激昂的时候开始了。地主的打手们在那些向警察屈膝投降的人的帮助下进行袭击。抢劫财物、殴打人民以及强迫他们泄露积极分子的去向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在这种形势下，人民表示愿意抵抗这种袭击。但是，他们认为这次的抵抗应当是武装的抵抗。在最早的那几次袭击中，我们退却了。那时，我们对人民和干部说，我们正准备进行更高级形式的斗争，不久就将进行抵抗。情况相似的袭击开始了，但是我们却未能按早些时候所作的保证开始进行抵抗。因此人民和干部就渐渐不相信我们了。如果我们再迟迟不行动，我们就有脱离人民的危险。干部的情绪非常低落。所以我们县委会要求作出立即开始进行武装斗争的决定。

“目前，我们可以使用手榴弹、土枪和弓箭。我们想在警察袭击时使用手榴弹并把手榴弹分发给战斗人员。武装小队应当帮助人民。

“从三个宣传小队来看，目前，我们每个小队有八个人。除此以外，还有八十六名战斗人员。可以把他们

组织成武装小队。

“邦委会有必要给予技术援助。我们要求很快作到这一点。”

（上述决议系一致通过的。）

在县委会的讨论中，正如这项决议所说明的，对于群众是否有任何行动是不清楚的。而且，他们还说，要群众行动起来还得花两年功夫，那时大选就要举行了，而正是为了要参加选举，邦委员会才以群众没有行动起来作为推迟武装斗争的借口。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同志提出的这种指责是多么没有根据了。如果我们贯彻执行了上次县委会议（六月份举行）的决定，现在就没有必要通过这项决议了。那个决定里就已经提出要用手榴弹和弓箭抵抗警察。他们本来应当检查他们在执行这一决定方面做了多少事。就好象过去没有作过这类决定似的，现在他们又通过了上述决议。这对武装斗争不会有好处。在上次县委会议上已明白指出，如果群众开始就任何一个问题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就将决定开展正规的游击斗争，以前用手榴弹和弓箭进行的那种武装抵抗只会有助于这种正规的斗争。如果以前就组织了武装抵抗的话，用游击小队开展正规游击斗争就不需要化很多的时间。

有人说，邦委员会不许使用火器，只有在非常必要的时候才许用榴弹和弓箭等等，这种说法完全是不真实

的。县委会当时同意了邦代表提出的关于用手榴弹和弓箭不断进行武装抵抗的计划的意见。使用火器是军事训练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我们认为军事训练一完成，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们。但是并没有禁止使用火器。

第二项决议：

关于加入全印协调委员会：

“在国内，纳萨尔巴里的同志们站在前列，开展了党内的意识形态斗争。他们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新修正主义分子的叛徒面目。他们首先高举造反的大旗，运用毛泽东思想，为所有的革命者指明了道路。他们在十二月份曾向尚未与新修正主义分子决裂的同志们说过：

‘我们号召仍在印共（马）中的革命的同志们公开摈弃新修正主义的领导集团和政见，公开同正在为在我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而奋斗的我们携手合作。’

“在五月份，各个邦的革命派又组成了‘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要求尚未与新修正主义集团决裂的同志们和分成不同集团的同志们加入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他们明白地指示，所有的革命派都应该认识到不同集团的存在对印度革命运动的危害。由于发出了这两次公开的号召，许多邦的共产党革命派协调委员会加入了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但是，我们安得拉邦协调委员会却没有参加。县委会认为，这是一种十分令人遗憾的态度。

“县委会赞同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在十二月到五月期间发出的号召，并同意加入全印协调委员会。我们希望，邦委会将赞成全印协调委员会的号召并加入这个组织。”

有人就这项决议提出修正案，建议删去“它（县委会）同意加入全印协调委员会”这一句话，因为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要直接参加全印协调委员会而不再是邦协调委员会的组成部分，这样做不合正常的手续。这项修正案以四对三票被否决。

就这样，通过他们的文章和行动表明，迟迟不参加全印协调委员会的原因是由于全印协调委员会同安得拉邦协调委员会在意识形态和组织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关于这个问题，邦委员会认为，只有通过直接的会谈，说明双方的观点才能促进革命派之间的团结事业，到那时，再加入全印协调委员会。邦委员会当时继续同全印协调委员会进行讨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曾向斯里卡库兰委员会作了报告。

所谓在县委会通过这项决议的时候各个邦所有的革命派都已加入了全印协调委员会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在孟加拉邦本身就有五个团体没有参加。在喀拉拉邦，科萨拉·拉马达斯和K·P·R·高普兰的团体也没有参加。在泰米尔纳德，有一个团体没有参加。甚至连克什米尔的组织当时都没有同它发生联系。所有这些同志都

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为了团结起来，他们正竭力在互相了解和同全印协调委员会进行讨论。现在已经很清楚，不仅是安得拉协调委员会而且其他邦也有同志想要通过讨论来在各种问题上求得明确的了解，以便参加全印协调委员会。

不仅如此。县委会在这项决议中没有任何一处提到他们要加入全印协调委员会是因为安得拉邦委员会反对武装斗争。他们对安得拉邦协调委员会没有参加全印协调委员会表示遗憾，然后又说他们在赞同全印协调委员会的号召以后打算加入全印协调委员会。

同样，虽然县委会隐瞒了主张进行武装抵抗的六月决议，但是他们又要求准许发动武装斗争。一方面参加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一方面又要求准许进行武装斗争，这是相互矛盾的做法。然而，它还是要求邦委员会准许并给予技术援助；邦委员会相应地作出了决定。那么，我们到底在什么时候反对过武装斗争呢？

县委通过他们的决定说明了他们“同意加入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的行动。他们也立即加入了这个组织。《解放》月刊后来证实了这一点。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期《解放》月刊写道：“最近他们加入了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这样他们现在就可以了解到印度各地革命派的丰富经验了。”

县委会的决定以及随后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

会的批准，非常明确地表明，县委会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即在发动武装斗争以前很久就拒绝邦委员会的领导了。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也对此表示了赞同。同反对邦委员会的文卡塔拉特南集团建立直接联系是他们的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县委会在其决议中希望邦委员会参加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但是这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因为甚至在邦委员会参加了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之后，县委会还是独立行动。它从来没有承认邦委员会的领导。尽管县委员会决定这样做了，而且在参加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之后就直接在它领导下活动，但是还是对这个县余下的领导干部进行游击战训练的工作作好了安排。邦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决定参加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虽然在县委会通过的关于武装斗争的决议中存在着错误（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但是邦委员会还是同意发动武装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十月初（八日），县委会在埃卢鲁举行了会议。在那次会议上邦代表说明了邦委员会的上述这些决议。但是县委会拒绝这些决议，并且拒绝接受游击战训练。因此，为此而作的全部安排不得不取消了。在那次会议后，县委会的领导干部前往克里希纳、贡土尔、西戈达瓦里和东戈达瓦里等县，同那里的重要积极分子直接联系，设法使他们脱离邦协调委员会。他

们同和文卡塔拉特南集团合作的各个集团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且继续进行他们的活动。即使到那个时候，文卡塔拉特南集团还同斯里卡库兰县的一些地方组织（博达帕杜等）有联系。

邦代表参加了一九六八年十月举行的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会议。在同领导人们进行了讨论以后就清楚地看出他们在下述这些问题上没有什么根本的分歧：忠于毛泽东思想；认为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是在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拒绝议会道路，承认武装斗争是当前的斗争形式。当时还向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说明，某些邦代表在选举问题上所发表的观点并不是委员会的观点，甚至连邦委员会也认为他们过分强调了这个问题。此外还说明，在布德万全会以后没有退出马克思主义党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希望继续从马克思主义党内部进行党内斗争，而是希望通过提出我们的另外一条路线来帮助一般的同志，使他们能决定站在那一边；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每一步都违犯党纪，最后发出了造反的号召，退了出来。所以，把这一切都说成是机会主义，那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领导人把这一切告诉了斯里卡库兰县的代表。应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本身的邀请，这些代表当时也在那里。

我们代表邦协调委员会在十一月（那时十二月份一

期的《解放》月刊还没有出版)举行的县委会会议上指出,为了使人民准备好在这个邦的不同地区开展当前的武装斗争,如果当时属于斗争地区范围内的斯里卡库兰县组织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同邦协调委员会合作,即将是有益的,而且为了开展最高形式的斗争,即武装斗争,通过民主集中制遵守最高形式的纪律,也将是有益的。但是县委会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们明白地表示,他们将只在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同邦委员会合作,他们将执行他们所接受的那些决定,在别的方面,他们将根据他们自己的独立的决定行动。

在这次会议之后,他们纠集了克里希纳县和贡土尔县属于文卡塔拉特南集团的人们,把他们带到斯里卡库兰县。他们的领导人特别拚命诽谤邦领导,在这些同志们中间制造不满。在前往那里的这些人中间,有一些是希望到人民中间去工作的正直的革命派,也有一些不良分子。

十二月间,两个邦委会书记处成员同斯里卡库兰县委会的书记讨论了在发动武装斗争以后所应采取的战术和措施,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他们接受了这些建议。此外,两位书记处成员还向县委会书记说明,如果他们同其他县建立直接联系并且招收反对邦委会的人,那就不值得搞协调了。然而,这些县委会的同志逐渐地采取了建立一个对立的中心的方针。这些情况自然是令人痛

心的，因为当前的需要是要争取使这个邦内的一切革命派都对现在正在斯里卡库兰县进行的武装斗争给予支持和合作。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说明，攻击邦委员会说它反对武装斗争的宣传是不适当的，不正确的和不真实的。

他们还进行另外一种错误的宣传，说邦委员会禁止散发县委会出的小册子。县委会的一切小册子都是通过它自己的组织散发的。他们没有通过邦委会或县委会散发。因此，不发生禁止的问题。这不过是企图为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散发小册子的行动辩解而已。

这样在严重不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邦委会为改善邦委会和这个县的关系所作的一切尝试结果都失败了。然而，邦委会现在正在尽一切力量帮助武装斗争。

澄清若干问题

从上面的说明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说邦委会反对斯里卡库兰县吉里江地区的武装斗争是多么没有根据。相反，它是希望尽早发动武装斗争的。它曾为此作了努力。它承认在这一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缺点。主要的缺点是：没有能够在警察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初开始袭击以前就进行武装抵抗的准备工作；没有作必要的安排以迅速完成游击战训练；没有指派一位同志代表领导中心去检查这些准备工作。最后这两个缺点只是反映了领导中

心在组织工作方面的缺点而不是反映它在认识上的缺点。

关于第一个缺点，邦委员会在警察开始袭击的时候甚至还没有成立起来的。邦委员会只是在这些袭击开始以后才成立。在那时以前，邦领导人们都是在各个地区履行他们以前的职责。

虽然这些是困难，但是客观上，这些都是缺点。为了纠正这种情况，甚至现在还有必要作出组织上的安排。

关于何时和如何开始斗争，在县委会的同志中间是意见完全一致的。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在讨论中表示的各种意见，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是存在一些分歧的。

武装斗争——土地问题

县委员会内外的一些同志发表了如下意见：

“我们目前进行的斗争是解放斗争。这跟土地问题或地主剥削制度没有直接关系。这个问题要留待解放以后解决。应该建立人民军队，解放农村地区和解放大城市。为此，我们必须建立根据地。”

今天，在我国各地区爆发的所有农民武装斗争都是解放斗争，即夺取政权的斗争。即使是那些还没有达到武装斗争阶段的斗争，如果抱着这种认识来加以发展并提高到更高的形式，它们也是会作为武装斗争和解放斗

爭而发展的。在目前国内存在着革命的形势的这样一个时候，所有的农民斗争都将具有这种性质。但是所有这些斗争的开始、发展、巩固和扩大都必须完全以土地革命纲领为基础。农民的解放意味着从地主——帝国主义制度中解放出来。虽然完全的解放要到根据地建立以后，到印度全国各地夺取政权以后并在新民主主义政府成立以后才能实现，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开始，反地主斗争的开始和土地革命纲领的开始，解放的过程也就开始了。

斯里卡库兰县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一九五九年起，我们展开了一个团结起来反对封建地主政府官吏的剥削的、基础广泛的吉里江人群众运动。由于占领了地主手中的土地，占有了庄稼，取消了债务，这个运动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进行武装斗争的条件已成熟了。

农民不仅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而且还同封建主义作斗争。因此，在发动武装斗争以前和以后，我们必须在土地革命纲领的基础上前进。因此，为了保卫斗争成果和扩大这种成果，我们一定要结合开展武装斗争，并要把这种斗争继续进行下去。

但是如果把这种武装斗争仅限于土地问题或者同封建剥削有关的问题，那是错误的。进行武装斗争应以夺取政权为最终目的。我们必须在人民中间确立这种认

识。在遭受封建剥削的地区里，农民将在同这种剥削作斗争的过程中得到这种认识。

在我们面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在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情况下都绝对有必要把这种反封建的斗争继续进行若干年，然后才能发展到武装斗争的阶段？对此，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没有必要。今天，由于革命形势的存在，由于在各地区开始的武装斗争的影响，由于有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领导，（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要有夺取政权这样一种必不可少的认识）——这一切创造了一种条件，即不一定要继续进行一个长时期的斗争，而在一个短时期内就会有发展机会发展到武装斗争的阶段。革命者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机会发展武装斗争。

有的地方没有赤裸裸的封建剥削，有的地方封建剥削不那么厉害或者根本没有，那么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如何去结合开展武装斗争呢？在那些地方，会有政府官吏、帝国主义者或其他人的其他方式的剥削。我们必须同这种剥削进行斗争。无论如何，夺取政权是主要的标准。因此问题并不取决于剥削的严重性。反剥削的斗争将被利用来迅速达到夺取政权斗争的阶段。因此我们必须尽量加以利用。

如果我们试图把武装斗争继续进行下去，而把土地革命纲领或在那个斗争中取得的成果置之不顾，那就会影响农民参加武装斗争，参加的人数会逐步减少。这

样，武装斗争就会削弱而有垮台的危险。

至于农民，从封建主义下解放出来意味着耕者有其地；与此无关的任何解放斗争对他们来说都将是抽象的。

武装斗争和群众的作用

游击斗争就是人民的武装斗争。没有人民参加，游击斗争就不会成功。同样，开始游击斗争，就必须有群众参加。

当土地革命开始时，政府就会派武装部队来镇压，就要对群众进行残酷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在袭击开始前存在的群众的劲头在袭击开始后就会消失。活动会减少。在许多地方，可能出现暂息状态。革命者往往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够在这种暂息时期里发动游击斗争，还是不能呢？某些同志认为，甚至在这种时候，我们也能开始。

在目前情况下，根据我们的群众运动的经验来看，这种平息只是暂时的。在这种暂息时期里，革命者应该重新联系群众，进行政治宣传，在群众的一些问题上尽量采取行动，并为随后的斗争作准备。那样不用太久人民就会投入斗争。但是这次，群众的劲头可能不怎么普遍。但是群众的这种劲头会使得仇恨敌人和武装部队的感情增加许多倍，并树立起同他们斗争到底的更加坚强

的决心。这会大大有助于提高群众和游击队的斗志。这还会为游击斗争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没有群众参加而开始的游击斗争是不会有这种有利条件的。当面临敌人的武装袭击时人民还有可能暴露出弱点来。

这并不是说，在这种暂息时期，以任何方式抵抗敌人的袭击都是错误的。只有甚至在这种时候也抵抗敌人的袭击，我们才能使群众和战斗人员为随后的游击斗争作好准备。抵抗的形式可以按照运动的觉悟水平来决定。首先，我们应该用人民能够得到的任何武器来进行抵抗。通过这种有组织的抵抗，群众和战斗人员就会学到游击战的第一课了。

斯里卡库兰的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到五月武装警察发动袭击之后，群众暂时被恐怖手段压制住了，但是，革命派牢牢地挺立在群众之中，因此，到收获季节时，出现了若干次群众行动。在那以后，由于干部继续不断的活动，群众为目前正在进行的更高形式的斗争作好了准备。我们必须认识到，那种认为在暂息时期里群众和战斗人员不可能拿起在当地可能得到的武器进行抵抗的倾向是错误的。

游击斗争——练训工作

关于在发动游击斗争之前是否有必要进行最基本的军事训练的问题，正确的回答只能是肯定的。

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游击队只有从游击斗争中学会游击战术。然而，由于剥削阶级禁止人们使用火器，更别提让群众接受军事训练了，因此，游击队和游击队领导人有必要进行最基本的军事训练。

要是游击队不得不立即参加斗争，那么，这种基本训练只得到战场上去接受了。在通常情况下，还是在接受基本训练后再开始斗争比较好。甚至这种训练也不应照统治者的样子那样去搞，一连进行几个月，比较好的办法是根据地点和具体条件在不多几天内完成。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战争的普遍原则。我们也应该通过基本训练在游击战中运用这一原则。我们力量虽然弱，但我们要学会打败强大的敌人。技术是可以战场上学到的，要是没有什么也没有学就到战场上去，我们在最初就会受到一些损失。进行最基本的军事训练正是为了使游击队及其领导人避免这种损失。

现在，武装斗争正在斯里卡库兰县进行着。我们还要把武装斗争扩大到邦内的其他地区。到一定时候，这些地区是会展开斗争的。这种斗争必须在统一指挥下进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按照统一的计划开展武装斗争。

在游击斗争中，领导权不能完全集中，但是也不能完全分散。就战略而言，应该有集中的领导，就作战而言，则应分散领导。

在这种范围内，无论是地方的还是较高级的领导，

彼此之间都应有联系。在军事作战中，权力完全集中是错误的。在游击战中，权力完全分散同样也是错误的。如果权力完全分散，就不可能有效地对付敌军。

毛泽东在阐述游击战术时，对这一点是给予应有的重视的。

我们革命派在协调一致的前提下是各别地进行工作的。目前，权力分散的倾向的抬头是很自然的现象。我们必须对这种倾向作斗争。我们必须作到，在任何地区，斗争都应在统一指挥下进行。

统 一 战 线

为了使我们的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统一战线是党所使用的重要武器之一。在我们的宣传工作和我们的活动中决不应忘掉我们关于组织统一战线的思想。统一战线由哪一个阶级领导？什么阶级是基础？什么阶级应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明确。同样，我们还应该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如果不明确这一点，就可能打不着敌人，而不是我们的敌人的人却可能受到我们不必要的攻击。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对统一战线有正确的认识。

斯里卡库兰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内完全缺乏这方面的认识。他们写道：“县内所有的农民都遭受着地主、放债人和官吏的剥削，虽生犹死。”这样说是正确的。

他们还写道：“将来，学生、教师和低级军官以及其他的团体将会以更大的规模行动起来，因为他们的地位在将来还将恶化。”虽然在反动的和改良主义的领导下各种团体要参加斗争是受到许多限制的，但是，在将来，中层阶级以更大的规模参加斗争是有可能的。

这几讲得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甚至提都不提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的工人阶级以及可能参加统一战线的——而且已存在着参加的可能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关于为了消灭封建主义而必须实行的土地革命纲领，他们同样也没有谈及。

我们必须为推翻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而建立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中层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我们的革命的道路将是进行人民战争。这是人民民主革命。

上述小册子缺乏这种观点。它给人的印象是，根本不需要有什么统一战线就能夺取政权，只要通过武装斗争推翻统治阶级就行了。

我们必须指出，这可能在一些同我们合作的或保持着中立的阶层中间造成某种思想混乱。

毛主席已清楚地阐明了党、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三者之间的不可割裂的关系。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

爭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我们不仅在将来必须绝对遵从，而且在实行我们当前的纲领时也必须绝对遵从。

同志们：

我们在这里说明了斯里卡库兰县吉里江地区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发生的情况，也说明了在这方面所产生的问题以及我们对此行应持的态度。在经过这种说明之后，如果有谁说邦协调委员会过去是反对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或者曾试图削弱武装斗争，那就是毫无根据的，完全是诬蔑。只要研究一下上述各点就可以看出，邦委会从来不曾反对过武装斗争——不论是武装的抵抗或是正规的游击斗争。而且就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它曾毫无保留地交给斯里卡库兰委员会一个关于搞武装斗争的明确纲领。它为发动进行正规的游击斗争开始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如果说这一切努力没有取得什么结果，责任完全应该由试图建立反对邦委会的对立的中心的县委会来负。

但是，邦委员会与县委员会在各种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这些分歧可以简述如下：

（一）县委会认为没有必要进行作为正规游击斗争的开始阶段的普通武装抵抗。邦委会则认为，在受到镇

压的时候有必要进行这种武装抵抗。

(二) 县委会认为没有必要为正规的训练进行最基本的训练，而邦委会则认为有这种必要。

(三) 县委会认为没有必要发动群众参加。他们认为，一旦我们发动了武装斗争，群众就会自己动起来。邦委会则认为游击斗争一开始就必须发动群众参加。

(四) 县委会认为武装斗争的进行，可以完全与土地革命中的土地问题等一些问题毫无关系。他们说，这个斗争本身就是解放斗争。但是邦委会认为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五) 在邦委会看来，我们在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应该有统一战线的观点。县委会却没有这种观点。

(六) 邦委会认为，为了正确地进行武装斗争，邦委会与县委会之间必须建立有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团结一致；而武装斗争应在集中领导下进行。但是，县委会所走的道路却是另搞一个对立的中心并且在革命派及革命组织中间制造不团结。

这一切分歧甚至在武装斗争本身开始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随着这一运动的推进，这些分歧将会如何发展，这还要等以后再看。

我们还没有收到关于武装斗争开始以来所进行的武装袭击的任何可靠的详细情况。但是有消息说，一般来说，群众是参加这些袭击的。这是值得称赞的。他们可

能会争辩说这是发动武装斗争的结果。但这是不对的。甚至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和九月就有了这种事态发展的迹象。当时我们还没有发动武装斗争。这些(群众参加的)变化是等待群众动起来的结果。

在一个深入和具体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斯里卡库兰武装斗争是有着很好的前途的。我们希望这个斗争能够取得进展。这个斗争的进展对其他地区的斗争的进展将是很有帮助的。如果县的领导本着正确的观点采取正确的策略并且把武装斗争继续进行下去，它将击退统治阶级的武装进攻并且向前发展。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斯里卡库兰斗争的经验。

现在让我们向在斯里卡库兰吉里江人的斗争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的烈士们致敬。让我们宣誓继承他们的遗志。在我国，让我们粉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为此，让我们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把武装斗争推向前进。

在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这是有可能的。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争取革命的胜利前进吧！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关于斯里卡库兰武装斗争的文件的附注

今天，斯里卡库兰一派的同志们已组成印共(马列)的一个分支组织，并以那个名义开展活动。在写这个文

件的时候，这派不在场。属于这一派的同志们现在正在各县进行工作。他们一直局限于发动袭击，有时进行一些模糊的与群众运动无关的政治宣传。因此，他们沒有能够组织任何群众运动。他们沒有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和加强群众的组织性。因此出现了这一派失去群众的足以自主的支持因而渐渐瓦解的局面。由于沒有进行应有的组织工作，他们落入了敌人的手中。因此，这八个月来的经验明显地暴露了他们的政策和组织原则的严重弱点。我们已在这个文件中的一些部分谈到这些问题。我们要求读者们在研究这个文件的时候注意这些问题。

給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主席团的賀信

主席及主席团成员们

亲爱的同志们：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开幕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者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团结的和胜利的代表大会，是一个过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代表大会。这一次代表大会将使全世界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革命人民感到极大的喜悦并得到极大的鼓舞。做为世界革命力量中一支不可分割的队伍的印度无产阶级革命，把这次代表大会看作是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伟大的时刻，他们向你们，亲爱的同志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衷心祝愿代表大会一切成功。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其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无可争辩地表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人民已经最终粉碎了以大叛徒、大内

奸、大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路线，完全摧毁了他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击败了由中国现代修正主义者所策划、得到了国际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帮助和支持，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印度无产阶级革命派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将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并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正在进行的斗批改运动的宝贵经验。它将为进一步的战斗发出响亮的号召，为使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

这次代表大会不仅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且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有着深刻的和深远的影响，它将是全世界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会合和恢复元气的地点。它将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钢铁般的团结，加深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他们两党、两国人民之间革命的兄弟友谊。已经成为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最强大和最坚固的堡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闪耀出较前更加明亮的光辉。这次代表大会将把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先锋队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再次肯定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这次代表大会给予并将继续给予正在走向全面崩溃的濒于灭亡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体系以

更进一步的毁灭性的打击。就在最近，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粉碎了俄国现代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对他们的神圣领土珍宝岛的侵犯。在过去，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击败了帝国主义的印度统治阶级的侵略和扩张主义的冒险。这次代表大会将会成千倍地提高中国人民的革命警惕性，定会加速世界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俄国法西斯帝国主义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的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次代表大会将使徒然梦想包围、进攻和摧毁社会主义中国的美帝国主义、俄国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胆战心惊。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社会主义的中国。美帝国主义和俄国现代修正主义的重新瓜分和统治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注定要以全面失败而告终。

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将进一步提高世界人民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和教训方面的革命觉悟。在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现代修正主义做为一股资产阶级反动潮流出现，要推翻红色的苏维埃政权。列宁和斯大林同志进行了英勇的和原则性的斗争，反对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其他资产阶级野心家。但是，自从赫鲁晓夫、铁托以及在以前几个社

会主义国家中的其他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反革命篡夺国家政权之后，现代修正主义就成了一个完备的国际体系。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的你们的党、在恩维尔·霍查同志的杰出领导下的伟大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世界上其他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现代修正主义今天已完全暴露了它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它对内实行法西斯主义，对外实行帝国主义。这次代表大会是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和胜利的一次代表大会。它定将有助于使形形色色的形左实右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如“中间主义”，“新左倾主义”、“德伯雷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左倾主义”暴露其本来面目，它们现在正在抬头，妄图阻止正在全世界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潮流。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和巩固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同时标志着由毛泽东同志所发展的在党的建设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由于从党内清除了资产阶级野心家和工贼，从无产阶级中吸收了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新的先进分子，党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以更加朝气蓬勃的姿态出现。在你们党内，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对于官方的集权主义和极端民主的各种表现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你们在具体的实践中实行并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革命原则。从你们，亲爱

的同志们那里，印度和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会了批判把民主和集中截然分开的现代修正主义观点。他们学习到民主集中制是一个统一体，必须有意识地使其通过低级和高级形式之间的矛盾来加以发展。你们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最高统帅下，团结在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周围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所取得的思想上的集中的具体体现。由于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各种表现的群众运动，你们就成功地把无产阶级民主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新的阶段。从你们，亲爱的同志们那里，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到，组织上的集中只有通过思想上的集中才能取得。这种思想上的集中，正如你们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所表明的，只有通过对于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人道主义以及所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进行的群众性的批评和在批判的过程才能取得。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主持下召开的，它表明在你们党内有着真正的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就是这种集体领导的具体表现。现代修正主义者欺骗性地提出“个人崇拜”来反对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他们把集体领导庸俗化为就是“中央委员会领导”，并攻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革命的、科学的本质。你们，同志

们，彻底批判了“崇拜委员会”的资产阶级反动理论，并表明“个人崇拜”正是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政党的特点，而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特点。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客观的物质世界的正确反映，并且是从这个世界的辩证发展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当代世界无产阶级的先进的集体智慧的最高结晶，它以最集中的形式代表了国际无产阶级和所有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由于毛泽东思想不是工人阶级的某个人的思想，是不可能产生“个人崇拜”的问题的。毛泽东同志本身象征着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最高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机体中的神经系统的中枢。正如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一样，毛泽东同志是全世界所有无产阶级革命者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他的光辉思想照耀着世界革命胜利前进的道路。

这次代表大会将进一步巩固你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团结。从你们，亲爱的同志们那里，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统一的特性，要求不允许有任何类型的宗派主义那怕是一刻的存在和生长，宗派主义是完全同工人阶级的特

性不相容的，它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和宗派利益的表现。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亲爱的同志们，为如何消灭宗派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所贩卖的、为了篡夺党的领导和把党变成资产阶级法西斯党的资产阶级反动理论“多中心论”进行斗争树立了杰出的榜样。

亲爱的同志们！学习了你们的先进经验，印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勇敢坚定地致力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这个国家的具体条件中去。铭记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就不可能有革命，印度无产阶级革命派目前正在集中全付精力去建设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印度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反革命两面派的背叛。（未分裂时的）所谓的印度共产党，从它一产生就是一个现代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法西斯政党。当现代修正主义成为世界体系时，就得到了它的全面拥护和支持。亲爱的同志们，从你们的经验以及印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具体实践中，清楚的看到，在一个现代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中，不可能产生两条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问题，建立在资产阶级宗派争吵和妥协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党，往往是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为了争夺领导权进行宗派斗争的场所。由于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印度共

产党沿着宗派路线经过了分裂和再分裂的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正在走向全面的瓦解。印度现代修正主义者一次又一次地企图把他们自己之间的宗派争吵描绘成是两条路线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表现。他们通过提出“党内斗争”的口号，试图欺骗大多数干部和革命群众，禁止他们起来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的资产阶级纪律和组织机构进行公开的革命造反。以同样的方式，俄国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国际范围内提出“党内协商”和停止一切公开论战的要求，你们，同志们，拒绝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这一阴谋，并与现代修正主义制度做了彻底的革命的决裂，从而保卫和发展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印度无产阶级革命派通过向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学习，现在正在进行不妥协的公开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论战，反对各种形式的现代修正主义，誓把现代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组织机体完全摧毁。他们并誓要揭露和粉碎印度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切阴谋，现在，这些修正主义者象过去一样，正试图在革命政党的招牌底下，妄图利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的神圣名字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坛，来掩盖他们的真正工贼的真实面貌。亲爱的同志们！印度无产阶级革命派从你们那里学到，派别的调整和派别的协作，是不可能产生出一个真正一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

面对着国家的法西斯镇压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背

叛，印度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一种复杂的和困难的情况中斗争和前进。由于这种复杂和困难的情况，有关在这里进行的具体斗争的事实和事情，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领导是不知道的。印度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利用这一点，曾试图并仍在试图以各种方法提供假的、言过其实的、和别有用心关于印度具体情况的报告，他们妄图吹捧他们的形象，以便欺骗印度人民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领导。

尽管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有这样一些敌人和障碍，印度无产阶级革命派保证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誓把斗争进行到底。他们不怕孤立，印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正义声音被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听到的日子不远了。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已经进入世界革命的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时期召开的。关于这个时代，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原文“……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一句漏引——译注）这一科学的结论、具有历史意义的预言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号召，照亮着印度无产阶级革命派前进

的道路。

最后，亲爱的同志们，请允许我们再一次地向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致敬。在这个具体历史意义的时刻，印度无产阶级革命派祝福毛泽东同志万寿无疆！他们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在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中取得全面胜利。

光荣属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光荣属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进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中国和印度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万岁！

在毛泽东和恩维尔·霍查同志的红旗永远前进！

印度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

第二部分

倾向纳吉·雷迪派观点的 一些派别的重要文章

《关于与共产党革命派全印 协调委员会的分歧》

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举行了会议，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印度共产党（马列），并在成立了一个中央组织委员会以后，委员会自行解散。会议还通过了政治和组织决议，并指示它所属的各邦协调委员会使自己改为印度共产党（马列）邦组织委员会。

马哈拉施特拉邦共产党革命派协调委员会于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举行了会议，听取了昆迪纳亚同志所作的关于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会议的讨论情况的报告。会议根据摆在它面前的事实，一致表示对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所采取的许多政治立场和对于组织这个新党所打算采取的组织形式和前提持严正的保留态度。马哈拉施特拉委员会还认为，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专横地取消安得拉委员会的作法和它对共产党革命派安得拉委员会以及对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斗争的其它共产党革命集团采取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并且无助于动员和巩固在这个国家的革命力量，无助于组成一个革命的共产党。

鉴于这些事态发展，委员会决定：

甲、不执行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关于把邦协调委员会变为印度共产党（马列）组织委员会的指示；

乙、派遣委员会书记昆迪纳亚同志与安得拉委员会接触，讨论所有有关的问题，设法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也与观点相同的其它共产党革命派集团进行相似的接触，并指示书记处采取适当的步骤使所有的共产党革命派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革命的共产党。

根据共产党革命派马哈拉施特拉邦协调委员会的决定，昆迪纳亚同志会见了安得拉邦委员会书记，在昆迪纳亚同志回来以后，马哈拉施特拉委员会书记处于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举行了会议，听取了关于与安得拉邦委员会会晤情况的报告，书记处发现，它与安得拉邦委员会在关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通过了一个“关于与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严重分歧”的决议，并且进一步决定立即与现在叫做印度共产党（马列）的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脱离关系，而与共产党革命派安得拉委员会一起活动。

鉴于这个决定的严重性，书记处决定立即召开马哈拉施特拉邦委员会会议，把这个决议和与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脱离关系的决定提请会议通过和批准。

共产党革命派马哈拉施特拉邦协调委员会一九六九

年六月六日和七日开会，一致通过和批准书记处作出的与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即印度共产党（马列）——脱离关系的决定和上述决议。为了使名称一致起见，会议还决定把“共产党革命派马哈拉施特拉邦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共产党革命派马哈拉施特拉邦委员会”。

虽然这个决议包含了许多要点，但书记处完全认识到，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应当作一个更精确、更详细的分析。它还认为有必要分析和揭露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的某些完全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立场。但由于它无法控制的某些原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在现阶段尚不能克服的限制，书记处现在尚不能这样做，此外，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立即作出决定。当然，这就不可能作更精确、更详细的分析，书记处毫不忽视作出这样一种详细分析的必要性，这种分析要从具有历史意义的纳萨尔巴里起义开始，到成立具有历史意义的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到它堕落成为一个分裂的冒险主义的集团止。

书记处将尽最大力量尽早作出详细的分析。

共产党革命派马哈拉施特拉邦委员会书记处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五日

决 议 全 文

(一) 两年多以前，纳萨尔巴里勇敢的农民，在当地共产党革命派的领导下，对反动的统治阶级造反了。纳萨尔巴里勇敢的农民这种造反行动大大地震惊了从国大党到一些所谓左派政党，包括自称为共产党的一些政党的各种反革命派。纳萨尔巴里农民的这个造反行动具体揭露了印共（马）的领导的反革命性质。

(二) 纳萨尔巴里革命在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过去，革命队伍是团结在领导层中自称为革命派和“正确路线”的维护者的某一个人的周围，而结果是被出卖，因而幻想破灭了。同过去不同，纳萨尔巴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队伍这一次大胆地、勇敢地开始采取主动，为最后推翻反动政府而建立革命运动。这些勇敢的共产党革命派是受到毛泽东思想的鼓舞的。

(三) 全国革命的共产党员在纳萨尔巴里农民斗争的鼓舞下，在为“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领导的孟加拉联合阵线政府对共产党革命派的残酷屠杀和对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镇压所震惊的情况下，已开始考虑同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领导最后决裂，这个叛徒领导的背叛行动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也许是无双的。纳萨尔巴里运动毫无疑问地证明，只有通过彻底揭露和粉碎这个叛徒

领导，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巩固基础上建立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印度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国革命同志已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四）当全国共产党革命派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实质并正在考虑采取一些具体行动以建立革命的共产党的时候，孟加拉的一些同志采取了协调那个邦的共产党革命派的活动的具体步骤，并出版了《爱国者》周刊，以在人民当中宣传革命政策，还成立了邦协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和这家周刊已成为团结全国的共产党革命派的中心。同志们已开始同这个委员会进行接触，要求指导和帮助。动员、团结和指导全国共产党革命派的历史使命已落在孟加拉委员会身上。孟加拉委员会召开了各邦领导同志的会议，并组成了全印协调委员会，从而开始在印度全国一级的共同机构的领导下巩固革命队伍。这种事态发展对于仍旧留在“马克思主义”党内的很大一部分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他们已开始对这个委员会抱有希望。全印协调委员会的组成和“马克思主义”领导所采取的立场和措施——他们公开跳出来反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反对毛泽东主席思想、反对我国的革命运动等——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党分崩离析和暴露的过程。这种分崩离析的过程的一些具体事例是：印共（马）安得拉邦委员会的大多数驳斥了“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反共、反革命的意识形态立场，安得拉邦委

员会的一些领导同志在布德万的印共（马）全体会议上提出另一个草案——这个草案虽然含有某些不正确的提法，基本上是保卫国际共运中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立场的——以及安得拉邦有七千名同志脱离印共（马）而组织了革命委员会。并且实际上在每个邦的印共（马）组织中都开展了类似的活动。

（五）在这个时期内，人民的运动大大高涨了。全国许多地方的人民纷纷起来对剥削阶级和反动政府进行武装的造反——有时在共产党革命派领导之下，有时是自发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共运的领导——和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支持和欢呼这些事态发展。我国的共产党革命派对于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给他们的支持感到高兴和受到鼓舞。由于没有一个以马列主义为基础的革命的共产党来指导和领导这些斗争，劳动人民的武装斗争无法以开始时的速度扩展开来，相反，反马列主义的错误开始多起来了。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清楚了，全印协调委员会不能胜任它的工作并且不能对这些错误进行斗争并加以纠正。不仅如此，甚至在它所控制的刊物上所发表的各种决议和文章里，这些不正确的、反马列主义的立场还受到维护、支持和宣传。全印协调委员会中有许多领导同志还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即认为对这些提法的任何批评都可能影响革命队伍的团结。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反马列主义的。因为，

在原则问题上的任何妥协和不敢大胆地驳斥和攻击不正确的立场的做法，就完完全全是机会主义。

（六）在这种情况下，全印协调委员会开始逐渐堕落成为一个机会主义的、官行主义的和玩弄字眼的组织。尽管作了所谓的自我批评，但它从未真正改正任何错误。相反，最初倡议组织这个委员会并在委员会中居多数的西孟加拉邦的某些领导同志，开始象“马克思主义者”和丹吉集团分子过去所干的那种样子干起来了。他们开始沉醉于无耻的宗派活动。他们甚至避开某些邦委员会，背着它们组织自己的派别。他们鼓动新同志反对邦领导，并故意撒下对邦领导猜疑的种子，其目的是在他们周围纠集一帮“唯唯诺诺的人”。他们开始发动一个有组织的诽谤运动，反对纳吉·雷迪同志和其他敢于表示自己的某些真正的保留意见和看法的同志们。这出戏的高潮是全印协调委员会采取的把以纳吉·雷迪同志为首的整个安得拉邦协调委员会开除出去的做法，一方面，安得拉邦委员会被指责是反对中国共产党、赞成议会道路和反革命的，等等；但另一方面又称他们为“同志和朋友”，并说他们和全印协调委员会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这一点从未解释过：同反革命分子怎么能有非对抗性的、同志式的和友好的关系呢？这种骗人的话太多了，以致同志们不会很容易地接受，他们已开始向领导提出一些“不合适的问题”。这样处于绝境以后，

这些领导人就来了一个大转变。一夜之间，就把安得拉邦委员会说成是敌人了，并且是“反动势力的最后后备队”。难道还能有比这个更轻率、更荒谬的提法吗？不仅安得拉邦委员会，而且所有其他甚至稍微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人，都被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现在，全印协调委员会把它同这些同志和这些委员会的矛盾说成是“对抗性的”了。并已号召人们“消灭”他们。为了证实这种离奇的说法，各种各样的谎言和诽谤纷纷而来，比如“安得拉邦委员会和纳吉·雷迪集团破坏武装斗争”，“纳吉·雷迪等人不主张搞武装斗争，而主张走议会道路”，“他们是高喊毛泽东思想口号以破坏毛泽东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等等。

（七）全印协调委员会发现，它的玩弄字眼的手法再也欺骗不了大多数同志，它的失败和错误太为明显而无法掩盖，所以它就采取了另一招，就是宣布建立了一个党。它这样做是想在一般同志中间制造混乱，并强迫他们接受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为这个国家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这个集团又一次大肆进行煽惑人心和玩弄字眼的活动。这个集团的最高领导人查鲁·马宗达开始把普尔帕利事件同彭纳普拉——瓦亚拉尔和特仑甘纳的伟大斗争等同起来。这是对这些光荣的斗争完全无知！他还企图把斯里卡库兰说成是印度的延安。他还宣传，在斯里卡库兰，这个运动已经达到了游击战争的第

二阶段！这种说法的糊涂性太明显，无法欣赏。只有决心消灭革命运动的人才能提出这些空想的说法。从他们支持要求另设特仑甘纳邦的反革命运动这一点，也能够看到类似的投机态度。这个运动是由契·雷迪和他的一伙人领导的。这伙人认识到，劳动大众已经奋起为解放自己而进行武装革命，于是就开展了另设特仑甘纳邦的运动，来转移人民的注意力。然而，印度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的“理论家”们却不了解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

（八）名副其实的革命派是不会支持全印协调委员会的这些反马列主义的、分裂性的立场的。经过核实的事实证明，许多共产党革命派是在全印协调委员会（印共马列）之外的。事实也证明，安得拉邦委员会不但不是反革命的和走议会道路的，而且实际上正在比全印协调委员会自称正在组织武装斗争的地区的总面积还要大得多的地区领导有组织的武装斗争。

（九）全印协调委员会的宗派主义态度对革命运动造成的损害必须加以彻底揭露、谴责和驳斥。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明确无误地弄清楚，我们同在全印协调委员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的革命派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对于某一行动是要支持还是反对，应根据这个具体行动的情况来决定。必须作出一切努力来耐心解释和争取现在在全印协调委员会影响下的同志们，从而加强

和团结革命运动，因为一切革命派的团结是当前的最大需要。

(十) 当前的迫切任务是，立即采取步骤组成一个革命的共产党，为此，我们必须同国内一切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思想、忠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我国革命运动的革命集团团结起来。为此，必须召开所有这些集团的一次会议，以便在我国革命政党的纲领的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选举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其任务是立即采取措施以起草一个党纲和党章，向全国共产党革命派的各个组织散发这些草案，进行讨论，各自召开党的会议，最后组织一个全印代表大会。这样重要的任务只能由有经验和有才干的同志承担，今天只有安得拉邦委员会能够肩负这个伟大的责任。因此，共产党革命派马哈拉施特拉邦委员会要求安得拉委员会立即在这方面采取步骤。

(十一) 共产党革命派马哈拉施特拉邦委员会号召邦内的全体同志和单位讨论邦委员会的这个立场，提出建议和赞成它，并团结在邦委员会的周围。

关于释放政治犯的决议

我国许多无私的爱国者，现在正在印度各地的各种监狱内受折磨。在修正主义的印共(马)领导的联合阵线政府执政的喀拉拉邦的监狱内，这种犯人的数目最多。

有大量消息揭露了这个“人民政府”以折磨、羞辱和侮辱这些爱国为乐的暴虐行动。祖国的这些英勇的儿子所犯的唯一罪行就是他们敢于用言论和行动反对反动的统治阶级，这些反动的统治阶级根据他们的主子——各色各样的帝国主义——的命令，残酷地剥削人民。

共产党革命派马哈拉施特拉邦委员会要求立即无条件地全部释放这些政治犯。

建立革命的共产党

(一)

共产主义不是什么空想，不是主观的幻想，也不是穷苦人追求幸福的单纯欲望。它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的理论 and 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他们以前和与他们同时代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理论、法则和论点，并且抛弃了它们的不科学和不现实的方面，从中提出了新的科学理论和法则。这样便产生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其宇宙观是：物是第一性的，认识是第二性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它对一切事物的分析方法是：在每一个事物的内部都有互相对立的力量存在，在它们的冲突或矛盾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天才地创造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解释和论点是：社会变化的发生并不取决于某种非凡的神力或单纯的物质力量，只有阶级矛盾才是这种变化的关键。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科学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法则取代了空想社会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建筑在科学基础上的学说，因此它的威力是无比的和不可抗拒的。

(二)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上受剥削最深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解放哲学。因此，对于剥削阶级来说，它是一种危险的东西。这种哲学理论并不是由工人阶级单纯从自己的经济生活地位出发得出来的，而是由思想家们把它灌输给工人阶级的。理论概念不是从下层产生的，而是在上层创造出来的，但在下层存在着理论的来源。剥削阶级的哲学长期以来在被剥削者的心里产生了忍受社会剥削的思想。而马克思则对此予以打击。因此，剥削阶级的理论家、政治家及其代理人便千方百计地企图消灭马克思的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并且经过种种的考验、试验和实践变得更具体化了。不仅如此，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又有几位革命思想家把马克思主义继续推向前进，以更新的理论和法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相继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家。

(三)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不是进化论而是革命主义；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看：向更高级的社会的过渡是通过社会的阶级矛盾在某一阶段所产生的强烈冲突而完成的。这种过渡是突然的，并且是

一种质的变化。由此可见，社会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这种革命要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进行社会分析、确定社会向哪个阶段过渡、动员革命的阶级以及进行组织工作，等等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所以革命的战略和战术以及为了组织与领导革命而建立革命政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必不可缺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这方面也提出了科学的理论。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宝贵财富，并且对于革命工作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革命政党的基础是政策和思想；而革命政党是使革命成功的推动力。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思想，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在马列主义政党里，不应该有资产阶级和其它动摇的阶级的地位。对共产主义理想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信仰是马列主义政党的原则基础。在这一点上，如果维护与此对立的思想观点来建立政党的话，那末这个党将成为反动势力的工具。而就党的阶级性来说，它是无产阶级的党；但这个无产阶级是具有高度觉悟的。因此，对于党的性质斯大林提出了下列原则：（1）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2）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3）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4）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此，从思想和组织上来看，它不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也不是任何动摇不定的阶级的政党。就社会地位来说，这些阶

级的人在革命的各个阶段是倾向于党的或者还加入到党里来。但他们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去接受无产阶级的哲学、政治和精神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才配做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农民的政治和以农民为基础的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这同俄国的民粹派是一路货色。目前，在建立革命共产党的问题上，也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存在。这是同马列主义建党原则相对立的。此外，还存在着一种以地区为基础的多中心的，或以某一地区的斗争为基础的，甚至是以单纯的某个人的斗争性为前提的一种建党的倾向。这也是错误的。因为党是建立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的，并且是建立在全局思想以及整个革命斗争的目标和观点的基础上的。科学的观点和理论是建党的真正基础。

(四)

党的建设和党的任务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革命的各个阶段和各种形势下，党的任务是不同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民斗争、游击战争等都包括在党的任务范围之内；这是一定阶段和一定情况下的行动纲领。把它当作建党的原则和基础是不对的。革命共产党的创建是以社会革命的最后完成为目的的；并不仅仅以完成某一阶段的若干任务为宗旨。目前在建党方面存在着一种对这两个问题不加区分的态度；于是便产生了“以农民为

基础的党”、“以游击为基础的党”和“以农村为基础的党”等观点和主张。这种态度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

(五)

党和革命阵线这两者也不是一个东西。党是领导各次革命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而革命阵线是在某一个一定的革命阶段上革命方面的各个阶级的联合。在革命的某一阶段工农的巩固联盟是革命阵线的基础，而在另一阶段，革命阵线的基础则是工人同贫农和无地农民的联盟。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阵线的基本形式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则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农村的无地农民等）的联盟。但在革命的这两个阶段中无产阶级都处于革命阵线的领导地位。印度革命的目前阶段是人民民主革命，这个革命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工农的巩固联盟的基础上来完成。但这个阵线上的阶级联合和政党不是一个东西，由把两者混为一谈的倾向产生了：把党看作是革命阵线的所有阶级大联合的场所，并从数量的角度出发把革命阵线中人数多的阶级看成在党里也是主要的；甚至把他们当作革命的领导者。由此还产生了“农民阶级领导革命”论。在建立革命的共产党的时候必须抛弃这种观点。

(六)

在领导方面来看党的纪律是严格和强有力的。但不是恐怖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党派的纪律；也不单纯是服从命令的制度。这个党的纪律的基础是在原则上和思想上的统一，党员有为确定政策而进行讨论和批评的充分民主的权利。极端民主主义也不是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组织原则的根本基础在于以原则和思想为前提的民主集中制。以建立秘密党组织为借口，而放弃这一根本原则的倾向目前在某些地方存在着。此外还存在着把党的秘密和军事秘密等同看待的倾向。这些都是对革命政党有害的。在建立革命政党的时候，必须充分维护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任何盲目崇拜、效忠或激情都不能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个团结和统一的基础是原则和思想。

(七)

搞革命是党的根本宗旨。但仅仅停留这个一般的宣言上是不够的。为了搞革命，各国的党必须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社会阶级情况和实际条件而采取各种不同的战略和战术。否则党的方针将是机械的和不现实的。因此每一个国家的党必须有一定的纲领以及与此相应的策略路线。围绕建立革命政党问题上，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目前在印度除了根据毛泽东思想进行土地革命以

及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由农村包围城市这条政治路线的一般宣言以外，任何别的纲领和路线都没有必要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没有一定的纲领和路线就不可能领导党；党员们也就无从找到指导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下，党也就要被某些宗派或小集团随心所欲地加以左右。因此，要建立革命的政党就必须先有革命的纲领和路线。这是建党的首要条件。没有这一条件就企图建党是一种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的态度。

(八)

在思想和原则的基础上建党也要有一个过程。因为必须充分保持警惕以便使建党免受资产阶级和动摇不定的那些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免受错误倾向和思潮的支配。这里还有一个历史原因：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最初采取了企图通过直接反对的办法自上而下地把马克思主义消灭的立场；但是当他们的这种尝试遭到失败的时候，他们又试图改从内部来腐蚀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就起了这种作用。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蒙蔽无产阶级，妄图腐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因此列宁在原则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同第二国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俄国革命中同孟什维克的斗争就更为具体。列宁所作的这些斗争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与此同

时，在俄国革命中还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反对托洛茨基路线的斗争。因为，那些思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和斯大林同这一切错误和反动的思想进行了斗争，从而巩固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此后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通过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而产生了。它又以更新的革命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反对陈独秀的修正主义和反对李立三的极端革命主义和尾巴主义等等的斗争中树立起来，并且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另外，在战后的时期又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倾向和学说。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必要性的美国白劳德的理论、南斯拉夫铁托的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此外，斯大林死后修正主义以苏共二十大为中心以新的形式渗入到马克思主义中来了。它的理论基础是：用和平的手段进行革命和夺权，并通过同资本主义的竞赛建设社会主义。在战后，这些倾向是帮助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是反革命的思潮。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与此作思想斗争的武器。中国的文化革命，在新的意识形态问题上，在党和群众中间采用斗争的方法和辩证的方法，崭新地体现了团结——斗争——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的团结的政策。这种政策也反映在党的思想斗争中。没有这些，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政党便是不可设想的。总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当代革命的马克思主

义——反修斗争的新理论。在建立革命政党的时候，革命者应该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点，党必须站在全面地批判和消灭修正主义及新修正主义的这个重要原则的立场上。

(九)

此外，在战后的年代，在组织和发动革命的问题上，革命党人还应警惕另一种错误的思想和主张。在战后的年代，在一两个小的殖民地国家，由于帝国主义的严重危机和人民大众的愤怒，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武装夺取了政权。古巴和阿尔及利亚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其原因之一是那里的共产党未能正确地估计形势，未能对革命进行领导。在古巴的特殊情况是那儿夺权的组织者保卫国家政权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同社会主义阵营联合并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来发展自己的经济，逐渐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武装斗争的成功和游击战争的战术推动了格瓦拉理论的发展。这种理论认为：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在有觉悟的少数人的努力下，通过冲突，能发动革命斗争，并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游击战争是革命斗争的唯一道路，它在这种理论中占有市场。这种思想违反了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和游击战争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以政治为基础的，也就是用政治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而格瓦拉理论是

以冲突为基础，也就是说，制造冲突来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这种格瓦拉理论是抛弃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照这种理论去做就不能鼓舞和促进革命的阶级斗争，就不能发挥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革命就不能向前发展。这是企图以不现实的方法来进行革命。这样就不能以科学的方法取得革命的胜利。把某种特殊情况下的胜利看作一般规律是错误的。但是，古巴革命的组织者们却极力把他们的斗争手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战术提出来。于是，格瓦拉理论便渗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门里来了。但用这种方法进行革命是不能成功的。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开始不遗余力地把格瓦拉抬出来，并企图使毛泽东思想带上格瓦拉论的色彩。所以，在目前，革命的共产党必须抛弃格瓦拉理论，必须依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在反帝斗争的主要地区——亚洲的土地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必然会在这种时候竭力地污蔑、贬低和歪曲毛泽东思想。在印度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因为在这里毛泽东思想已深深地以纳萨尔巴里农民斗争为中心的共产党人的政治中扎下了根。所以这一新的政治一开始就有人竭力把它描写成恐怖主义。与此相应的理论是格瓦拉思想。因为，为了把纳萨尔巴里的农民斗争向前推进，开展了反对新修正主义的斗争，参加这个斗争的主要是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小资产阶级革命不稳定性为格瓦拉理论迅

速和顺利的传播准备了条件。因此在印度反对这种倾向的斗争是革命的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斗争对于革命政党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十)

在印度建立新的革命的共产党并不是突然的和使人感到震惊的宣布的问题。革命共产党的建立要有一个过程。印度共产党最初是通过若干个小组的联合而产生的。那个时候党没有一个确定的纲领。从政策的角度来看约希的领导和兰那迪维的领导以及他们的政治思想在印度共产党内一个是以修正主义形式出现，另一个是以极左形式出现的。后来在一九五一年党的第一个纲领出来了。通过党的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党逐渐采取了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并指出了用议会方法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一九六二年围绕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在党内产生了分歧。但当时丹吉过去的一封信被揭发出来，从而停止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党也就开始分裂了。一九六四年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成立了。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这个党还是停留在原来老党的范围内。一九六四年，在西孟加拉邦党内纲领问题上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这一时期内，在反对派中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分歧的观点，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派别和小团体。一九六六年党的领导获释出狱后便把反对派的观点

打成“左倾宗派主义”，企图通过组织措施把它们分化瓦解。但一九六七年，围绕纳萨尔巴里的农民斗争，这种原则性的分歧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党的领导采取了把公开支持纳萨尔巴里农民斗争的党员开除出党的政策。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革命的共产党人已经作为一种力量深入了人心。新的革命思想的基础是建立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土地革命；而基本的政治观点是武装斗争和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革命的共产党人之间团结的纽带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和忠诚。然而由于种种不同的政治观点的存在，使各小派别仍然保留下来。当时是否应该站在纳萨尔巴里农民斗争一边？是否应该把争论主要局限在党内斗争的范围之内？公开地建立支援纳萨尔巴里农民斗争委员会是否正确？等等犹豫不决的思想曾一度存在。后来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土地革命逐渐地成为革命的政治指南。持有相同观点的一些人建立了西孟加拉邦共产党革命派协调委员会，随后又成立了全印协调委员会。协调委员会的原则基础是：（1）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当作当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这个斗争中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示支持；并承认这个革命的领导权威；（2）把印度看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国家，把政府看作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主

义的联合势力，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是正确的；（3）用纳萨尔巴里的方式开展斗争；（4）把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领导看成是修正主义的和新修正主义的；在以上这些共同原则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把纳萨尔巴里农民斗争从政治上推向前进，在前进的道路上发现若干错误的倾向和思想。主要是：（1）存在着在不搞阶级斗争和不组织阶级队伍的情况下，搞革命暴动的思想；（2）存在着通过少数人的暴动活动来进行革命的愿望或倾向；（3）以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名，而忽视城市的工人和其他阶级的运动，或否认它的作用，并且把城市当作是白色恐怖的地方；（4）以抛弃经济主义为名，而不参加工会运动和对阶级的组织工作；（5）仅仅把通过秘密组织进行的游击战争看成是高级的（？）和唯一的革命斗争，并且把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的其它工作当作是经济主义的。总的来说，在这当中表现出对中国的尾巴主义的思想。这种倾向和思想的实际基础是格瓦拉理论。这些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曲解，是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思想的表现。对这种倾向和思想进行斗争将是目前建立革命政党的过程。革命政党的建立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确定什么原则和主张。支持和保护上述倾向而建立起来的党必将逐渐变成恐怖主义的政党。因此对上述建立革命政党的问题所采取的原则是极为重要的。

(十一)

除上述错误倾向以外，在共产党革命派协调委员会内还出现了一种支持选举的政治主张。虽然这种政治主张最后没有被通过，但其种种流毒仍旧存在。在某些小集团中，支持选举的政治主张还是牢固地存在着。抵制选举和支持选举是互相矛盾和对立的政策。由于这种矛盾或对立的存在，就不能使革命的政治团结一致地向前发展。对于革命的共产党的建立，这个问题也是特别重要的，并且是不可回避的。为了有效地实现毛泽东思想，对这个问题必须态度明朗。

(十二)

对于革命的工人阶级在建立革命政党中的领导作用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思想说明了对党的性质的种种模糊的认识。印度目前的人民民主革命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完成，对这个问题，在革命的政党内是不允许保留任何不同意见的。在目前世界的这种形势下民主革命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去完成。对这个定律的否认就是反马列主义的思想。工人阶级的领导和以城市为基础的革命，这两者不是一回事。领导在指导整个革命的问题上起鼓励作用，是革命权威；而以城市为基础的革命则是以城市工人阶级的起义为主的革命。如果接受了

毛泽东思想，就必须抛弃以城市为基础的革命论。但同时也必须抛弃在印度目前形势下把城市当作白色恐怖的地方以及否认工人运动作用的思想。应该采取把工人运动当作主要的农民斗争的补充和主要的革命斗争的辅助形式来进行领导的态度。必须特别重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作为它的补充的政治活动和组织措施。在这方面，还必须清除目前出现的一种在农村只依靠贫农和无地农民（甚至还否认组织他们的必要性）来搞斗争和游击战争的思想，因为它不是有助于目前革命的策略，这样做是不能建立起有助于革命的、以阶级为基础的革命民主阵线的。这种策略不能使革命成功。

（十三）

在建立革命的共产党的时候，必须对当前在革命的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各地区的斗争进行一次正确分析和估价。这些斗争的各种经验和教训将是今后斗争的指南。不应该保留任何居功自傲、固步自封和主观主义的思想，而应该扎扎实实地准备好这方面的报告，并组织好充分的讨论。否则，就不会有系统连贯的斗争经验，并且还将看到：在放弃一个地方后，又立即跑到另一地方搞暴动的革命紧张情绪被保持下来。

(十四)

在建党问题上，存在着一种通过任何的派别的联合就成立一个政党的思想。这是不正确的。沒有在原则基础上的统一观点就成立党的做法是错误的。在主要问题上有了原则性的统一的前提下在小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是许可的。但是在小问题上统一而大问题上不统一就建立党的做法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此外，还出现了一种先成立党而后确定政治原则的思想。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因为在这种思想中存在着一种把上层建筑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和包罗万象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下面的具体内容的基础上的；如果用互相对立的内容去建立上层建筑，那上层建筑是要倒塌或者很快地要被腐蚀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成立证明了这一真理。因此，先建立党的机构然后才去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理论是违反马列主义学说的。这并不是说要等到一切都做好了并且已经制定了永久的政策后才去建党。那将是使党停滞不前的思想。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张是首先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对主要的原则问题上和在反对当时的错误倾向和思想的问题上取得一致。然后建立政党，此后在新的形势下出现新的原则性的矛盾的时候再通过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式的讨论和批评去解决矛盾，从而取得进步。所以在目前必须采取步骤以达到原则问题上的思想统一。

(十五)

上述一切问题贯穿在目前建立革命的共产党的过程之中。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使革命者在主要的原则问题上统一思想。在各级进行讨论而采取若干措施是必要的，在工作方法上也应该力求达到一致。必须抛弃派性的立场。在达到原则统一的过程中应该为纲领和路线打下一个初步的基础。建立革命政党目的之一是在原则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团结革命者。为此就需要有上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最后将建立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印度革命的共产党。

(译自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五日帕里玛尔·
达斯·古普塔派的机关报《共产党
人》双周报编辑部文章)

新民主的斗争和“新共和”

由于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之一，因此，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面临着比一般情况更复杂的情况。在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和传播来反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对资产阶级思想的隐避的形式——修正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的重大责任也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凡是要打垮和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有助于革命斗争的舆论，总要不断地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及势力越用反革命的思想来麻痹革命的阶级及势力，革命阵营越是要削弱。

对我国印度来说也不能超越这条总规律。绝大部分革命人民今天仍然受各种反革命思想的毒害，当前我国的严重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其原因是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之后，修正主义在本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根深蒂固的。每当在印度出现爆发巨大的革命风暴的实际情况的时候，修正主义为了把一切革命扼杀在摇篮里，总是以新的形式出现。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在全世界出现了革命的一片大好形势，在印度，从特仑甘纳到纳萨尔巴里，一再燃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烈火，但他们今天仍然把革命

人民拉到议会道路的死胡同里去，他们在革命词句的掩饰下抛出开展议会道路的斗争策略，并把它说成是革命策略，好让帝国主义在印度呆下去。

在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剥削和统治之下的印度，居住着深受封建剥削的农民。印度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一切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这里的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武装斗争的发展也必然是不平衡的；不要等到使全国的所有人民都准备好进行最后的搏斗之时就在敌人的最薄弱环节农村开展武装斗争，而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一直在印度存在着，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都要走这条持久的人民战争的不平衡发展的崎岖的道路。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抹煞了所有这一切，而在人民面前提出了一条争夺内阁席位的假革命道路——抹煞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平坦之路。

因此把口头上革命实际上充当统治阶级的代理人的一切党派以及它们的政治彻底地揭露于众是非常必要的。纳萨尔巴里把它们假面具在革命干部面前完全戳穿了。但是从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绝大部分工人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已经识破了它们的本质，那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结果，将提出速胜论代替持久的人民战争，将提出在全国同时开展武装斗争论代替武装斗争的发展不平衡的、艰苦的道路，不把武装斗争看作是阶

级斗争的最高的和主要形式，而是把它看作替代其它一切阶级斗争形式的唯一形式。

不应否认这样的一个事实：现在大部分群众仍然在修正主义和新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控制和影响之下。不仅如此，这些反革命的政党为了利用普通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充当统治阶级的新的奴仆来反对革命工人、农民和青年，采取了狡猾的手法。这对劳动人民来说是一个新危险。要以极大的忍耐来对付这种危险。要把工人、农民和广大劳动人民从一切反革命领导的控制下争取过来，要在人民中建立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的领导，使这一工作全面地、不懈地进行下去。这个工作不能离开武装斗争的发展而单独进行。因此要投入最大的力量把这个斗争发展到农民中去。《新共和》已发誓，要献身于这个工作。

但是在开始做一切工作的时候，都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能够分析印度未完成的革命的性质。印度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朋友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民族资产阶级。必须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下，团结这一切力量。当前的主要任务将是推翻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剥削和统治，获得彻底独立，推翻封建主义，完成土地革命。推翻帝

国主义的走狗买办官僚资本也将是革命的任务之一。只有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印度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新共和》将献身于向印度革命人民宣传印度革命的这些重要理论，将全力以赴地团结革命的一切阶级、集团和个人。《新共和》将忠于广泛地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从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中来的革命干部，使他们能够具有政治觉悟，能够成为有才能的革命家。同时，它将提高警惕，反对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宣传一切错误思想。《新共和》将坚定不移地对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挂着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宣传格瓦拉、卡斯特罗或德布雷理论的人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

总之，《新共和》认识到毛主席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发动群众和团结群众才能开展和进行战争的教导，将极尽全力动员和团结人民开展革命战争。

译自《新共和》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社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开展群众斗争 和建立群众组织是必不可缺少的

我国是一个半封建和半殖民地国家。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剥削制度，剥削本国五亿人民。我国封建制度乃是帝国主义进行剥削和压迫的主要社会基础。因此为了要在我国进行革命，就首先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这个革命既是民族解放革命，又是民主革命。因此在我国革命的现阶段，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是相互紧密联着的。离开前者，后者就不可能完成。我们把这个革命叫作新民主革命或人民民主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巩固的工农联盟为基础，与被压迫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阵线，工人阶级才能使这个革命获得胜利。在这个革命的现阶段，虽然不能彻底消灭国内的资本主义制度，但这个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它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因为其领导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所以这个革命就起着砸烂国际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统治的枷锁的作用，它也是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的一个步骤。

既要革命，就要有工人阶级和它的领导。没有武装

斗争，革命就不能成功。因此毛泽东写道：“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条语录很清楚地说明“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于是，毛泽东把武装斗争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提出来的，并没有把它当作“唯一的”任务或形式。很显然，搞革命，除了武装斗争之外还有其它任务和形式。因此毛泽东写道，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

从毛泽东的这个教导中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要把武装斗争坚持和发展下去，就要开展群众斗争和建立群众组织。同样，使武装斗争获得发展的先决条件就是在革命党领导下广泛地开展群众斗争和建立群众组织。也许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主观设想：不要实现这些先决条件而率领几个勇敢的青年带着武器，通过若干次的行动就能把武装斗争发展到革命的人民战争的阶段。但是按照毛泽东思想，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写道：“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因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这些国家中革命的发展也将发生不平衡，这就

是说，不可能全国都在同一时期爆发武装斗争，因而革命战争必然要以持久的人民战争的形式出现。因此就有必要在敌人的薄弱环节——农村建立根据地。从一个方面来看，这些根据地在持久的人民战争中起革命战争的后方作用。为此，毛泽东为这些国家提出了建立和发展很多小块红色区域，从而夺取城市获得全国革命胜利的理论。虽然这样的红色区域建立了，但是在能建立红色政权的一切地方，还必须把政治斗争发展到一个特定的阶段。正因为这样，要尽可能地建立和发展武装斗争。如果要把政治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必须确定主要目标，必须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开展武装斗争，否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在阐述红色政权如何发生时写道：“**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蕲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值得注意的是，在沒有受到一九二六—二七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冲击的一切地方，在开始时不可能建立起任何红色政权。

如果要实现“中国指引的道路是我们的道路”这个口号，就必须很好弄清和理解这条道路是什么以及

这条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本人十分认真地去完成的工作，那就是组织工人阶级。那时安源是工人阶级的圣地。毛泽东把这里的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在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基础上，经过罢工斗争，工人们被组织在自己的群众组织中。党组织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以后可以看到，在这些工人中有成千上万的工人领导了湖南和江西的农民斗争。随后，他们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成了红军的骨干分子。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可以看出，在农民完成的十四件大事中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就是建立农会和农会领导。

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进行斗争时写道：“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之路。”当毛泽东在井冈山进行斗争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流寇主义思想在中国抬起头来。毛泽东在分析这一切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时指出，有些人“不愿意做艰苦的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同时，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的组织和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这些错误思想的主要来源于党内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员占多数。既然如此，这些错误思想或倾向之所以能得到克服，是因为党的主要基础建筑在工人阶级之上。

即使是中国革命的这些教训摆在我们面前，但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由于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公开的群众斗争或群众组织只能滋长修正主义倾向；此外，说什么在建立解放区之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但是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能看出，这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毛泽东为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已解放了三分之二的土地）发出号召时写道：“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应当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不仅如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在谈到防御中如何进行政治动员时说，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的。他在回答怎么动员这个问题时写道：“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删去了——译注）靠

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来进行这一切宣传工作。

总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一贯重视群众斗争和群众组织，并且从未把革命斗争的一个特殊形式看作是唯一的**形式**，并要人们接受它。毛泽东在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时写道：

“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 and 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基本教导，随着时代的变化并没有过时，在帝国主义加速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的重要性也同样决不能过时。

要是总结一下我国发生的每一个革命斗争，如特仑甘纳和斯里卡库兰的武装斗争，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者由于把广泛的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作为基础，所以就能够把这一切斗争发展成武装的人民战争的阶段，同时也得出这样的真理：如果在全国不能同时唤起民众的革命觉醒，那么也将不能发展到这种高级阶段的斗争，并将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今天应要强调建立农村根据地，但同时也要记住毛泽东的这个教导：**“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

译自《新共和》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剥开所谓“革命领导”的假面具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又要有一个革命领导。识别一个党是否是革命的，当然要看其领导。其实，当一个党由一个正确的革命领导来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才能成为一个正确的革命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革命领导，虽然这个党有数千个革命干部，但也决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党。当革命干部受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和善于制订正确的方针的领导的指导的时候，他们才能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一个完完全全地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方针的、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基础的、具有革命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女组成的党，这样的党才能成为一个革命党。对革命理论和历史有深刻认识和理解，对于实际运动有深刻了解，和人民群众，尤其是和工农有密切联系的这样的领导才能成为革命领导。那些出生于小资产阶级的人，当他们能与工农结合，能具备共产党员的起码的品德的时候，才能称得上领导。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把革命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必须放弃资产，必须是最富有远见、自我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必须虚心地考虑一切问题、分析问题，必须站在群众斗争的前例，必须当群众的海人不倦的老师，又要向人民学习。必须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

每一个革命党和革命领导的问题。

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否有过这样的革命领导或者是在目前，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是否以“新”方法来建立革命领导，要知道或了解这一点，就得用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来研究这个问题。列宁曾经写道：“**沒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由此可以清楚看到：看一个领导是否建筑在革命运动的巩固的理论基础上。为了要弄清这一点，就必须要学习和理解从马克思到毛主席所有人的著作。同时，还要了解本国的历史。但是我们看到，本国的领袖们常常非常狡猾地一直避开这个理论问题，他们至今还这样做。一提到理论问题，就讽刺人家为侈谈理论的雄辯家，这已成为目前的一种风气了。目前这个问题表现得很露骨、很赤裸裸。他们说什么“处在战争情况下”谈论理论问题乃是修正主义的。因此应当怎么样呢？唯一的就学习红书和老三篇以及交头接耳噉噉私语地议论采取“歼灭”行动罢了。

在本国抛弃理论的所谓传统中隐藏着极大的谜。那些领袖们已经完全知道而且懂得：如果让理论任其自流并试图使理论确立起来的话，那么他们理论家的破产面目就会容易被革命干部所识破，这样的话，他们再也不能以伪装成领导来欺骗那些头脑简单的同志了。在这个方面，只要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迄今为止，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在

我国还没有建立正确的革命理论，目前在本国根本谈不上革命领导的任何问题。为此不管怎么样，不能把一个尚未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或者是受到半教育的任何人放到领导岗位上来。

毛泽东写道：“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毛泽东是在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之后，于一九四九年说这番话的。值得说明的是，这三件主要武器是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才在中国创立起来的。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强调了这三件主要武器并说它是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那些认为在印度根据“新”方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确立了一个革命领导的人，难道他们能很有把握地说，所谓“领导”对这三件主要武器有全面的认识了吗？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过去长期把持在修正主义者手里，把持在托洛茨基分子的手里，今天仍然在他们手里。在本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直进行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今天仍然在进行着，这是事实。但是，主张两条道路的斗争和走在阶级斗争道路上的人，他们在党内从来没有得到过强有力的领导。目前自封为领导的不能

按照正确的革命思想来进行领导。他们一直到一九六七年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过竞选。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由于纠缠在竞选的死胡同里，由于修正主义思想占优势，因此在领导中当然就产生官仔主义。由于这样，虽然他们退出了官仔主义司令部，但在一夜之间是克服不掉自己的官仔主义作风的。难道仅是这样吗？事实是：他们伪装成新的领导用一种新的官仔主义作风去克服旧的官仔主义作风。我们看到，本国的普通工作人员非常认真和勇敢地展开每一次斗争。他们为党牺牲了个人的一切，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窃踞领导职位的任何领导任何时候都没有作出过任何牺牲。有许多人直到今天仍然是个大财主。对他们来说，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连谈都谈不上，甚至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听到和风细雨的批评，他们就暴跳如雷。而他们不给批评者提出的批评作象样的答复，反而用恶毒的语言进行反对批评者的欺骗宣传，把批评者丑化得一塌糊涂。因此，那些长期以来陷入修正主义政治泥坑的人，那些进行欺骗宣传的人，他们怎能当革命领导呢？如果要当革命领导，就得对革命理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运用理论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通过秘书写成千上万篇文章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甚至这些文章即使由国际领导加以刊登和进行广播，但他们也不能成为领导。

只要研究一下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会证实

这一点。这里的共产党一直得到国际领导的承认和批准。一九四八年斯大林和毛泽东还给兰那迪维叛徒集团贺电。但这是否意味着兰那迪维集团是革命的呢？后来也看到，中国党承认“马克思主义”党为印度共产党。但是否意味着这个党是革命的呢？所有这些党的领导竟然抛弃了国际领导对他们的信任，他们对普通工作人员一直进行欺骗和讹诈，背叛和扼杀革命。其实，国际领导承认一个新党是对于这个党的信任，信任这个党能够真正成为革命的政党，完成其革命任务。因此，如果看到他们放出得到“承认”的烟幕弹，而把人引入歧途，那么造这条路线的反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我们今天懂得：当兰那迪维集团借国际领导的名义，迫使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屈服于统治阶级的时候，印度革命派要是抵制这个领导和坚持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那么今天印度的面貌肯定是另一个样子。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告诉我们：近百年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决不是在一天之内突然成为领袖的。他们在每一个问题上，开始时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创立了革命理论。而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阶级立场。由于这样，他们才能够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所以他们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伟大的。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国家都不能违背这个总规律，印度也不能例外。因此

在印度也将必然发生革命，其过程已经开始了。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又要有一个革命领导。党和领导两者将通过唯物辩证法的过程建立起来，而不是通过任何机械的方法建立起来。因此，既要革命并为革命，就得有革命领导，把一个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不三不四的人按插到领导岗位上来，无论如何这个领导不可能是革命领导，也不可能进行革命。那些否认宣传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出坏主意光学习红书和毛泽东的老三篇来掌握如广阔海洋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的人，那些认为反对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武力的行动是修正主义而在暗地里喊喊私语地主张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完全阴谋手段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游击队”采取行动之前，就把如何布置的情况公开地在报纸上登出来和给夺步枪的行动大拨冷水的人，那些把组织革命群众运动的人扣上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帽子的人，那些依赖狂叫和资产阶级报刊上登的消息和文章来说明自己的生存的人，那些把削弱说成是发展、把衰退说成兴旺以及扶植旧东西的人，不管他们做些什么，也不能胜任当革命领导。他们挥舞所谓“革命领导”的指挥棒，能使某些头脑简单的同志引入歧途，但除此之外不可能得到什么了。

印度革命派当然是会识别挂着这个招牌的领导的。他们迟早要很好地识破他们，认识他们。他们将一定不会

服从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而是会坚决加以抵制，剥掉他们的画皮。

译自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解放战争》

第三部分

西孟加拉邦《南国》派的 重要文章

印度革命的前途

(供讨论)

印度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所有的共产党人都知道：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发展有着一个总的规律。在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向前发展，这些斗争也有着自已的特点，但是，它总是从属于历史发展的总规律的。通过阶级斗争世界历史向着建立无阶级、无剥削的社会的方向，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

印度人民的革命也是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向前发展，它也有自已的特点，但是它也以属于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它也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

二、国际工人阶级和作为它的先锋队的全世界共产党人在国际历史上的使命是同历史发展的潮流完全相符合的。印度及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三、十月革命以及相继而来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必然结果。印度革命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缺乏对全世界的实际形势和世界政治及经济的正确的阶级分析，即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对当前世界基本矛盾及其相互关系和影响作出恰当的阶级分析”，那么就不可能正确地估计国际和印度国内的形势，就不可能确定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基本动向并采取某种总的方针或了解其意义，也就不可能相应地确定印度革命的方针和策略。对印度的客观情况和印度革命问题必须从国际形势和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角度来考虑。

四、在总体上对世界实际形势和世界政治及经济作出正确的阶级分析，也就是说对当前世界基本矛盾的阶级分析证实了这样的真理：

★帝国主义者并没有立地成佛放弃殖民地——他们仅仅是变换了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形势下，在亚、非、拉各国，乃至整个世界出现了一片如火如荼的形势（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其原因之一），帝国主义者用老办法已经再也不能维持其殖民主义剥削和统治了。他们采取了新的方式，进行殖民主义压迫，走上了新殖民主义道路。

★这个新殖民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多数地方，帝国主义者放弃了直接统治的老办法，采取了进行殖民主义剥削和统治的一种新的方式，在这方面，他们依靠的是经他们挑选和训练的代理人。

★在这些代理人的协助下，帝国主义者通过组成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建立附庸政权、经济和军事“援助”，派遣经济和军事“顾问”（这些都是新殖民主义的手段）以及其他各种方式继续把各国作为自己的商品销售市场、廉价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的掠夺场所，掠夺他们的财富，象吸血鬼那样剥削它们。他们把许多国家变成推行其侵略政策的工具。

★当帝国主义者用“和平的”方法不能维持对这些国家的统治时，他们就组织军事政变、搞颠覆活动，甚至直接进行干涉和侵略。

新殖民主义比（旧）殖民主义更加狡猾、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为了争夺资本输出场所、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战争狂人的利益，在各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垄断集团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在目前，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新殖民主义的总头目和国际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苏修统治集团不仅给帝国主义及其新形式新殖民主义打掩护，并且援助各国反动派反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对全世界解放运动的领导和可靠的朋友中国进行诬蔑宣传，勾结美帝反对亚、非、拉解放运动和解放运动的朋友——伟大的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阴谋包围伟大的中国，此外还实行武装侵略中国等极端反动的政策。

他们不仅使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而且还采取新殖民主义政策和依靠新殖民主义这个武器建立新殖民地，建立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把许多过去的人民民主国家（今天已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置于自己的新殖民主义剥削和统治之下还不满足，他们还把新殖民主义魔掌伸到亚、非、拉所有地方。他们勾结美帝阴谋瓜分和主宰整个世界。美苏帝国主义的这个阴谋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他们的这个政策受到了并继续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

★美苏帝国主义企图瓜分和主宰整个世界的必然后果加剧了并继续加剧他们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帝国主义者从来就是一方面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另一方面又剥削和压榨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同垄断资本家有矛盾，另一方面被剥削、被压迫的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也存在着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矛盾日益尖锐化，尽管帝国主义者采取全力镇压政策和修正主义集团的千方百计的反对和破坏，而这个斗争却日益发展起来。尽管遭到以美苏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世界修正主义集团和反动派的反对，而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暴却一天比一天猛烈。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

的那些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都证明了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出现了新的觉醒。在以前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里，这个觉醒明显地表现为反对苏联帝国主义。中国伟大的文化革命的胜利挫败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一切阴谋，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大大地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民主的革命这当代两大历史潮流的斗争。这些斗争的矛头直指以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苏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各国反动派。这一切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目前世界分成两个阵营——国际反革命阵营和国际革命阵营。

在国际反革命阵营里的有以美苏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反对这个反革命阵营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阿尔巴尼亚等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阶级为中心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阵线。前者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减弱，而后者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增强。前者必败，后者必胜。（这是对国际问题的部分论述，是不全面的。必需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加以论述。——《南国》双周刊编辑部）

五、按照这个客观真理正确地估计今日印度的社会

制度，只有（在理论上和实践方面）实行印度革命的正确路线，印度共产党人才能把人民革命的斗争引向胜利的道路，才能加强反对世界反革命阵营的世界革命阵营的力量，才能在世界革命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今日印度

六、毛泽东主席指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是这个国家生产制度及经济制度。政治是这个经济制度的集中表现。文化是一定经济和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政治和文化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和经济的发展。

今日印度社会制度的基础也是印度现在的生产制度和经济。印度政治制度是印度经济的集中表现。而今日印度的文化思想是印度经济和政治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印度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又给经济制度及其发展以影响。今日印度之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些因素构成了今日之印度的社会。

新殖民主义和印度

七、研究今日印度的社会制度必须首先着重考虑的问题是：

印度是独立和自主的国家吗？帝国主义者已经放弃了印度了吗？帝国主义者对印度政治、经济、文化以及

印度社会生活制度的影响、控制和支配是否已经消灭了呢？印度是否已经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桎梏呢？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要性是否已经消失了？

八、按照整个世界的实际形势对印度社会制度作正确的分析证明了这么一个真理：帝国主义者并没有放弃印度。他们在这块独立招牌的掩盖下把印度变成了一个“新殖民地”国家。在印度，帝国主义者也放弃了他们直接进行殖民统治的老办法，采取了殖民主义剥削和统治的新方式，在这方面，他们依靠的是经他们挑选和训练的“印度”代理人。为了掩盖直接统治的赤裸裸的狰狞面目，建立了帝国主义走狗印度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政府——国大党政府。事实已证明了这个论点的正确性。

九、在所谓的“独立”之后，帝国主义者对人民的剥削不但继续存在，而且在这些年来大大的增加了。帝国主义者维持世界范围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和策略，依靠印度政府的协助，在非政府的各个主要场所内，特别是在同“印度”代理人大资本家互相勾结的联合企业里，自由地投入了成百亿卢比的新资本。以“援助”和“贷款”为名，帝国主义者在国营或政府的企业中也投入了成百亿卢比的资金。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印度的代理人买办资本家在许多国营企业的股份基金中也投入了并继续投入成亿的资本。此外还以所谓“技术援助”和派遣“顾问”为名，在各政府部门（财政部、计划部等）

和非政府企业中巩固和加强了他们的阵地。在粮食部和农业部也有他们的强固的阵地。这样，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苏帝国主义者便控制了印度的整个经济命脉，并日益加强着他们的地位。以“国家计划”和建立“国有工业”为名，从人民的腰包榨取上百亿卢比的税金已经建立的国营企业事实上只不过是国家官厅管理下的印度官厅垄断资本，这个官厅垄断买办资本实际上是被以美苏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印度”代理人所控制的。印度的这种官厅垄断资本是帝国主义以及“印度的”买办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工具。以美苏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在其“印度的”代理人的协助下正在继续把印度作为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廉价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场所，掠夺着印度的财富，吮吸着印度的血。简而言之，印度的经济是新殖民地的或半殖民地的经济。

十、印度的政治（内外政策，军事政策等）和文化也是新殖民地的或半殖民地的。

帝国主义特别是美苏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支配不仅仅是也不可能是局限于经济方面。美苏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依靠新殖民主义这个工具，逐渐地排挤英帝国主义者，并在印度的军事部门建立了自己的强固的阵地。美苏帝国主义者以军事“援助”和“合作”以及派遣“顾问”和“参谋”等等为借口，在军事部门建立了坚固的基地，在军事政策方面给予影响、控制和支

配，并通过各种军事条约日益巩固他们的地位。这些都是“全民族的防御”和“保卫国家”等招牌的掩盖下进行的。在所谓“保卫国家”的招牌掩盖下，帝国主义及其印度仆从们竭力搜刮人民腰包里的钱财，他们用人民的钱来加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之一——武装部队，并且又用这个武装部队来残酷地镇压人民。同时这个军队还被用来镇压其它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作为印度国家组成部分之一的武装部队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十一、印度政府披着“不结盟”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外衣，而事实上干的是帝国主义走卒的勾当。它掩盖帝国主义者对印度和在世界范围所进行的新殖民主义剥削和压迫；千方百计地帮助和协助新殖民主义剥削和压迫；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名反对各国的解放运动；派遣印度军队镇压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为帝国主义效劳；以“经济合作”为名，援助各国反动派镇压各国民族解放运动；每时每刻地对全世界人民解放斗争的领导者和朋友中国进行诬蔑；联合国反动派反对亚非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反对解放运动的可靠朋友中国，为美苏实行包围和侵略伟大中国的阴谋充当走卒——这些都是印度政府反动的对外政策的赤裸裸的暴露。

十二、过去二十一年来的国大党统治和印度政府的反动作用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帝国主义者根据他们的新殖民主义的政策，正式确立了他们的忠实走狗国大

党在政府里的领导地位，以便利用他们来充当统治和剥削印度人民和推行自己的侵略政策的走卒，而实际上进行剥削和统治的印把子即对印度经济、政治、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机器和文化等的实际支配权还是在他们手里。在印度的军队、各种官厅机构、以及印度的所有部门中都有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在“印度”的走狗的代表人物，他们散布在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总而言之在印度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中。美苏帝国主义者以新殖民主义为工具，排挤英帝国主义，影响、控制和支配着印度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军事政策、内政、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实际上，今天的印度已经无疑地是以美苏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一个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印度确实是国际反革命阵营的基地之一。

封建主义没有了么？

十三、研究今日印度的社会制度必须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

在印度社会里封建主义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了吗？不，不是这样。那末封建主义已经消失了吗？印度农村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了么？不，不是这样。实际上印度是一个半封建的国家。

十四、同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印度

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总的特征是：这儿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封建主义的基础上的，这儿不象欧洲国家那样先消灭封建主义，再把资本主义建立在封建主义的坟墓之上。英帝国主义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从一开始起就一直在扶植印度的封建王公贵族和地主。而日趋灭亡的这些封建阶级，也一直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的庇护下，保全自己、镇压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农民以及人民的反封建运动。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印度的大资本家集团也一贯遵照帝国主义的做法同封建主义进行妥协并建立了联盟。封建主义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大资本家集团的这个历史性联盟一直保留下来。和其它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在这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二个亲密的朋友——他们（互相）相依相存，缺了任何一方另一方就不能生存。

十五、反动的国大党政府的所谓取消柴明达（地主）制度的法令没有触动封建剥削的一根毫毛。

这个法令为柴明达地主提供了这样的方便：即他们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按照私人保留土地最高限度法令仅仅把名字改换一下，把土地分给亲戚朋友和豢养的亲信或者用假转让土地的手法把成百成千英亩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控制在自己手里。柴明达地主还以林地、种植园、果园、鱼塘、屋基、公堂、打谷坊等名义保留大片的庄园土地。此外，放高利贷的富裕农民也获得了保留土

地的便利。柴明达地主们充分地利用这些法令所提供的便利。其结果是使土地集中的状况依然如旧。占农村总人口百分之五的人手里占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土地，而占农村总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户只占有不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土地。

所有从柴明达地主手里转归政府管理的土地均由政府收地租。这样，封建剥削并没有丝毫改变。政府收租和以前的地主收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什么差别。政府所收的地租的很大的部分被用来补偿柴明达地主的所谓“损失”。这是通过国家间接地替地主收租来剥削农民劳动的骗人把戏。只不过以前是地主自己收租，而现在由国家替他们干这件事。在处理私人的土地时政府的大小官吏们营私舞弊搜刮农民的腰包，获得大量贿赂——目前这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按照租佃制度，农民继续受到二、三个甚至四个地主的残酷剥削。无理收回出租的土地是极其寻常的事。

依照租佃制度农民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甚至更多的收获量要被剥夺掉。

无地雇农的人数增长得越来越快，由于失业，雇农被迫给地主和种植园主当奴仆，象牛马一般地从事着极其繁重的劳动，他们的遭遇怎么也不比中世纪的农奴或奴隶好些。由于失业，大多数雇农只好过着凄惨痛苦的生活，成千上万的人由于吃不上饭或吃不饱而得病死

亡。

高利贷是印度封建剥削的另一个可怕的方面。在一般情况下，借一百卢比的债，一年要付利息一百卢比，有时要付利息二百卢比甚至还要多。

此外，政府苛捐杂税极重，农民是农产品出售者，但有时又被迫购买农产品，又要购买其它日用必需品，这样便受到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残酷剥削——这些都是农民所无法摆脱的灾难。

十六、封建剥削有四种形式——沉重的地租、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高利贷和商人的剥削——所有这一切把农民的生活置于难以忍受的地步。封建主义的走狗地痞、流氓、劣绅、警察、法院和政府官吏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形形色色的封建压迫使农民的灾难日益深重。

十七、封建剥削不只是局限于农村。象革命前的中国一样，在印度封建主义剥削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勾结来控制全国的社会和经济。

十八、封建剥削和压迫不仅妨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阻碍了印度工业的发展。没落的封建主义是在印度经济及社会发展道路上的阻碍之一。

今日印度的文化

十九、在任何社会里，文化总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今日印度社会的文化是

今日印度新殖民或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反映。今日印度的文化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文化。

二十、今日印度的半殖民地文化是帝国主义对印度的政治、经济控制或部分控制的反映。而半封建文化是封建主义控制或部分控制印度经济、政治的反映。宗教迷信，教派，种族歧视制度，家族观念等都是封建主义文化的表现。

二十一、半殖民地文化和半封建文化两者是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两者就好象一个人的两只手——左手和右手。

二十二、在经济、政治、哲学、军事科学、历史、文学、艺术（音乐、电影、歌剧、赞神歌、戏剧、宗教仪式、绘画）及各种社会活动等方面，总之一句话，在一切社会科学领域都有文化的反映。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通过国内外各个文化机关、教育机关等大量散播。新殖民主义的头子美国和苏联帝国主义为了这个目的，以在文教方面的“援助”和“合作”为名，对各个文教机关（全国所有的文教机关和大学）进行大量投资收买，派出很多被他们收买的走狗。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用报章杂志和官方宣传机器（电台、电视等）大肆散布这种腐朽的文化。而所有这些都是所谓“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名义下干的。

二十三、在作为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工人阶

级文化思想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文化思想（世界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共产主义理论），在这种文化思想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文化抬头了，尽管有很多阻力，但还是逐步地获得发展。

二十四、国大党、人民同盟、自由党等反动党派是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支持者之一，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是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在人民中的代表，修正主义只不过是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的反映。不反对修正主义，人民民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

今日印度国家制度的性质

二十五、实际情况和以上的讨论确立了真理：所谓的“共和国”和“议会民主”只不过是掩盖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招牌。

在“共和国”和“人民民主”的幌子下，国家的实际工作是靠国家机器（主要是武装部队、法院、监狱、官厅机构）来维持的；而这个国家机器的成份之一是武装部队。

二十六、当前国家的主人是：

（一）以美苏帝国主义者为首的英国、德国、法国等帝国主义者。

（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印度寄生的大资本家。印度是在殖民地条件下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

殖民地条件下，由帝国主义扶植而起来的印度大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作为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的工人阶级的巨大的发展，工人阶级及人民群众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尖锐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物的印度及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及全世界革命人民中出现的新觉悟——这一切的必然结果是：害怕革命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主力工农，加入了帝国主义的反革命联盟，成了十足的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区别，他们是印度革命不可饶恕的敌人，并且是当前国家政权的参与者。

(三) 封建的王公贵族、大地主、焦达尔地主、高利贷者、大商人和封建主义的代理人。以上三类反动的剥削者是印度革命的主要敌人。今日印度的国家机器是他们进行阶级剥削和统治的工具。这个国家机器是用武装来保卫他们的。当前的国家机器是这三类反动的剥削者和统治者对印度工人、农民和革命人民进行镇压的武器。

印度社会和社会危机

二十七、以上的讨论确定了这个真理：今日的印度是新殖民地类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印度的经济、政治(国内的和国际的)和文化——所有这些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印度的国家性质也正是这样。今日

印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就构成了今日印度的社会制度。

封建剥削及压迫与帝国主义、寄生虫和官厅资本的剥削与掠夺紧密结合在一起阻碍了印度农业、工业、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不推翻他们就不能为印度的财富和社会发展扫清道路，就不能解决由当前腐朽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使人民的生活每况逾下的那些问题。

印度各民族和部族的不平衡发展——有些民族和部族的人民（与其他民族比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十分落后，民族不平等，剥削和压迫等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和他们在印度的代理人奉行反动政策的表现。

印度革命的性质

印度革命的两个阶段

二十八、印度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规定了印度革命必须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任务是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印度社会变成为独立、民主的社会，变成为新民主主义或人民民主的社会。第二个阶段的任务是推进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的前提。只有完成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印度才会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人民民主革命将奠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这个人民民主革命不是过去的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在当代再也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印度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印度的人民民主革命将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一个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个民主革命之后，紧接着就是社会主义阶段。通过人民民主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可能建立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新世界。在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两者中间，都不能有任何非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部分。忘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是错误的，而另一方面混淆这两个阶段，企图一下子垮入社会主义也是错误和有害的。

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内在联系

二十九、印度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还规定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印度革命的头号敌人，也就是人民民主革命的主要敌人。印度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被剥削人民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为反对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而进行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虽然是整个印度革命或人民民主革命的两件不同的大事，使其中的一个离开另一个而单独存在是不行的，因为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印度大资产阶级是残余的封建主义的主要支持者和保护者，所以打倒帝国主义的斗争和根除封建主义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从另

一个方面来看，因为印度社会主要依靠是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资产阶级庇护下的封建主义，所以清除残余的封建主义的斗争和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印度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互相联系得非常紧密的。此外，在当代除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以外，任何其它的阶级和政党都不能领导民族和民主革命。工人阶级领导的一个列宁主义原则是对农民的领导。在土地革命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和领导起来才能领导革命，把农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掠夺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也就能为把自己从被雇佣和被奴役中解放出来而铺平道路，经过民主主义阶段就能把革命推进到下一个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而这个社会主义是使工人阶级从被雇佣和被奴役的枷锁下真正获得解放的道路。如果把占半殖民地半封建印度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的、世世代代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排除在外，印度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民族民主革命也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土地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

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

三十、今日印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印度人民民主革命的进攻目标。清除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立一个新的人民民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是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标。只有达到这个目标才能为印度社会的全面进步扫清道路，才能解除人民的痛苦和贫困，解决经济、政治和社会的问题，才能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础。为争取人民民主而进行的斗争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

为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是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反对以美苏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印度大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这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搏斗。

人民民主国家和政治

三十一、经过武装斗争推翻今天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专制的国家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或建立人民民主乃是人民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

三十二、人民民主的国家或人民民主意味着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下建立起来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处于萌芽状态的一种特殊的工人阶级专政。这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

三十三、这个特殊的国家制度的特点是：

(1) 只有工人阶级能够通过共产党领导这种国家；这是其它任何政党和阶级所不能做到的。没有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不可能建立萌芽状态的工人阶级专政。

(2) 没有工农的革命联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国家；因为这两个阶级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而这个工农联盟是广泛的反帝反封建阵线的基础。

(3) 这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人民民主的国家。这个国家保护人民，极大地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并实行人民民主。在这个国家里，人民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等一切自由。建立从乡村到印度全国的各级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实行所有的人（当然是除反动分子以外的所有人）都享有投票权的选举制度。这样，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就能够充分地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水平，就能最大限度地加强人民革命斗争，反对革命的敌人。民主集中制的这个政府的政治形式是人民民主国家或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

(4) 这种国家是对反动派、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一种专政。这个国家对反动派及其反动活动不采取任何宽容的政策，而对他们的捣乱、破坏和颠覆活动实行坚决的镇压。作为对反动派（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反动派）实行镇压的武器，强大的国家机器——主要包括人民军

队、民兵、人民警察、人民法院等——是人民民主国家的不可分割的并且是极其重要和必要的部分。

(5) 这个人民民主专政将同国际革命力量紧紧地结成联盟。建立为了反对以国际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和宪兵美国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首的全世界反动派的国际反革命联盟的、以世界革命主要堡垒和卫士伟大的中国为首的、以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等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工人阶级为中心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国际革命统一战线，并不断加强这个统一战线，这将是人民民主国家对外政策中最本质的东西。不建立这样统一战线就不能使印度革命战胜国际反动势力，就不能捍卫这个革命，也就不可能给其它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以积极的支持和援助。正如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和伟大导师毛泽东所说的，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参加世界反革命；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一边，参加世界革命。两者必居其一。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人民民主国家无疑将采取第二条道路。

三十四、在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广大人民群众联合的统一战线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印度的代理人（为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并且把这个统一战线向前推进，建立以共产党及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这是人民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

三十五、只有这种人民民主的国家才能领导人民，经过印度革命的第一阶段，继续朝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

人民民主的经济

三十六、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开辟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人民民主或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任务。

三十七、必须没收外国资本及印度的买办资本所经营的大银行，大型工商企业，归人民民主国家所有。为了实行限制资本的政策，国家必须掌握对垄断的工商业的领导和管理权。人民民主国家将不没收其它私人财产，对没有能力控制人民生活的那部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将不加阻碍。由于没收帝国主义及其印度买办资本家的资本并将它变为人民民主国家的财产，这样不仅将消灭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残酷剥削和掠夺，而且人民民主政府将控制和领导全国的资本和经济。

三十八、将没收大地主和焦达尔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占有土地非常少的农民，以便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这还不能叫社会主义的农业制度，这只是把土地变成了农民的私有财产。将消灭高利贷者和商人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半封建的剥削将被连根铲除。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消灭高利贷者和商人的剥削，开展自

愿的合作化运动，建立并发展属于人民民主国家的国营商业——这一切都将得到鼓励。这一切又将为公社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铺平道路。在所有这些方面将采用伟大中国的宝贵经验。土地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

三十四、消灭残余的封建主义，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官僚资本，收归人民民主政府所有，并通过建立人民民主政府对全国经济的控制和领导，为印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铺平道路——这些对人民民主的经济是极其重要的。而人民民主经济的发展又将奠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人民民主的文化

三十五、（1）消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现阶段文化领域里的革命任务。人民民主的文化就是在工人阶级文化思想或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人民民主的文化。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经济和政治是这个人民民主文化的基础。人民民主的文化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文化。

这个文化在国际上同争取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

义的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同各国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的文化互相相成的。在另一方面，它同任何国家的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的帝国主义文化不可能有任何关系。人民民主的文化是国际上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的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2) 现代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敌人，也是人民民主思想的敌人。不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就不可能建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文化。

全世界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都企图在思想上麻痹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把他们引入歧途，并使他们背离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和专政的学说。

全世界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都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及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总规律的普遍真理，否认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世界上的普遍意义。他们反对马列主义的最高形式——毛泽东思想。

全世界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为适应帝国主义在目前阶段的需要，掩护帝国主义的新形式——新殖民主义，掩护新殖民主义的头子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他们妄图以此来保护帝国主义及其仆从，使他们免受人民的愤恨。他们千方百计地反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族和民主革命。

全世界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都妄图使人民背离人民解放的唯一道路——毛泽东所指明的人民战争的道路，妄图使人民背离经过武装斗争打碎反动的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来建立革命人民的武装政权的道路。他们竭力宣扬的“和平道路”、“议会道路”或“投票选举的道路”是反对革命的道路，是反革命道路。他们把人民群众的运动仅仅局限于为眼前的一点点迫切利益和要求而进行的斗争。

执政的苏修帝国主义不择手段地，甚至用军事援助来加强各国反动集团，以反对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各国解放运动及解放运动的堡垒伟大的中国，参加包围伟大中国的帝国主义阴谋，甚至采取了在中国内部组织颠覆活动和武装侵略中国等手段企图消灭伟大的中国。他们妄图阻止伟大的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前进，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也是他们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全世界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都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打掩护，并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支持。

事实上，以苏修帝国主义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是国际反革命阵营的成员。印度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也正是如此。印度修正主义者正是国际修正主义集团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及其门徒印度修正主义集

团，就不可能引导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也就不可能把印度的革命向前推进。

毛泽东思想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强大的武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形式。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目前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最后（彻底）崩溃的时代，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最后崩溃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依据毛泽东思想就能把印度及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前进。毛泽东思想是印度及世界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指路明灯。毛泽东思想也是人民民主文化的思想基础。

（3）沒有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广泛地宣传人民民主的文化，就不可能在思想上把人民武装起来，也就不可能引导人民走上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

为了印度革命的成功，就必须建立并不断加强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战线。这个人民民主的文化战线将是反帝反封建的、总的革命人民民主阵线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教育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是这个文化战线的任务之一。

我们必须遵循毛泽东的伟大教导：**“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

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

(4) 人民民主的国家将致力于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的工作。在经济、政治、哲学、军事科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破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牢固地树立人民民主的文化。国家的宣传机器、文化和教育机关和学校以及整个教育系统将被广泛地用来为达到此目的而服务。

各民族团结的基础

三十六、在很多民族和部族共同居住的印度，在民族问题上，共产党人、人民民主战线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政策是：

(1) 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制造民族分裂和不团结的一切阴谋而进行斗争，把各族人民联合在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中，并领导他们走上土地革命、民族和民主革命或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

(2) 根除对落后的民族和部族所进行的民族剥削和压迫，保障所有的民族和部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其中包括各民族语言的发展）；

(3) 在理论和实践上执行一切民族独立自主的原则。在一切民族拥有平等权利、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即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加入印度人民民主联合共和国或

者按照自己的愿望有权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的基础上，在各族人民之间建立团结、友好的关系。

这个政策不仅对印度各民族，而且对全世界各民族自愿地实行国际大联合的最终目的也是完全适合的。

革命的方法

人民战争的道路就是人民民主的道路

三十七、（1）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和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外阶级的武器。在沒有阶级的时候，国家也就不再存在了。今天的印度的国家机器是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镇压工农和人民的武器。脱离人民的、为镇压人民而建立的官厅雇佣武装军队是今日印度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归根结底，这个雇佣的武装军队是统治者镇压人民的主要武器。这个武装军队是他们的护身符之一。在印度也象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统治集团正在逐步强化国家机器，特别是军事组织。在过去几年里打着“保卫国家”和防务的幌子，从人民的腰包里榨取的、用以维持军队和警察的费用增加了好几倍（此外还有帝国主义本身的军队）。其目标之一是镇压印度人民。

印度人民不打破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国家机器及其主要成分雇佣武装军队，不建立革命人民的武装政权是不

能获得政权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给全世界人民指出了这一真理：“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他指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毛泽东的这一教导适合于各国，也适合于印度。印度人民只有用武装的革命战争推翻反动的统治者及其国家力量，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制度，才能建立新印度，人民民主的印度。这个武装的革命战争是武装的群众的战争，是毛泽东指出的人民战争。只有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指出的道路，伟大中国的革命道路，“人民战争的道路”才是印度人民真正解放的道路。

(3) 帝国主义及其在印度的代理人为了使印度人民离开真正的解放道路，脱离武装的人民战争的道路，而陷入所谓的“和平道路”，“议会道路”的罗网中去，为了掩盖半封建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和统治，制造了所谓“议会制度”和“选举”的骗局。所谓的“印度民主”和“议会制度”就是反动统治者对人民实行暴力统治和压迫的工具，掩盖雇佣武装军队的假面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象印度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在专制的新法

西斯主义国家范围内的议会选举不仅是绝对无助于革命发展的，相反会阻碍革命的发展。所有这些国家的革命者对于参加反动统治者所组织的选举就连作为权宜之计来接受也是不应该的。印度如果有真正的革命共产党的领导，就应该号召抵制从一九五二年第一次选举开始的每一次选举，正象緬共领导所做的那样。实际上在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印修集团支持下的帝国主义者和他们在印度的代理人是要使人民脱离特仑甘纳道路而束缚于“议会制度”的枷锁中。

“议会道路”不是革命的道路，也不能通向革命的道路。不能把革命前的俄国的例子拿到印度来——革命前的俄国和今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印度两者之间在地点、时间和客观条件上有着根本的区别。

(4) 印度的人民民主革命和世界上所有其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样，只能走毛泽东指出的道路，只能通过武装斗争走持久的人民战争的道路。毛泽东提出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人民军队，开展农村武装游击战争，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封建主义的代理人地痞流氓和劣绅，推翻封建统治，通过解放农民，在农村，建立巩固的强大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地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以及从反动派手里夺取全国政权的持久的革命战争的道路是印度人民解放的道路，是实现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三个武器

三十八、印度存在着很好的革命形势。要战胜印度革命的敌人，要消灭敌人的国家武装力量必须有三个武器。这就是：

(1) 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全世界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教导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这个党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必须是用“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有纪律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和“联系人民群众的。”没有一个这样的党就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

(2) 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下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他还指出：这个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是雇佣的官军军队。“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他还指出，不

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还要大办民兵师。人民的游击战争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

“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是毛主席关于党和人民军队关系的原则问题的教导。

(3) **“一个由这样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还指出：这个统一战线是为进行武装斗争所必须的，不是为了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府的职位。

只有印度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才是这个民主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没有工人阶级及共产党在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领导，革命的统一战线是不会建立的，革命也是不会成功的。

工人阶级的主要朋友是农民，特别是农业工人和贫农。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才是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基础或根基。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没有坚强的、战斗的工农联盟，要建立各个革命阶级和革命党派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就等于空中楼阁。

中农也可以成为革命的可靠的朋友，必须竭力争取他们。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功地争取农村中的中农。

富农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保持中立或在革命发展的一个特别阶段有可能参加统一战线。

各个中等阶层——职员、自由职业者（医生、律

师、工程师、教员和记者等)、小商人、店主、学生——他们的绝大部分是会参加统一战线的。知识分子中的反动分子主要是中上层特别是生活优厚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将会加入反革命阵营。

中小资产阶级在革命发展的一个阶段（不是全部阶段）也将加入这个战线。因为，实际上，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他们的走狗和官厅资本的压力下，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了破坏，阻碍了他们发展的道路。

致力于建设这三大法宝或武器是所有共产党人和有觉悟人民的不可推御的责任。

印度革命的国际意义

三十九、印度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不仅会使本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和他们在印度的代理人的剥削和压迫，而且会把全世界人民争取独立、民主、社会主义和和平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印度革命的成功，将是在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人剥削人的新世界的道路上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

印度及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都希望：印度将迅速地作为人民民主国家，加入伟大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行列。

“最后，简略地谈谈一下‘权威’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持有知识分子激进派的一般看法，即似乎是革

命的抽象的议论：‘不要任何权威’。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的顽强的斗争以争取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当然，这只是说，年青的工人需要那些进行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的老战士的经验，需要那些进行过多次罢工、参加过一系列革命活动、有革命传统和远大政治眼光的精明能干的战士的经验。每一个国家的无产者都需要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权威。为了阐明我们党的纲领和策略，我们需要全世界范围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理论权威。但是这种权威当然同资产阶级科学和警察政治的御用权威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这种权威是同全世界社会主义大军并肩进行多方面的斗争的权威。正因为这种权威对扩大战士的眼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工人政党中决不容许妄图从旁边，在远处解决当前政治中的实际而具体的问题。每一个国家进行直接斗争的先进的自觉的工人集体，永远是解决所有上述问题的最卓越的权威。”（《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中文版398页）

（译自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南国》双周报）

关于印度革命的战略问题 (供讨论)

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而且经验也已经证明了，这条真理：统治阶级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严重的危机的时候也不会自动地放弃政权。印度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者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也不会自行消灭。除非采用暴力来对付它们的武力，并且消灭它们，否则不可能使人民建立自己的政权。

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

二、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印度的革命。印度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印度人民要完成这个中心任务，就必须组织武装的人民军队，必须通过战争来消灭反革命的、印度的军事势力，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制度、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政治领导来替代之。通过战争砸烂反动统治集团的独裁的国家机器即军队、官厅、警察等，从而建立起人民

的国家机器，这就是印度人民民主革命的首要的中心任务。

三、战略路线就是完成这个革命的中心任务即：通过武力和战争夺取政权的策略方针。要执行哪种战略路线才能完成印度革命的中心任务呢？

走苏联革命的道路 还是走中国革命的道路？

四、迄今为止，工人阶级所举行的革命，基本上是采用两种战略获得了成功。一种是，十月革命的战略。第二种是，中国革命的战略。

五、苏联革命的战略是：城市是敌人的国家机器的强大的、有组织的指挥中心，首先向城市和城市中心猛烈的进攻，粉碎敌人的国家机器，在城市建立起革命的国家政权，然后，把革命扩展到农村地区即逐渐向农村推进打碎敌人的国家机器。首先夺取城市，在城市建立革命的政权。这样，从反动派手里夺取全国的国家政权，建立革命的政权。

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尾，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了世界帝国主义内部的不可避免的危机更加深化。

殖民地各国是帝国主义制度的顽固的堡垒。帝国主义者由于对殖民地国家进行剥削和压榨，使自己繁荣富强起来。

苏联革命的伟大胜利，使殖民地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它在本国的走狗的民族解放革命出现了高潮。

在这种情况下，向殖民地各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战略的问题，即殖民地各国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将采用哪种战略？苏联革命的战略？城市是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风暴的中心吗？象布尔什维克那样，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人也是最大地强调城市工作吗？

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国党从理论上实践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从右和左的许多偏差和错误中取得了大量的经验。中国党由于从这些经验中获得了教育，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些斗争和胜利具有国际意义，并得出了这样的真理：

苏联革命的战略或道路，不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各国的民族和民主革命。这些国家的革命只有采用毛主席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战略和走中国革命的道路，才能取得胜利。

这个战略是什么？这个道路是什么？

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和封建阶

级的走狗——土豪劣绅，消灭封建统治和通过解放农民获得广大农民的武装革命力量的无穷泉源，组织农民作为革命斗争的强大的支持者和合作者，建立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和民兵，依靠广大农村，建立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根据地或解放区并把它逐渐扩展到农村，逐步造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将看到：敌人控制的的城市象处在汪洋大海中一样，成为农村解放区的许多小小的孤岛）最后夺取城市，彻底砸烂反动的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制度和政治领导——这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持久的人民战争的道路，也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和中国革命的道路。

七、在中国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后，已将二十年了。在这期间，在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历史上，如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刚果、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三鼻给、罗得西亚、巴勒斯坦和拉丁美洲国家等群众斗争的历史上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这些国家的直接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和半封建各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都采用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已经、正在和将要获得胜利。

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的道路 就是印度的道路

这种战略适用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印度。只有走毛泽东主席所指引的持久的人民战争的道路，走中国革命的道路，印度的民族和民主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九、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象一切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一样，印度的广大农村地区是印度革命的敌人或反动派的势力薄弱的地区。

第一，印度农村地区是反革命军事势力最薄弱的地区。反革命的军事势力没有也不可能平均分布在这个广阔的次大陆的所有地区上，一旦在这样一个大国的所有地区都驻有相当数量的军队的话，社会生产将停止下来，经济将瘫痪，国家将变得贫穷不堪。

为此，反革命者把他们的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城市（或者是不得不把武装力量放在城市）。他们在城市加强武装力量（现在）。

此外，一方面，在印度的广大农村地区，反革命的武装部队的力量非常分散，由于通讯设置之分散，联络也困难，另一方面，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民的队伍——人民军队和民兵能够根据需要前进或后退。考虑到

农村地区广阔、通讯设置分散和远离军事中心的农村地区的全部情况，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反动武装力量无疑是很薄弱，不得不薄弱。从军事上来说，进攻农村，对革命力量来说是最有利的。

这是不能接受的：人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比敌人的武装力量弱，这是暂时的。人民的武装力量在言论和行动上正确地执行毛泽东指出的群众路线和持久的人民战争的政策，坚定不移地、忠实地实行毛泽东的作为人民战争的军事原则的十条政策，能够逐步地、有计划地获得发展并超过敌人的武装力量，最后能够彻底地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

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但是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总体上必须藐视一切敌人，但在某个具体战争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保卫自己和消灭敌人”的基本原则，首先是“**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执行毛泽东的关于人民战争的这个教导——这是人民战争胜利的诸条件中的一个条件。

第二，由于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印度农村地区，特别是偏僻的农村地区在经济上对城市的依赖少。因此，从敌人手里解放出来的农村地区在经济上有某种程度上能够作为自力更生的地区坚持下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沿着发展经济的道路前进。在反对敌人

的斗争中根据地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能够和将会大大地帮助扩大革命人民的力量和增强他们的才能。要特别强调解放区生产的发展，这是革命战争胜利的诸条件中的一个条件。

第三，象一切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一样，在印度，人民的大部分（几乎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是农民。他们（即这个农民阶级）受印度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压迫和折磨。他们不得不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一方面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地主、高利贷和商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包括社会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在这两座大山的压迫下阻止了印度农业、工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帝国主义及其买办资本集团和封建主义剥削和压迫不仅使工人阶级的发展停顿而且使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贫困。

如果没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家）的民族和民主革命，一方面不可能为农业、工业、经济和社会发展扫清道路，不可能使工人阶级获得真正的解放，不可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真正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不可能使农民获得解放。工人阶级的解放问题与民族和民主革命或与人民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农民阶级的解放问题也同样地与此联系在一起。

现时代，民族和民主革命再也不是以资产阶级为领

导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这个革命。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制度的压迫下灾难深重的和受折磨的农民阶级是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在民族和民主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只有引导农民群众向着毛泽东所指引的人民战争的道路前进，才能取得领导权。这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策略原则和条件。

这个武装斗争只有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集团的人民群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即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这是革命的武器之一。

十、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只有以土地革命为纲，依靠农村，依靠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和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遵循毛泽东所指引的道路，提高农民的觉悟并把农民组织起来，摆脱反动派的剥削和统治，才能把广阔的农村逐步地建设成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自力更生的、强大的和可靠的革命阵地，才能从农村向敌人的比较强大的阵地——城市发动有效的和强大的进攻，才能使城市摆脱敌人的控制，只有这样采取持久的人民战争的道路，才能在全国建立起人民的政权。

象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一样。争取印度解放的革命风暴中心是印度的广阔的农村，印

度人民只有走毛泽东所指引的道路，采取中国革命的策略或道路，才能推翻压在印度人民头上的大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才能建设一个新的印度。

**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是主要的任务，
是一切任务的中心**

十一、这个战略指出，印度共产党当前必须极端重视农村，特别要重视远离城市的农村工作。依靠农民、使农民摆脱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政治和思想的影响，提高他们的革命的觉悟并组织他们通过武装的土地革命在毛泽东所指引的道路上建立农村根据地，使印度的革命沿着胜利的道路前进，这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工作中心。中国党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相信群众的力量，首先，要团结农民阶级，并在巩固的基础上建立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首要的基本任务是在农村进行工作，并且启发他们的（农民阶级的）阶级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未查到原文——译者）必须要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实现这个纲领。

十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一次又一次地为了破坏农民的武装斗争，为了使农民解除武装，为了阻止运动，全力以赴地一直在兜售“和平道路”和“议会道路”的货色。在特仑甘纳、纳萨尔巴里运动中他们所

起的作用，就是它们的一个不可辩驳的例证。他们用法律上的土改来欺骗农民，企图使农民脱离武装斗争的道路，使他们的斗争局限于为达到某些要求而举行的运动中——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伎俩。正因为这样，中国党认为，目前为了要把农民革命推向前进并取得胜利，就“必须要百倍提高”工人、农民以及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就“必须要对修正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进行坚决地斗争”。

中国党非常清楚地指出：“印度的贫苦农民阶级为了反对夺地，夺回土地、减租及反对各种苛捐杂税而举行的一切运动同‘武装夺取政权’的一切斗争结合起来，必须把武装斗争当作斗争的主要形式，否则就不可能彻底推翻封建主义，使农民获得彻底的解放。”“农民只有通过革命的武装才能夺回自己的土地，才能保持自己土地的权利，获得彻底的解放，否则他们将一无所得。如果在获得土地以后，放弃武装斗争，就会丧失用革命得来的一切成果。”（未查到原文——译者）必须要中国党的这一教导贯彻到实践中去。

十三、把武装斗争当作主要形式，把建立革命的根据地摆在首位并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这并不意味着要忽视或轻视革命斗争的其它形式和城市工作。毛泽东主席指出：仅仅依靠武装斗争或农村，就不可能进行革命斗争。

十四、抛弃革命斗争的其它形式而仅仅依靠武装斗争，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要把所有人民群众的各个阶层的斗争和革命斗争的各种形式同斗争的主要形式——武装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

十五、我们既要把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工作摆在首位，但又不能放弃城市工作。因为，第一：在解放农村和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前忽视城市，就意味着放弃城市，让敌人在城市里横行霸道，就意味着让敌人畅行无阻地集聚力量，并向敌人提供全力以赴地反对农村的革命斗争的机会，进而削弱农村的斗争；第二：在城市革命政治和斗争的传播能够并将促使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先进分子到农村去直接参加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在城市，革命政治和斗争的广泛的传播，将促使来自农村的、与农村保持直接联系的无数的劳动人民用革命的思想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将大大地有助于在农村传播革命的政治、开展运动和建立组织的工作。能够并将尽可能地用各种方式给予直接地或间接地帮助农村的斗争。忽视城市工作就意味着取消这一切；第三：放弃城市工作就会使革命的根据地孤立起来，其结果使革命遭受失败；第四：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从敌人手里夺取敌人的城市基地，要是忽视城市就不可能达到这个最终目的。

十六、实际上，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并将革命进行到取得最后胜利，这不仅仅是农民阶级的任务。沒

有城市的每个革命阶级和阶层，特别是沒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积极作用、支援和支持，这个伟大的变化过程就不可能胜利地进行下去。用阶级觉悟和领导觉悟启发城市的工人阶级，使他们积极起来，在他们中间培养积极的组织者即干部，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发动和组织一切革命人民，使革命活动活跃起来，这就是城市任务之一。

反动派和一切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者，从思想上瓦解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它们就是新殖民主义和半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捐客之一。一切修正主义者兜售新殖民主义的“和平道路”和“议会道路”的黑货，他们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敌人之一，如果不把它们反革命的思想 and 政治揭露于众，就不可能使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一切反动派和形形色色的反动的修正主义者象对待农民运动一样，也企图把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局限于经济的、部分的要求和改良运动的范畴之内。共产党员必须要积极起来挫败他们的这种反动的政治。共产党员必须要领导人民群众的这些运动，但是领导这一切经济的和部分要求的运动不是他们的唯一任务，甚至也不是他们的任务之一。必须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开展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土地革命和人民民主的政治和理论的运动，围绕国内和

国际的每个事件和情况组织政治运动，并且必须使工人阶级及人民群众的绝大部分积极 参加到 每一个政治运动中 来，必须要把宣传运动与群众斗争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工人阶级真正具有革命性和责任性，才能使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真正积极地参加革命工作。城市的一切活动必须要达到以下的主要目标：工人阶级及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到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中去，把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培养成为建立根据地的组织者或战士并使他们投入到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中去，在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与农村有联系的劳动人民中）也要建立革命的组织，以便使 they 与农村保持正常的和密切的联系，以便在建立根据地、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方面予以直接的或间接的各种各样的帮助。城市的组织应该有利于以农村包围城市并夺取城市。在这一切工作中革命的学生和青年将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

十七、如果要在城市进行这些工作，在城市里也必然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有组织的革命的共产党。在城市设立党中央，农村和城市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党中央，同样，在党的中央不可避免地要转移到农村之后，农村和城市的一切活动也将服从党中央。

十八、目前印度共产党内绝大部分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在他们中绝大部分还未能在言论和行动上与农民打成一片。这是一个最大的弱点。光靠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少数先进分子，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共产党。如果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和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农业工人、贫民不能逐渐地摆脱长期以来受一切反动派、修正主义思想和政治的影响，不能起来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进行战斗的话，就不可能使他们积极参加土地革命的工作，就不可能组织他们在农村进行游击战，就不可能建立作为民兵和人民游击战的主力军——红军，不可能建立为武装斗争所必需的统一战线的基础——真正的工农战斗联盟。如果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领导觉悟，不发动他们参加武装斗争，不把他们中间的有阶级觉悟的和在斗争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的话，也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来。如果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要使土地革命及人民民主革命获得胜利，要有革命的三个武器，即建立一个革命党，在这个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就必须以工人、农业工人和贫农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只有工人阶级实行全面的领导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发展和彻底的胜利。共产党员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提高他们的觉悟和使他们积极起来。

译自《南国》双周报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

依靠毛泽东思想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作者：琴都·鲍雅尔

在革命阵营内某些人说，《南国》双周刊（以下简称《南国》）惯于搞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纳萨尔巴里的旗帜反对纳萨尔巴里的可耻勾当。”——《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说，《南国》变成了反革命了。我们认为，这样的批评是反对革命，完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毛泽东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毛泽东说：“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现在来说，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南国》站在这四个敌人方面还是站在

这四座大山方面呢？大家都知道，《南国》与这四个敌人进行了剧烈的斗争。此外，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为了开展人民战争，推翻这四座大山正在积极地进行工作。《南国》在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中不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动人民战争。在农村在为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作组织工作。搞这一切工作是为了推翻这四座大山还是支持这四座大山呢？我们为了推翻这四座大山正在进行工作，因此，我们是为人民利益进行工作的。我们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毛（泽东）主义者。因此说我们是反革命的人是反毛（泽东）的，他们在革命人民中间制造混乱。毛泽东说，谁是反革命？那些支持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和官僚资本以及为它们效劳的人都是反革命的。因此，那些把人民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看作唯一的利益的人，那些诚心诚意要推翻四座大山的人，那些不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任意地把任何人打成反革命。

《爱国者》周报在一篇文章中说，“革命者庄严地宣誓：‘谁不承认查鲁·马宗达同志领导下的印共（马列）的革命权威，就与谁没有合作的余地。’”这难道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吗？口头上说承认中国党的领导，而事实上是反对的。因为中国党说，“毛主席在当时还指

出，我们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坚决依靠贫农，团结其他革命分子，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六日，《北京周报》第六十九期。中国领导说，“团结其他革命分子”，而印共（马列）的机关报《爱国者》周报不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并用非马克思的语言加以指责。

“他们（指印共〔马列〕——译注）抛弃群众组织的公开活动，投身到建党的工作中去。”但是从这种说法中可以得出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全面的、极端的、片面的。

毛泽东同志说：“**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文版，第六三〇页。

毛泽东说，即使强调了武装斗争，但是还必须开展其它形式的斗争。但是《爱国者》周报片面地反对这种斗争，反对毛泽东思想。关于革命的群众组织，国际领导说，“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我们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迅猛异常。在中共韶山党支部的具体领导下，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相继建立，游行示威、政治集会的队伍浩浩荡荡，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威风。”——《爱国者》周报十月十六日，

《北京周报》第六十九期。国际领导说明了革命的群众组织的重要性。这种革命群众组织有助于开展人民战争，加强武装斗争；而印共（马列）片面地反对革命的群众组织，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然，在口头上他们也说建立党组织的重要性。但事实上只是建立群众组织——如果认为只是建立群众组织，党组织自然而然地就会建立起来，这种思想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思想。《南国》对这种思想正在进行不懈的斗争。《爱国者》周报也为反对这条路线而进行斗争，发表了题为《一条危险的路线》的文章。

《爱国者》周报曾经连篇累牍地发表工会选举胜利的消息。但是在反对或纠正过去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中非常缺乏必要的耐心和自我批评，又执行了另一个极端的路线。此外，制造这样的一种气氛：好象是没有必要有任何革命群众组织，一切由党组织代替。虽然我们注意到了：他们在斯里卡库兰和曼蒂尼波尔已经建立了革命的群众组织，但是，我们认为，他们把建立革命的群众组织看作是十分简单的工作。因此污蔑《南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从一九六六年起，《南国》把建党工作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看作是主要的工作。《南国》根据这个思想来进行工作，并且在谈到迫切需要及时地组织革命的群众组织时一直认为，革命的组织将加强农村的

武装斗争，将组织农村和城市的斗争和人民的运动。因此，《南国》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工作的。

国际领导又说：“印度共产党（马列）的党员和其他印度革命者为实现推翻印度反动统治和使人民从剥削和压迫中取得完全解放的伟大理想，深入到封建主义压迫严重和阶级斗争尖锐的一切地方去进行工作。”——《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周报》第四十四期。中国共产党承认其他印度革命派和印度共产党（马列）同时存在。而印共（马列）的领导采取非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污蔑我们说，《南国》是所谓“政治掮客”（《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这种污蔑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其结果，在建立革命人民的团结方面添设了巨大的阻碍，帮助了阶级敌人。今天必须建立革命群众和革命的阶级的团结。但是按照《爱国者》周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谩骂决不能有助于建立这个团结。而国际领导特别强调这种团结。

说什么《南国》是所谓“大政治家或理论家”（《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这种指责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同志说：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的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

十四日)

因此，开展思想和理论的斗争是特别必要的。因为毛泽东同志说，“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毛泽东同志又说：“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毛泽东同志说，“思想和政治斗争”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强调。斯大林同志也把“革命的理论”看作是指南。伟大的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如果《南国》按照这些伟大导师的指导，正确强调在思想、理论和政治方面的领导工作，那么对它进行污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呢？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工作呢？因为，国际领导说，“我们韶山人民和全国人民坚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旦同印度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强大的物质力量，就会变成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北京周报》第三十八期，《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六日。《南国》根据国际领导的指示，利用它的有限的力量进行思想、理论和政治工作。因此，如果不进行任何思想分析，就污蔑《南国》，就意味着借毛泽东思想名

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诚肯地希望所有共产党革命派更要百倍地加强意识形态的斗争。我们与国际领导的看法是一致的，应该掀起意识形态斗争的风暴。按照矛盾论来分析：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和人民战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部联系。如：参加人民战争有助于理解毛泽东思想和丰富毛泽东思想；而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开辟了进行人民战争的场所，把正在进行的人民战争引向正确的、持久的、胜利的道路。

林彪同志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在阐明意识形态斗争的深远意义时，用毛主席的非常重要的语录说：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今天，这对印度革命来说有特别重要意义。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以及它们的代理人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和假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印度人民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都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恳切要求那些把意识形态和政治工作污蔑成当“政治家和理论家”的人要深刻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在“九大”报告中林彪同志用的另一段毛主席语录也是特别重要的。**“只有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要使印

度的人民民主革命获得胜利，就必须使千百万人民参加持久的人民战争。如果使千百万人民提高觉悟，就必须开展“大辩论”。《南国》为此正在积极进行。《南国》为了推动大辩论号召革命人民参加意识形态和理论的革命，使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起来参加武装斗争。

《南国》只是忙于搞意识形态和理论工作吗？不是，完全不是这样。《南国》从一开始就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学习和在工作中运用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南国》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把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并深入各个农村地区。《南国》制订了在农村地区的工作纲领。《南国》的一切干部和工作人员强调在受封建压迫严重和阶级矛盾尖锐的一切地方进行工作。按照国际领导的指示，“他们把在农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他们的首要任务，在贫农中热情地传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关于在农村地区各阶级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态度的典型调查，制订在农村工作的阶级路线，提出在农村地区发动农民革命和消灭封建主义的任务。”——《北京周报》第四十四期，《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在提高革命农民的觉悟和组织农民之后，《南国》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首先帮助建立农民的武装组织——游

击小组和农民自卫队，以便向农村地区的封建主义势力进行进攻，并消灭之，这样来把武装斗争引向胜利的道路。在这方面的工作中，我们在组织上是薄弱的，并且要克服自发倾向。只有向自发倾向作斗争，才能团结起来。

《南国》强调农村工作，并不是轻视城市工作。因为毛泽东同志说：“**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南国》在城市进行工作，是按照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路线和方法进行的。如：现代中国革命史说：“**党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党在工人住宅区开办夜校，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育工人、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党在适当的时候提出最迫切的要求，领导他们斗争。在进行斗争时和斗争取得胜利后，一刻也不要忽视组织工人和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南国》也或多或少在工人中进行了工作。《南国》认为，用马克思主

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城市工人、学生、青年的政治觉悟，应该建立千百个革命政治组织。

《南国》在工作中一直试图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南国》不认为，只有经过组织选举建立各级委员会，才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唯一标准。选举的必要性当然是存在着的。但是，《南国》不认为，通过选举而产生的任何组织，才是维护了民主。许多人认为，各级委员会是通过选举由下而上产生的，因此完全正确的。这种想法完全是机械的。在许多情况下，选举可能受到合法化和派性的约束。请回顾一下丹吉集团以及后来的孙达拉雅—普罗莫德·达斯·古普塔集团吧。因此，虽然选举是必要的，但光为选举而大喊大叫是不行的。印度共产党(马列)或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中心是否由选举产生的，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大问题是，要看组织内部是否已经真正造成了浓厚的政治气氛。大问题是，由上而下都应该有进行批评的权利。任何党员对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有不同的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越过上一级领导，包括直接向中央、中央政治局和更高级的领导报告。《南国》将不给任何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宣布为修正主义分子，或者是反革命分子。它将一定要耐心地听取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的意见，并加以说服他们。它将努力地使他们克服错误思想。《南国》将试图“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

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关于组织纪律，《南国》认为：

- (一) 个人服从组织；
- (二) 少数服从多数；
- (三) 下级服从上级；
- (四) 全党服从中央。

《南国》认为，凡是坚持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局面的组织，它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真正的组织。我们支持对人民的敌人进行的任何斗争。《南国》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种斗争推向前进。不管谁领导这场斗争，只要这场斗争有人民参加，并且是打击阶级敌人和国家政权的，《南国》将一定要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去，并且把它推向前进。《南国》将不会考虑因这场斗争是某某领导的，因而退出这场斗争。不管谁领导这场斗争，《南国》将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去。它将依据这种政治，阐述这场斗争的意义和重要性。对这场斗争的领导者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批判，甚至必须揭露领导者的反动的本质。通过坚持不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中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建立革命的组织，为建党打下基础。在《南国》看来，把斗争利益、革命利益看作是大

于一切，把人民战争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某个人处于领导地位这不是大于一切问题。革命利益是否得到了，这是大问题。因此，《南国》将全力以赴地投入推翻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所有的斗争中去。《南国》将全力支持一切斗争，以促使人民民主革命及土地革命向前发展，而且自己也积极参加进去。不管谁领导这场斗争，它决不会成为障碍。问题是，群众是否参加这场斗争。《南国》将对群众的参加始终予以高度的评价，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南国》将一刻也不会忘掉人民群众的这一重大的作用。

《南国》从来也没有并且将来也不会采用那种敌对的批评方法。虽然在革命阵营里有些人采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去进行批评，但《南国》将决不会进行不友好的批评。“**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二九—八三〇页。这是一条真理。因此，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的批评都应该是友好的。《南国》不是为

了把人推到反革命的阵营里去而进行批评的。《南国》对其他共产党革命派也有这样的希望：他们在批评《南国》的时候，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应把批评当作咒骂或污蔑。

比如说，一位突然出现的名叫埃·巴苏的人，在前些日子即，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的《爱国者》周报上发表了题为《在写历史的幕后的政治》的一封信。写信者在信中实际上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方法踩在脚下，并匆匆忙忙作出决定，处心积虑地对《南国》进行了攻击，从而完成了其革命任务。写信者在谈到由苏普拉卡希·罗易写的和“急进书店”出版的名叫《卡格特菲伯、松纳尔波尔和彭格尔的农民斗争》的小册子时说，因为，《南国》在很久以前连续地发表了这篇文章，因而罗易是《南国》的理论家。虽然写信者自己也承认，在《南国》上连续地发表的文章同目前由“急进书店”所出版的罗易写的小册子有很大的区别。凡是在《南国》上发表的所有文章的责任都由《南国》来负担，但是其它出版者所再版的文章，《南国》一概不负责任。这是众周所知的。当写文章来进行咒骂的时候，当然不会考虑到运用辩证法的问题。写信者引证罗易的文章的那部分并进行了“批评”（？），《南国》对其中的一段根本没有发表。所有一切都发表在由“急进书店”新出版的小册子上，但是写信者突然跳起来，忘掉

了革命的方法，并且开始进行咒骂。写信者在信里把罗易说成“反革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应尽的责任正确区分人民和敌人的问题，并根据这种情况加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毛泽东同志的语录。他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两类矛盾的性质和它的解决办法混为一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同时，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只有我们掌握好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种批评的方法，才能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对罗易的文章进行批判时应该看到，他在写农民斗争的历史中，他的成绩究竟有多大？他的错误有多少？他的功绩到底多大呢？我们认为，每个共产党革命派都要有历史知识。毛泽东同志在许多地方都提到关于研究历史的极其重要性。比如，他在谈到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情况时说：“**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历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

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文版第七九七页）

我们今天的情况跟中国当时的情况差不多。因此研究我国过去和现在的农民、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历史及其政治教训，当然有着重大意义。同时，我们还应该了解农民的斗争的觉悟以及他们英勇牺牲的历史。我们应该承认，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得很少。当然，最近有些人着手写这方面的问题。没有任何理由忽视罗易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如果说，在他的文章中有什么缺点、不清楚的地方或者在某些地方有什么政治漏洞，应该抱友好的态度，热情地帮助他克服之。这也有正确的解决办法。

“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难道光背诵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教导而不把它贯彻于实践吗？今天我们必须要把它贯彻到工作中去。正如，作者罗易在《卡格特菲伯、松纳尔波尔和彭格尔农民斗争》一文中谈到的：“从纳萨尔巴里蔓延的斗争烈火今天已把孟加拉邦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烧成灰烬。总而言之，纳萨尔巴里的斗争是农民反对统治集团的武装进攻的革命反抗，是农民为着土地和生存而开展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是工农斗争的一种高级形势。”——（《南国》一九六八年，第七、八期合刊第四页。）作者把它说成高级

形式是对的，但应该把高级形式方面的问题表达的更清楚一些（不应当删去）。他应当理解和应当强调指出，纳萨尔巴里的斗争不单纯是为夺地，而是为了夺权。在我们看来，这是作者在写作和理解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但是，写信者则没有找到在《南国》发表的这篇文章的这个弱点，而是带着谩骂的情绪去批判（？），反而抛弃了主要的东西。在这方面情况就是如此。但我们千万不能走这条路，要是走这条路就会扼杀作者的起码的努力，首先把他当作“反革命”，然后给他脸上抹黑。正如今天在许多方面发生的事情是令人痛心的，但这毕竟还是发生了。这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用解决对抗性的或敌对性的矛盾的方法不能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的或非对抗性的矛盾，反而给我们的敌人提供机会。这不是一种粗暴的、忍耐不住的小资产阶级的情绪的表现吗？我们一直主张共产党革命派考虑这个问题，并号召他们对这种有害的和给敌人提供机会的行为进行斗争。我们的斗争口号是团结——批评——团结。

《南国》认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因为，除掉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南国》没有私利。具有武装斗争和其它斗争经验（包括特仑甘纳在内）所有

印度革命派如用自己的经验和见解帮助我们，我们将热情地和虚心地接受这种帮助。如果他们用自己的工作经验给我们指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那么我们一定将毫无犹豫地纠正我们的错误。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南国》现在和将来都采取这个方去进行批评。因为毛泽东同志说过：“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南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是为了达到革命阶级和革命人民之间的团结，因为，如果没有革命人民的巩固的团结，就不可能领导土地革命和人民战争。所以，为了在人民群众之间

越来越团结，《南国》将贯彻“**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民主方法。

《南国》将不会片面地考虑任何问题。因为毛泽东同志说：“**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革命阵营里的某些人对《南国》片面地进行污蔑。我们认为这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但是《南国》决不会片面地谴责任何共产党革命派，将来也不会这样做。因为“**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南国》将牢记毛主席的方法，为了革命利益，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一切事情都要进行分析，并且以友好的批评态度指出事情的好坏两个方面。我们说，印度的革命形势是大好的。但干革命总要有千百万人参加。团结这些人是共产党革命派当前的迫切任务。没有革命人民的团结，就不可能消灭印度人民的敌人帝

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使土地革命获得胜利。

《南国》牢记革命人民的这种团结并按照毛泽东所指示的方法去进行批评。国际领导就团结问题，最近指出：

“那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干革命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南国》热切地希望：革命阵营里的大多数人将执行国际领导所指出的“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的原则，并把它贯彻于他们的一切工作中去。因为，在印度的革命形式下，革命人民之间的团结是很重要的。

最后，我们引证毛主席的一条语录来结束这个评论。

“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

译自一九七〇年二月二日《南国》双周刊

第四部分

喀拉拉邦昆·纳拉扬纳派
的重要文章



特利切里——普尔帕利的一年

昆尼卡尔·纳拉扬纳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凌晨，三百多名用各种手制武器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打算对北马拉巴尔的特利切里的警察局进行出其不意的袭击。他们的计划失败了。他们扔掉了所有的东西逃跑了，逃散在邦里的各个地方，有的还逃到邦外，以躲避警察。这样一来，一个“可笑的”事件（象《新地》周刊的拉姆杰所描述的那样）就失败了，然而正如当时少数几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这个事件还是成为四十八小时之后就在怀纳德山区里十分荒凉的丛林地带发生的斗争的一个序曲。

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同样是凌晨的时候，以土制的枪支、手制炸弹和其它武器武装起来的几十个革命农民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在怀纳德山顶的普尔帕利警察无线电站，并且予以摧毁。在随之发生的混战中，一名警方无线电报务员被打死，一名监察员和几个警察受伤。这些兴高采烈的造反者接着着手打击当地的地主，发动当地的农民。完成计划以后，他们迅速动身去几英里之外的蒂鲁内利森林，等待着特利切里的战友，以便与他们会合，把两股力量合成一股，然后把武装造反的火焰扩散到整

个怀纳德山区，作为结束国大党和修正主义党多年来的反动统治的一个开端。国大党和修正主义党只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应该记住，怀纳德是一向尚武的部族——象今天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库奇人和其他部族人的家乡。甚至在今天在这里仍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属于英国帝国主义种植园主。

普尔帕利的这些同志当时几乎毫不怀疑他们已在特利切里被人出卖了。他们一天又一天在这荒凉的丛林地带等待着，可是并没有得到安慰。他们的人数减少了。在一次引起贮存的炸药爆炸的事故中，他们永远失去了一个最忠实的同志，一个贫苦农民革命者托曼。全副武装的部队——南布迪里巴德政府军在直升飞机和警犬的援助下当时已在扫荡怀纳德的丛林和山谷。这一伙年青的革命者失去了与他们盼望中的任何一个同志见面的希望，在绝望之下分散了，打算在某个地方再会合，但是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上了警察的当而被逮捕了。

这样一来，喀拉拉邦光荣的农民革命史上难忘的一章结束了。大家都知道接着而来的是什么——是社会法西斯南布迪里巴德政府（它只不过是英迪拉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已）恣意对人民和革命者实行白色恐怖统治，对他们进行折磨、关在屋里拷打，甚至关在监牢里进行迫害，其中有十几岁的阿杰塔克斯和她生病的母亲曼达基

尼。

为什么这些年青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要采取武力行动？因为他们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统治下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由于反动政府的存在而多次变得更为严重，例如农民普遍贫困，卷烟业的工人、手工业织布工人以及其他民族工业的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这些问题——是“和平的”议会方法所无法解决的。他们逐渐地，但是确实地开始认识到，除非政权直接掌握在他们手里，否则就无法解决他们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经验教育了他们，无论他们投票选谁上台，谁一旦掌握了政权，总是背叛了他们，并象可恶的国大党政府及其帝国主义主子过去所做的那样打击他们。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把政权直接掌握在他们手里××××××××。

有一段时期，这种思想方法被认为纯粹是发狂。但是时代已经不同了——时代确实已变得无法辨了。在东方，一个新的红太阳不仅升起了，而且不断向全世界放射出灿烂的光芒。这个红太阳迅速驱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陆多年来的黑暗。勇敢的越南农民的功绩，彻底地粉碎了帝国主义者是万能的神话。事实证明帝国主义者是真正的纸老虎。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遍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这已不是虚构，而完全是事实。除了这一切之外还爆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崭新

的惊天动地的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不可更改地和不可避免地表明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正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印度纳萨尔巴里响起了第一声春雷，预示着印度人民将要走的争取自身解放的新道路。

从前被认为完全是办不到、完全是疯狂的事情，现在印度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不再这样认为了。他们认识到国大党总是说谎。他们早已摒弃了它。其它一切反动政党和社会民主党也全都被摒弃了。丹吉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在一九六五年被我国人民送进了坟墓。仅仅剩下了南布迪里巴德—A·K·高普兰之流的修正主义分子。纳萨尔巴里也诅咒他们的死亡。但是马拉巴尔是这些修正主义的头目过去几十年来进行阴谋活动的温床。我们的工人和农民要摆脱修正主义这种致命的毒素的腐蚀性影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他们一九六八年在马拉巴尔北部和怀纳德的丛林中确实是摆脱了这种影响，虽然仅仅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这就是特利切里—普尔帕利发生的情况。我们的人民象决心站起来学习走路的坚强的婴孩一样，由于客观上的需要决心站起来走武装革命的道路。这个婴孩开始学走路时必定是踌躇，摇摇晃晃并跌跤，但是最后必然会迈着稳健的步伐一直走上这条道路，这是千真万确和非常自然的。只有死硬派和修正主义者才不会这样说。

特利切里—普尔帕利的斗争暂时没有达到其目的。但是这个斗争是否获得某种宝贵的东西呢？这个斗争确实是获得了宝贵的东西。这个斗争用生命和鲜血，用具体行动向全国各地，向家家户户传播了一个新的信息，纳萨尔巴里的信息。我们最尊敬、最爱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这条道路深深地铭刻在我国劳苦人民的心上。“毛主席万岁”已成为我国全体人民（当然不包括死硬的反动派和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响亮的口号。这个暴动还对印度共产党——印共（马列）——的诞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有人——有些人是革命队伍内部的，有些人是居于领导地位的——贬低这次暴动，诽谤这次暴动，诋毁积极参加斗争的战士，甚至企图把他们从革命队伍里赶出去。就是在今天，还有些人妄图这样做。历史无疑很快会处置这些新型的篡权者，正象它处置过去也曾玩过这种把戏的其他一切叛徒和修正主义者一样。这是必然的。我们的运动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扼杀已在发动现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利切里—普尔帕利暴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心中点燃的造反精神，这种造反精神现在正传播给喀拉拉邦越来越广泛的革命人民群众。

光荣完全归于纳萨尔巴里的农民武装斗争！

光荣完全归于斯里卡库兰的农民武装斗争！

光荣完全归于特利切里—普尔帕利的农民武装斗争！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语录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

立即向党內处于领导地位的 修正主义作斗争

昆尼卡尔·纳拉扬纳

这是指发表在十一月号《解放》上查鲁·马宗达同志所写的《一个重要文件》。这一个文件刊登在《解放》上，而且是放在这样突出的地位，就必定要引起印度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最密切的注意；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有任何错误思想要冒出它的丑恶脑袋，如果不及时给予批驳，就必定会对整个运动产生有害的后果。由于查鲁·马宗达同志被公认为是党內的主要理论家，情况就更是这样。除了在这篇文章中所特别表露出来的错误思想之外，在这里，我们还愿意指出，当读到同期所刊登

* 此件系昆·纳拉扬纳(喀拉拉邦)寄给我驻印使馆的，原署：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五日于卡利克特。

的另一篇由农民组织者所写的文章《我们的道路——游击战争》时，就可以看出在这一篇文章中是如何含糊其词的表达完全错误的意义。这样，当马宗达同志用含糊不清的词句来表达一种概念时，乍看起来多少还是正确的；而在同期登出的另一篇文章中，用明确的字句来表达的则完全是一种反动的概念。因此，查鲁·马宗达同志的含糊其词，事实上帮助了表现在其他文章中的反动的思想，它使革命者的思想产生糊涂，而这种含糊其词往往加上了权威的标记。让我们细心地来检查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所提到的文件中，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一小标题下，查鲁·马宗达同志公然说：“反对这一根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指搜集武器和准备农村根据地地区）不只是来自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完全露骨地走阶级合作的道路，因此，去掉他们的面具是容易的”。根据他的说法，“在党内另一方面的反对来自教条主义者”，他在结束时说“我们必须特别注意那些人，并通过经验慢慢地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我们不应对他们采取不容忍的态度”。还有第三种同志，他们主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那本坏书中所提倡的自我修养。因此，在党内潜伏着三种危险。在这些危险中，修正主义是容易去除的，教条主义（他阐明这一危险时用了一页半的篇幅）需要特别注意，崇拜自

我修养可用群众路线的原则来纠正。这就是查鲁·马宗达同志对于这些弊病的处方。

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党内潜伏着的几种主要危险是否作这样的区分呢？不是，肯定不是这样。毛泽东思想对这一问题是怎么说的呢？

“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北，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所说的。

今天我们国家的情况是否如此的不同，上述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所提出的准则是否已经过时，对我们不再适用了呢？然而，正是同一个查鲁·马宗达同志在九月号的《解放》上还这样说：“我们党的成长和发展

取决于我们反对党内和党外的修正主义的坚决程度。不仅如此，农民武装斗争的成长和发展也取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因此说，创造斗争的高潮就取决于我们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广泛程度和采用新的工作作风。所以，反对修正主义的清楚的和具体的表现的斗争就成了今天的迫切任务”。（引自他的题为《反对修正主义的具体表现》一文。值得提起的是，北京电台播送了这一篇文章的一大部分。广播时删去的部分也是意味深长的。）

从上文中我们能够理解，在党内表露出来的两种危险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而在两者之中，修正主义是更大的危险。我们还能够用另一种形式来解释这一点，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危险。象经济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等、等等这样的弊病可以广泛地区分为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因此，党的政治决议及时的提出了关于右倾和“左”倾的危险的警告。林彪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总而言之，党外的阶级斗争有它在党内的反映，因此有着它的复杂的性质。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意识形态的表现。

如果我们不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加以清楚的区分，而代之以一时说修正主义是主要的危险，一时说修正主义是容易根除掉的，而教条主义，即“左”的机会主义却需要特别注意，这才是错误的和真正的混乱。而且又将“自我修养”的意识形态谈论成似乎是有别于修正主义的东西。这些肯定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反对修正主义的具体表现》这篇文章是刊登在九月号的《解放》上。在这之后，为什么《将农民斗争推向前》这篇文章刊登在十一月号的《解放》上，并特别在这篇文章之前加上了编者按语《一个重要文件》？当第一篇文章中说，反对修正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一件迫切的任务，而在第二篇文章中却说这一任务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而反对教条主义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篇文章中所有对的地方都被第二篇所抹杀了，而且提醒你，第二篇是“一个重要文件”，这一篇是刊登在《世界革命》杂志上的。北京电台广播了第一篇文章的主要部分这一事实并没有使《解放》的编者觉得有任何的不同。广播时所删去的部分也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编者更有兴趣的是突出一个查鲁·马宗达同志的形象，似乎一九六七年早期的马宗达同志比后来一九六九年的马宗达同志更强。不管马宗达同志知道或者不知道这一点，这种蓄意歪曲的情况正毫无阻止地明目张胆地继续出现在我们眼

前。我们革命者十分关注领导上的这种倾向，并且必须立即对这种倾向作拚死的斗争。

要讨论的另一个例子是是否需要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的群众运动。查鲁·马宗达同志在《一个重要文件》中说，“当然现在就有这样的一种需要，而且将来仍然需要……因此，开展基于部分要求的农民群众运动的时机将是永远存在的，共产党人必须善于利用这种时机”。根据查鲁·马宗达同志这种有点含糊其词的措词，让我们看看在同一期《解放》上“一个农民组织者”在他的题为《我们的道路——游击战争》一文说了些什么。“查鲁·马宗达同志指出，当在任何地区的游击小组开始以这种方式行动时（袭击阶级敌人，消灭他等等，等等），阶级敌人将被迫逃离农村，村子将得到解放。只有那时，我们才必需成立革命的农会。”这就是，在游击行动之前不应有农会。根据我们的“农民组织者”的看法，如果我们事先组织这样的农会，它们将必然是公开的组织，因而就是修正主义的。这一文章的作者，对于秘密建立群众组织和农会的必要只字不提，如同中国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到六月所做的那样，尽管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一事实。照他看，“为了能够坚持革命的道路，革命者必须决不让自己采用任何方式按照修正主义的办法从事建立公开的组织。”他们能够建立的唯一的组织是在游击行动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因此，当

他在查鲁·马宗达同志总结斯里卡库兰经验的幌子下写下所有这些东西时，他就随便地歪曲，甚至否定了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主席在这一问题上说了些什么呢？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用了一整个章节，小标题是“组织起来”，他在结束这一节时说：“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在这里，农民分两个阶段来组织他们自己。首先是地下组织阶段，接着就是公开的组织（在湖南省的统治者被推翻之后），第二阶段是在农民革命行动之后。

我们的农民组织者所蓄意要歪曲的是这一事实：在反动统治之下，农民必须秘密地将自己组织起来。在这里，他只注意到一种可能性，就是公开的组织。因为“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正疯狂地试图瓦解革命者的工作”，他就放弃了组织地下农民组织的工作，为的是害怕这些组织会形成修正主义的公开的组织，并因而放弃了在游击行动之后接着是解放的这一阶段的任务。如果将这种态度再向前发展一步，这位“农民组织者”也将会放弃在游击行动之后阶段的建党工作。因为如果在游击行动之前开始建党，这些也将只能是修正主义的党组织。这样他就有意地或无意地使他自己落到他所如此极力否定的卡斯特罗主义之中。他没有看到建党、武装斗

爭和统一战线是如何的互相关连，沒有看到建立革命的农会——它在敌人面前是秘密的，但在农民面前是公开的——如何直接地领导武装行动，以及这些反过来又如何发动愈来愈多的农民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并投入行动——因而将辯证的过程分割开，而在这一过程中，党起着领导的作用，它本身也得到好处，建立人民军队，建立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等等等等。

我们的农民组织者真是一个诚实的革命战士，但是在他的热情里，他开始将马宗达同志与毛泽东主席同等看待。这是无益的。在这里，他的举止象只会变换主子的终生的奴隶，他甚至更向前走了一步。看他如何将查鲁·马宗达同志称作“我们尊敬的导师和敬爱的领袖查鲁·马宗达同志”！对于他毛主席仅仅是“毛主席”。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在他的心目中，他已经将毛主席的地位换成了马宗达同志，并企图将所有的智慧都归于马宗达同志，而马宗达同志在今天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面前只不过是一个新手而已。

这里，不要责难我们的农民组织者，《解放》的编者必须承担主要的责任。查鲁·马宗达同志对于在党内蓄意鼓励这种主观主义的倾向也要负很大的责任。象“我的人民”、“我的国家”、“我的党”这样的措词不加制止的出现在马宗达同志的一些著作中，并不是沒有任

何意思的。我们还没有从象南布迪里巴德和其他的叛徒那里听够这样的字句吗？为什么查鲁·马宗达同志不能用象“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这样的字句，并最少在我们自己当中对于我们的个人感情表现得谦虚一点呢？让《解放》的编者和马宗达同志不要忘记毛泽东主席下述的基本教导：“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这一公开批评的矛头指向查鲁·马宗达同志，不是因为有任何不良的意图。马宗达同志今天担负着很大的责任，他的肩膀上挑着很重的担子。除非他抛掉从过去所遗传下来的“包袱”，否则他就不能担负起这些责任。他号召我们和修正主义的具体表现作斗争，并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而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不能以蓄意地容忍我们当中的修正主义来反对修正主义，也不能以行动上参与修正主义来反对修正主义。马宗达同志的那种所谓在你参加到武装行动的哪会，所有的修正主义就将会自动地消失（跑掉）的理论，纯粹是胡说。他的另一个心爱的理论就是即使你完全知道摆在桌上的是修正主义，也应该尝尝桌上的每一样东西，这一理论也是十分奇怪的。不要让查鲁·马宗达同志将各种成就的全部功劳都归功于自己，却将所有挫折的全部责任往别人

的身上推。我们革命者要求查鲁·马宗达同志成为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好的学生，不要在我们和世界人民面前将自己摆在和毛泽东同志的同等级位上。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毛澤东思想的光輝照耀着 喀拉拉邦》

尽管力量悬殊，喀拉拉邦的革命派还是坚持执行我党政治思想工作的这个最根本的任务。反动的统治阶级总是不择手段地反对我们这样做。由于革命派百折不挠和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反动的统治阶级在那里失败了。修正主义分子就在那里插手进来，改头换面干起反对这项工作的肮脏勾当来了。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现代修正主义者，妄图迫害革命者。他们在革命队伍和广大群众中间散布诽谤革命者的流言蜚语，拚命地阻止毛泽东思想同我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们竟然也出版毛泽东主席的一些著作，妄图欺骗人民，使人民相信他们也是赞成毛泽东思想的。但是，沒有过多久，他们的做法就毫无疑问地证明，他们是在拚命地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同印度的具体形势结合起来。他们简直沒有意识到，他们这样欺骗我国人民，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我国人民在摆脱修正主义束缚的斗争中，他们一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不管是哪些著作和从那里得来的，他们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而且希望认真地运用到实践中去。

在喀拉拉邦，毛泽东思想著作的出版是一九六六年

初以卡利卡特为中心开始的。翻译版本开始一本一本出现，这些翻译版本很快就被全邦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争购空了。出版的第一本小册子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的第二篇评论，题目是《关于斯大林问题》。随后又出版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等。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泽东主席的短篇著作《**反对自由主义**》袖珍本第一次出版。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立即作出反应。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这个党的喀拉拉邦委员会向报界发表公开声明如下：“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同出版那些著作没有关系。”他们企图这样来挫伤这些同志们的主观能动性，把他们的活动在萌芽时期就扼杀掉。但是事实上，修正主义头子的这种行动只会帮助从事这项工作的革命派鼓足干劲，集中精力出版更多的毛主席著作。他们从亲身的经验中认识到的确“**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除了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制造的无数困难之外，革命者自己还有翻译和筹集印刷经费的问题。在他们中间没有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管什么人在那里都呆不长就溜了，因为这些人生怕把自己在学校、机关或其他地方的职位丢了。那些以前从

来沒有尝试过这项工作的人，沒有被这些不利条件所吓倒，承担了这项工作，逐步解决了这个问题。至于钱，总是短缺的，但是，这个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在开始阶段，他们主要是通过自己凑钱不断出版，后来，则向他们周围的人募款。经验告诉他们，在他们各项活动中，依靠自力更生总是更好一些。

随着岁月的推移，毛泽东主席著作的出版越来越多了，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反对本本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老三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青年运动的方向**》等等。

在这些岁月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炮声响彻全世界。在我国，纳萨尔巴里的春雷预示着印度革命所将遵循的道路。纳萨尔巴里的消息象野火一样在我国广大农村传播开来，随之而来的是万分迫切地要求得到更多的毛主席著作。这个邦的各个城市的更多的革命派承担起满足这种要求的工作。他们把自己所得到的来自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印刷品都翻印出来。

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开始，包含《**毛主席语录**》一些章节的小本子开始在卡利卡特出版。同年十一月，第一批完整的《**毛主席语录**》出版了。这是喀拉拉邦人民的一项伟大成就。他们从此得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

主席的全部著作的摘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再是懂外文的人们独有的财富了。这一成就的确意味着一个转折点。接着还出版了另一部伟大著作：**《毛主席论人民战争》**。

此外，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社论的上千册社论的手抄本在这个邦的各地传播，同年十一月在帕尔加特出版了第一批印刷本。值得在这里追述的是，卡利卡特的同志们，为了庆祝这篇社论发表两周年，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五日把这篇社论第五次再版，并加了编者按，再次强调指出这篇社论对印度人民的重大意义。

由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发生了有历史意义的特利切里——普尔帕利起义，出版工作暂时搁了下来，但是过了四个月，再版的新版本又出版了，在特里丘尔、阿迪马利、帕尔加特等等地方，先是少量出版，接着不断大量出版。一九六九年五月，出版了**《毛泽东军事文选》**的全新的译本。在帕尔加特和卡利卡特出了两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特里凡得琅出版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卡利卡特出版了**《战争和战略问题》**。在特里丘尔出版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特利切里——普尔帕利起义一周年的时候，卡利卡特出版伟大的经典著作**《井冈山的斗争》**。除了这些军事著作之外，卡利卡特和特利切里还出版了

《〈共产党人〉发刊词》、《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老三篇》第三版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另外，还出版了《人民日报》许多重要社论的小册子，如六月三十日的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等。

由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印度土地上建立了印度共产党(马列)并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二日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的称赞，喀拉拉邦的革命派在思想战线上变得更加活跃了，许多小册子和传单在喀拉拉邦各县涌现出来，支持党，谴责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这个邦的一批新的机会主义者在这个邦冒了出来，企图在党的初建阶段夺取党，而我们的人民被及时地告诫要提防这种危险。

在革命派的所有这些活动中，他们严格遵循自力更生的原则。他们非常需要帮助，但是毛主席教导他们不要依赖外界的援助，但是外界援助来了也欢迎，而坚决依靠自己的努力。反动政府现在正在加紧封锁中国的所有新闻和书刊，妄图剥夺革命人民用革命思想武装自己的手段。他们还敞开大门让反动透顶和极端修正主义的思想泛滥全国以挫伤人民革命的要求。毫无疑问，这种企图在坚决的斗争面前也注定要失败的。

喀拉拉邦革命派正是在同反动思想和反动政治观点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他们是在同工人阶级政党内

部和外部的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进行的坚决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一九六六年七月发生的事件如今不断重演，似乎令人感到奇怪。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在某个月刊上出现的一份声明说，“印度共产党（马列）同喀拉拉邦发布的某些通告没有任何关系”。正是这一个出版整整两年的月刊，这几年来对喀拉拉邦革命派一直进行的执行“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的工作情况却只字不提。然而，当这个月刊在保护他们在喀拉拉邦的某些问题时，倒是很大方，不惜篇幅。他们的这些同类使用与修正主义头目使用的同样恶毒的语言竭力攻击革命派。

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五七年说过：“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

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于喀拉拉邦卡利卡特

編 后

印度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县共产党左派，于一九六七年四、五月间，在该县纳萨尔巴里地区发动了农民武装斗争，为印度人民革命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一创举在以孙达拉雅为首的“印度共产党（马）”（以下简称“印修”）内部引起了巨大反响。印修所属各地区组织中要革命的党员，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印修领导，支持纳萨尔巴里农民武装斗争。

各地造反出来的印共革命派，曾一度集中在以大吉岭县革命派为核心组成的“印共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里，他们通过这个组织，交换观点和协调反修行动。但是沒有多久就因彼此观点分歧而分成了许多派别。同印共大吉岭县革命派观点一致的革命派，在去年四月二十二日成立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积极领导农民武装战争。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印共（马列）观点的一些革命派，则各自活动。这些派别主要有：纳吉·雷迪派，阿西特·森派，“南国”派和昆尼卡尔·纳拉扬纳派。他们也都宣称拥护毛泽东思想，走武装斗争道路，但是，他们都反对或批评印共（马列），而他们对印度革命问题的若干看法，也不完全一致。印共（马列）把它们斥之为“新修正主义派



2 024 2849 9

别”。

为便于了解和研究印度革命的情况，我们把上述反对印共（马列）的各革命派的一些文件和文章汇编成册，供参考。

由于译编粗糙，难免有错，望予批评指正。